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新世纪版

女权主义理论

Feminist Theory

从边缘到中心

[美]贝尔·胡克斯 著

晓征 平林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

Feminist Theory

[美]贝尔·胡克斯 著

晓征 平林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美)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0

(大众汉译精品/吴源主编)

ISBN 7-214-03023-3

Ⅰ.女… Ⅱ.①胡…②晓…③平… Ⅲ.女权运动 Ⅳ.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6311 号

书　　名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
著　　者	[美]贝尔·胡克斯
译　　者	晓征　平林
责任编辑	张慕贞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页 2
字　　数	14.6 万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23-3/G·995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为我们的姐妹——安吉利娜、吉温达、瓦莱丽、特莉莎、莎拉

为所有我们共同拥有的

为所有我们共同经历的

为永远的紧密无间

致　谢

不是所有的女性，实际上是极个别的，有幸与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妇女和男性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处于必须独自从事女权斗争的环境之中，只是偶然会得到支持和肯定。在撰写《难道我不是妇女: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孤独地工作着。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使我更加靠近女权主义活动者，尤其是黑人妇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女权运动中非常活跃的黑人妇女对它和我都不屑一顾。我期待的是对我的作品认真严肃的评判，对来自妇女们的敌意和轻蔑却毫无准备，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把这些妇女视为敌人。尽管受到如此对待，我还是和她们一起投入到女权斗争之中。对我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同一观点来处理女权主义问题。它意味着我们有着交流的基础，我们的政治义务能让我们相互交谈，共同斗争。然而不幸的是，互相不理睬、疏远、排拒，甚至伤害，要比投入到富有建设性的斗争之中更加容易。

如果没有那些觉得这本书让她们开始重新考虑或者第一

次想到性别歧视对我们生活的冲击和女权运动的重要性的黑人妇女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我可能已经非常沮丧和气馁。要感谢她们和其他许多的男性和女性们,我这本书才得以避免在孤独中完成。我要特别感谢那些给我以关爱和肯定的人们:我的妹妹瓦莱丽和吉温达;我的朋友和同志贝弗莉;我的伙伴内特;还有 South End Press 的工作人员们。这样的鼓励让我恢复了我的女权政治义务,使我更加确信,女权主义作品的价值不仅由作品在女权主义活动分子中得到接受的方式所决定,还要由它把女权主义斗争之外的男性和女性带入到其中来的程度所决定。

第二版序言
看见光明：女权主义幻想

在当今世界，女权运动仍然是为了争取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最有力的斗争之一。我19岁时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女权主义著作《难道我不是妇女：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的初稿。过了将近十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在那十年里，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创建之中。一些个人在谈论或者撰写有关当代女权运动的内容时，他们常常让人觉得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整套作为女权主义基础的原则和信仰。事实上，当女权主义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时候，它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在常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的妇女中表现它自己，因而并不存在明确的政治纲领。

当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有关“无名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性别歧视是如何以阶级特权的方式影响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时，赛普蒂玛·克拉克、埃拉·贝克、法妮·洛·汉默和安·默迪(Septima clark, Ella Baker, Fannie Lou Hamer, and Ann Moody)与全国个体的黑人妇女一起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向性别歧视发起挑战。白人妇女把她们的运动称为反对性别歧视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区别于全国的黑人解放运动。

我们不知道是谁"首先"使用了"妇女解放"这个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当代女权运动的历史中了解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个体的妇女在反抗性别歧视。当这些妇女见面交谈时,那种集体反抗便成为人们所说的妇女解放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了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斗争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女性或男性反抗性别歧视、性剥削和性压迫的时候。当人类群体采用有组织的策略来采取行动消除父权制的时候,便产生了女权运动。

我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并且进行了女权主义的反抗。我违背了父亲的父权主义思想,选择了接受高等教育,这也让我的母亲感到害怕,她认为太多的教育会使我"不合适"做一名真正的女人。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了女权运动。在校园的各个地方,参加激进政治活动(黑人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反战和环境权力)的年轻女性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问题上。女学生们吸取了发起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工作成果和经验,她们发表宣言和意见书,在各处,她们都被激励去审视过去、找到并发现我们身上所隐藏的故事和女权主义历史。当这项工作正在开展的时候,另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学科也产生了另一个领域,这便是女权主义理论。

最初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学科不同,前者是对性角色的批判性质疑和重新想像,而后者的中心在于重新发现过去的历史、被遗忘的英雄和作家等等,或者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记录当今妇女的现实生活。女权主义理论为这项运动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蓝图——能引导我们去改变父权主义文化传统的蓝图。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女权主义思想家们已

经开始对60年代末出现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辩证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形成了修正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础。

当激进的有色人种妇女和她们的白人妇女支持者们开始猛烈地向认为“性别”是决定一个妇女命运的基本因素的观点发起挑战的时候，女权主义思想和实践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我仍然能记得在我参加的第一次妇女研究课上——那里除了我之外其他参加者都是白人妇女，而且多数有着特权阶层的背景——她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有关统治的起源，有人认为一个孩子从子宫里生出来时的性别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我打断了她们的讨论，每个人都很不安。我说当一对黑人夫妇的孩子从子宫里出生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其肤色，然后才是性别，因为种族和性别将决定孩子的命运。着眼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连锁本质是一种改变了女权主义思想方向的观点。

在女权运动的早期我们发现比较容易接受性别、种族和阶级共同决定女性命运这个现实，但要理解它是如何具体形成并且影响女权主义的实践则要困难得多。当女权主义者谈论着进行一场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的必要性的时候，却没有可以形成这项运动所需要的广泛深入的基础。女权解放运动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它主要引起了人们对与特权阶级妇女(主要是白人)有关的问题的注意。我们需要能够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运动提供思想和策略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用建基于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理解的女权主义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文化。为了这一需要，我撰写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

现在，个人从事女权主义工作以唤起人们对性别、种族和

阶级问题的思考已经很普遍了，人们常常忘记了开始时大多数女权主义思想家——其中有很多是白人和有特权阶层背景的人——对接受这个观点抱着敌对的态度。那些想从种族—性—阶级的观点来谈论性别问题的激进/革命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被指责为是破坏了运动、转移了中心的背叛者。我们的工作常常被忽视或者受到无情的批评，认为它缺乏学术性或者太有攻击性。那时，白人朋友们常常鼓励黑人妇女或者有色人种的妇女去谈论种族问题，而我们的有关女权运动的其他所有方面的观点则全都被忽视。我们对限制我们的观点的作法进行了有力的反抗，承担了我们创建女权主义理论的职责，对女权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这种职责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的伦理（道德）基础。

女权运动最肯定的一个方面是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坚持辩证的批评和交流。听着激进思想者们（其中也有有色人种妇女的声音）的声音，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面貌改变了。许多不了解真相的白人妇女打破了否定的坚冰，开始重新审视她们过去是如何谈论以及在文章中是如何讨论性别问题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没有其他的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像女权运动这样具有自我批判性。女权主义者在需要的时候愿意改变方向，这已经成为女权斗争的力量和生命力的主要源泉。这种内在的批评对于任何政治转变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生命不是固定的或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一样，我们的理论也必须始终是不固定的、开放的，并且要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

当《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首次出版时，它受到了需要一种新的想像的女权主义思想者的欢迎和称赞。即使这

样，个别读者还是觉得书中的理论“有煽动性”、“让人不安”。评论者用了“无情的剖析”来形容这本书。当时主流女权主义者对这本书和其他任何被认为“批评得过火”或者“太激进”的其他女权主义理论都置之不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被作为一本幻想者的著作介绍给没有准备接受它的女权主义者。渐渐地，随着女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白人妇女）接受了用种族、性和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性别问题的方式，这本书开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在其他幻想作品中有了一席之地，这些作品正在用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改变着当代的女权主义思想。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所描绘的女权运动的蓝图异常地完美。它与几年前一样地涉及了我们当前的形势，为建立我们仍然十分需要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方针。它用一种比当前许多女权主义理论更加易懂的语言写成，体现了女权主义者的希望，即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自从它第一次出版以来，女权主义学科和理论开始在这个社会中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正是这种距离使女权思想对多数人来说是不相干的。我在书中强调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女权主义著作；没有它就不会产生富有批评意识的女权主义教育。

女权运动在女孩和男孩、妇女和男人、我们的社会生活、帝国主义政治制度、白人至上论和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中都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变化。尽管无用的女权主义充斥整个社会，但事实依然存在：每个人都从当代女权运动所带来的文化革命中受益。它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工作、我们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去爱的方式。然而女权运动并没有进行持久的女

权革命。它没有结束父权制、根除性别歧视、性剥削和性压迫,其结果是女权主义的成果总是有失去的危险。

我们已经目睹在生育权方面的重大损失。对女性的暴力在上升。对劳动力的性别偏见每天都在发生。对女权主义无情的批评在指责运动中的家庭暴力,敦促妇女和男人们放弃女权主义思想,回到以性别划分的角色中去。父权制的大众传媒要么把女权主义说成是垃圾,要么告诉公众它是没有必要、没有生命的运动。机会主义妇女们倒是为女权运动的成功喝彩,然后告诉我们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在这个妇女迅速成为我们国家主要的贫困者、单身母亲正在患病、贫困的人得不到国家的帮助、大多数各个年龄层的妇女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的社会里,"所有妇女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然而即使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实,幻想女权主义者的演讲仍然只越来越多地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之中进行。如果它一直这样,人们就听不到女权主义思想,最终女权运动也将终结。

为了重新开始女权斗争,确保我们正朝着女权主义的未来前进,我们仍然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女权主义理论,让每一个人知道女权运动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所进行的分析一样会一直发起挑战,让我们震惊、愤怒,转移我们的范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安。这就是革命。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和平、自由、平等、没有统治的社会里,就需要女权革命。如果我们沿着这条女权主义的道路前进,那就是我们的未来。《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将继续是向导。

纽 约

2000 年 1 月

第一版序言

处于边缘，意即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但却处于主体之外。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火车的铁轨每天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当女佣、门房、妓女……只要是服务业。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但不能在那里居住。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回到铁路的那一边，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

有法律来确保我们的归来。不回来便会有受到惩罚的危险。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在边缘——于是产生了一种看待现实的特殊方式。我们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我们既看中心也看边缘。这两者我们都了解。这种看世界的方式提醒我们整个宇宙——一个由边缘和中心构成的主体——的存在。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公众对于边缘和中心的分隔意识和认为我们是整体所必需的、重要部分的个人观点。

这种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印在我们意识中的整体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一种我们的压迫者多数不知道的看世界的方法——它支持我们,在超越贫困和绝望的斗争中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的团结。

发掘一切可能性的愿望是我在撰写《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时的观点特征。很多女权主义理论都是从特权妇女中产生的,她们生活在中心,有关现实的观点中很少包括对生活在边缘的妇女和男人们的了解和认识。其结果是女权主义理论缺乏整体性,缺乏可以包含各种人类经历的广泛的分析。虽然女权主义理论者意识到了发展观点和分析——那种包含了大量为了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人类经历的分析——的需要,但产生这样的理论的过程是复杂而缓慢的。在丰富的幻想中,它将会从那些既了解边缘也了解中心的人中间产生。

由于缺乏黑人妇女提供的以及有关她们的材料,于是我开始研究并撰写《难道我不是妇女: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一书。正是由于缺乏论述边缘和中心问题的女权主义理论才使我去写这本书。在下面的书页中,我将探索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局限性,指出新的方向。我尽量避免重复已经广为人知的和讨论过的观点,重点探讨不同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的新观点。于是有的章节会比较长而有的则相当短;没有一个章节是在试图作全面的分析。纵贯全书,我的思想是由一种信念形成的,这便是女权主义要对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作用的话,必须成为一种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佘江涛

精|汉
品|译
新世纪版



这本经过谨慎论证、具有很大鼓舞性的著作是对性政治的核心问题的一次全面的审察，包括女性中间政治上的团结、作为战斗伙伴的男性，以及为了终结暴力的女权运动。本书始终富有吸引力，有着极大的鼓舞性。胡克斯将一种我们易于接受的表述风格与批判的洞见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幅植根于同情、尊重和正直的女权主义图景。

装帧设计　吴赵铎



ISBN　7-214-03023-3
G·995　定价:12.00元

目　录

1 黑人妇女：形成女权主义理论

在美国，女权主义从来没有在那些遭受性压迫损害最严重，每天受到精神、身体和灵魂的摧残的妇女——那些无力改变她们的生活状况的妇女——中出现过。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牺牲的一个标志是她们在生活中默默地接受了很多东西而没有明显的质疑、没有有组织的反抗、没有集体的愤怒。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仍然因其指出了当代女权运动的道路而起着指南的作用——在这本书中，这些妇女似乎根本不存在。（尽管《女性的奥秘》遭到了来自各个阵线的批评甚至攻击，我在这里再次提起对它的注意是因为这本书里的某些带有偏见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本质的论述还在继续塑造女权运动的进程和方向。）

弗里丹的名言"无名问题"常常被引用来描述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状况，确切地说是指经过精心选择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上阶层的、已婚的白人妇女的状况——她们是厌倦了休闲、家庭、孩子和购物，对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妇女。弗里丹在第一章结束时写道："我们不能再忽视妇女中的这样一种

声音：'我想要比我的丈夫、孩子和房子更多的东西'。"她所说的"更多"指的是事业。她没有讨论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像她一样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与白人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将由谁来替她们带孩子、做家务。她也没有提到没有男人、没有孩子、没有房子的妇女的需要。她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的存在。她也没有告诉读者做一名女仆、保姆、工人、店员或者一名妓女是否要比做一名悠闲的家庭妇女满足。

她把她自己的状况和与她相似的白人妇女的状况以及所有美国妇女的处境等同起来。这样，她便把注意力从她对广大美国妇女的带有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观点上转移开了。在书中，弗里丹清楚地表明她所认为的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是那些由于性别原因而被迫呆在家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她说：

> 了解家庭妇女这种身份会如何在妇女中产生一种空虚、不存在和无价值感是非常迫切的。家庭妇女角色的各个方面使受过教育的成年妇女几乎不可能保持一种人类的认可感，没有坚定的自我中心或"我"，没有这种"我"，人类——男人和女人——都不算真正活着。就当今美国的妇女能力而言，我确信在家庭妇女状况本身之中存在着某种危险的东西。

悠闲阶层白人家庭妇女的特殊问题和进退两难的困境的确是值得考虑和需要改变的问题，但这些不是有关广大妇女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广大妇女所关注的是经济生存、人种和种族

歧视等。当弗里丹撰写《女性的奥秘》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妇女在工作。虽然有许多妇女希望做家庭妇女，但只有那些有钱有闲妇女才能以女性奥秘的方式真正形成她们的特性。用弗里丹的话来说，她们是这样的妇女："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让她们像娜拉一样回到家里过她们的生活，被维多利亚式的偏见局限在洋娃娃的房子里。"

从她早期的作品来看，弗里丹从没有想过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家庭妇女的状况是不是足以成为一种参照，用来衡量性别歧视或者性压迫对美国妇女的影响。她也没有离开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获得有关美国妇女生活的比较全面的观点。我说这些不是在贬损她的作品。书中就性别歧视对某一特定妇女群体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自恋、迟钝、多愁善感和自我放任的一个实例，这一点在题为"进步的非人化"一章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一章里，弗里丹把孤独对白人家庭妇女的心理影响与纳粹集中营里的禁闭对囚犯自我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弗里丹是当代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建者。她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妇女现状的单方面观点成为当代女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与她们的前辈弗里丹一样，操纵着当今女权主义问题讨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关心她们有关妇女现实的观点是否与广大妇女的生活经历相一致。虽然在近几年里有关偏见的意识增强了，但她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反映出的种族与阶级偏见到了怎样的程度。白人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种族主义观点，它强调了白人至上的理论，从而否定了妇女们可以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界限形成政治联合的可能

性。过去的女权主义者对种族等级制度根本不注意,也不去攻击,这抑制了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联系。然而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由白人至上的种族政治构成的;只有通过分析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才能对阶级关系有彻底的了解。阶级斗争与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促使妇女们去发掘阶级的全部内含,瑞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在她的文章"最后一根稻草"中写道:

> 阶级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阶级涉及到你的行为、你对生活的基本设想。你的经历(这由你的阶级决定)证明了那些设想,你受的教育告诉你如何行动、从自己和别人那里期待些什么、你对将来的概念、你如何理解问题、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你的想法、感觉和行为。虽然中产阶级的妇女可以非常愿意接受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她们拒绝认识的正是这些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精巧的骗局,让她们不去认真对待阶级行为和改变她们自己身上的这种行为。必须认识、理解和改变的也正是这些行为方式。

那些操纵女权主义讨论,建立并且解释女权主义理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把白人至上理论理解为一种种族策略、不了解阶级的心理影响和她们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

正是由于这样的缺乏认识使李·弗里茨(Leah Fritz)在一本1979年出版的讨论当前妇女运动的书《梦想者和交易者》中这样写道:

> 性别歧视暴政下妇女的遭遇是一种所有妇女共同的东西，超越了这种暴政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的特殊性。**苦难不能用数量来比较和衡量**。那么，强加在一个"有钱"妇女头上的并且导致她发疯和(或)自杀的无聊和空虚与一个靠福利救济生活但还保留着一些精神的贫穷妇女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哪个更加深重呢？这之间的区别无法比较，但如果这两个妇女抛开了父权制等级观点的屏障而相互审视的话，她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受压迫的，都很悲惨。

弗里茨所作的又是一种异想天开的陈述，就像把妇女之间的社会划分有意神秘化的女权主义论述一样。很明显，许多妇女正处于性别歧视的暴政下，但却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会促使"所有妇女大联合"的形成。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事实：种族和阶级地位会导致产生于妇女们共同经历之前的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几乎无法逾越的。当有物质特权、受过教育、有着各种不同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可以选择的白人妇女坚持认为"那种苦难是无法衡量"的时候，必须问一问她们的动机何在。弗里茨决不是第一个作出这种论述的白人女权主义者。我从没有听到任何一个种族的贫穷妇女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认为在本杰明·巴勃(Benjamin Barber)批评妇女运动的著作《解放女权主义》中有许多需要商榷之处，但我同意他的以下论述：

> 遭受苦难不一定是可以用一种标准来衡量的一种固

> 定和普遍的经历:它与处境、需要和期望有关。但这个术语的使用必须要有一些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参数,以便确定政治优先权和对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苦难进行最密切的关注。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宗旨是认为"所有的妇女都是受压迫的"。这种论述意味着妇女们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如阶级、种族、宗教、性取向等等因素都不会造成生活经历的差异,这种差别决定着在妇女的个人生活中,性别歧视作为一种压迫力量会到怎样的程度。性别歧视作为一种统治体系是制度化的,但它从没有以一种绝对的方式来决定所有的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命运。受压迫意味着没有选择。这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基本的联系点。这个社会中的许多妇女有选择(虽然很少);因此剥削和歧视是更加确切地描述美国大多数妇女的共同性的两个词。很多妇女没有参加有组织的对性别歧视的抵抗恰恰是因为性别歧视并不是意味着绝对没有选择。她们可能知道自己因为性别的原因受到歧视,但没有把这一点与压迫等同起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父权制的构成使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中限制了妇女的行为,正如其在别的领域全无约束一样。没有极端的限制使很多妇女忽略了她们受到剥削或者歧视的领域;它可能会导致她们主观地认为没有妇女受到压迫。

在美国存在着受压迫的妇女,我们提出反对这样的压迫是适当的并且也是有必要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汀·黛尔菲(Christine Delphy)在她的文章"一个物质主义者的女权主义"中指出,使用"压迫"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把女权主

义斗争置于一个激进的政治结构之中(有关克里斯汀·黛尔菲观点的更加详细的讨论可以在她的杂文集《靠近家》中找到)：

> 女权主义的新生是与“压迫”这个词的使用相一致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如常识、日常谈话等并没有提到压迫的问题而是只谈“妇女状态”。它指的是过去自然主义者的解释：指一种自然的约束，是一种无法触及的外部事实并且是不能由人类行为来更改的。相反，“压迫”这个词指的是过去的一种选择、一种解释、一种政治状况。因而“压迫”和“社会压迫”是同义词，或者社会压迫更加繁琐一点：以政治为出发点的思想，如社会的，是压迫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共同压迫”不是一种政治化的策略，而是保守和自由的妇女对激进的政治词汇的搬用，它掩盖了她们开展的运动所达到的程度从而致力于促进其阶级利益。

虽然对联合的推动作用和了解共同压迫观点的移情作用会建立起团结，但是诸如“在你自己的压迫周围组织起来”的口号为很多特权阶级妇女提供了借口，让她们无视她们自己和大多数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它与许多强加在劳动妇女头上的性别歧视约束所表达的自由一样是种族和阶级特权的标志，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可以把她们自身的利益作为女权运动的基本中心，用花言巧语把她们的处境说得与“压迫”相近。是谁在要求词汇上的变化？在美国还有其他哪一个阶层的妇女像她们一样可以上大学、进出版社或大众媒体以及有

钱? 如果中产阶级黑人妇女发起一项称她们自己"受到压迫"的运动的话,是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的。如果她们就自己受到的"压迫"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演讲的话,她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资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情况便不一样,因为她们可以号召一大批像她们一样渴望在生活中改变命运的妇女听众。她们与其他阶级和种族妇女的脱离使之不能有一个直接的比较基础来对她们所作的共同压迫的假设进行验证。

最初,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的激进主义者要求妇女们认识到这种脱离并且建立一个接触的空间。像《现在就解放!》、《妇女解放:未来的蓝图》、《阶级与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姐妹情深》之类的文选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的,其中的文章试图涉及到广泛的妇女听众,这些听众不仅仅是白人、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成年人(有许多关于青少年的文章)。苏琪·斯坦伯勒(Sookie Stambler)在她的《妇女解放:未来的蓝图》一书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激进的思想:

> 媒体出于其本身的需要把妇女运动变成了制造名人和明星。这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不能与那些属于我们这个阶层但在名望方面却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妇女发生联系。我们不是在为一个妇女或者一群妇女的利益而斗争。我们所涉及的是与所有妇女有关的问题。

这些在运动的早期为许多女权主义者所接受的观点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女权主义写作或者要求

劳动力平等的女权运动的收获中得到了威望、名誉或金钱，一些机会主义者便对共同斗争的要求进行破坏。不反对父权制、资本主义、阶级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妇女们称她们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有着不同的期望。有特权的妇女希望与同一阶层的男性达到社会平等；有的妇女希望同工同酬；其他人希望可以选择生活方式。很多这些合理的要求都很容易被资产阶级父权统治者所同化。法国女权主义者安东瓦内·富克（Antoinette Fouque）说：

> 女权主义者建议采取的行动是壮观并且具有煽动性的。但煽动只能涉及到某一些社会矛盾。它没有揭示社会的根本矛盾。女权主义者声称她们不寻求与男性的平等，但她们的行为所体现的却是相反的事实。女权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先锋派，她们用逆反的方式坚持着统治价值。逆反对于通向另一种结构并无推动作用。改良主义适合于每个人！资产阶级秩序、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急于拉拢尽可能多的女权主义者。由于这些妇女正在变为男性，最终只是意味着多了几个男人。性别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有阴茎，而在于是否是男性经济的一部分。

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卡萝尔·厄里克（Carol Ehrlich）在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不幸福的婚姻：它还有救吗？"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她认为随着"女权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向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让步，女权主义似乎越来越表现出盲目、安全和不革命的趋势"，她强调"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妇女们应该知道(她们越来越受到阻碍,不让她们发现)女权主义所涉及的**不是**关于如何成功地打扮、如何成为一名公司的职员或者得到竞选的位置;它不是指由于你有了保姆你便可以享受两个人都出去工作的婚姻、去滑雪度假、花大量的时间与你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在一起,而你的保姆却没有时间或金钱享受这一切;它**不是**指开一家妇女银行,或者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去参加一个保证让你变得有信心(但不具攻击性)的昂贵的学习班;它也绝对**不是**指成为一个警探、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海军部队的将军。

但如果这些被歪曲的妇女形象比我们的更加现实的话,我们有一部分责任。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努力地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的清楚而有意义的有选择性的分析,也没有提供积极的、可以在其中工作的、可以触及的群体。

女权主义斗争轻易地就被同化并且服务于保守势力和自由女权主义者的利益不是偶然的,因为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在《自由女权主义的基本前景》一书中探讨了北美女权主义的自由根源,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在这一研究中发现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女权主义理论构成中的作用。当今的女权主义者要么不讨论个人理论,要么她们自然地接受了个人

> 自由主义的竞争的、原子论的意识形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女权理论中的这个问题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除非对认可社会集体中个人重要性的个人理论和强调个人奋斗观点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区分，否则就不能对我们西方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自由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女权主义者的思想中充满了“竞争、原子论……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严重性已达到了破坏女权斗争中潜在的激进主义的程度。从女权主义理论目前的思考来看，资产阶级妇女操纵女权主义来服务于她们的阶级利益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如“共同压迫”的思想）。任何一场反对同化女权主义斗争的运动都必须以引进一种新的女权主义观点为开始——一种新的理论——一种不受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理论。

一些操纵女权主义讨论的妇女们的排斥行为实际上阻碍了各种新理论的出现。女权主义有其政党路线，并且那些感到需要一种不同策略、不同基础的妇女们常常发现自己受到排斥，不能发表言论。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批评或者选择是不受鼓励的，例如，最近关于女权主义对于性的讨论是否要扩大的争论。不过，感觉受到女权主义讨论和实践排斥的妇女只有通过批评首先产生一种远离它们的意识才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很多白人女性在妇女运动中为个人的困境找到了一种自由的解决方法。由于从运动中直接获益，她们与那些觉得它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这个社会广大妇女的生活带来革命性冲击的妇女们相比，就显得不

太倾向于对它进行批评或者对它的结构进行严格的审视。在女权运动的当前结构中感觉受到肯定的非白人妇女(即使她们可能会成立自治的团体)也会感到，无论在黑人女权或者其他问题上，她们对于政党路线的定义是惟一合法的论述。他们像一些白人妇女一样，不是鼓励不同的声音、批评性的对话和辩论，而是竭力抑制不同意见。就像一些作品已经广为人知的行动主义分子和作家一样，她们的行为似乎在说她们最能判断是否要倾听其他妇女们的声音。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在她的文章"一切意识形态的方式"中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全面倾向提出了警告：

> 当一种理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便开始没有了自我和自知之明。它本来源于知觉，现在却假装漂浮在知觉之上及其周围。在感觉之上。它根据自身构成经验，却不触及经验。由于是它自己，它便被认为是知道的。运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名义便是有了真实性。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任何新东西。经历也不再会让它感到惊讶、使它活跃、产生改变。任何不符合其世界观的细节问题都会对它形成困扰。它开始时是反对否定真理，现在却是否定任何不符合其规范的真理。开始时它是一种让人恢复真实感的方法，现在它却在企图约束真实的人，按照它自己的想像去重造自然的人。把所有它无法解释的东西都列为它的敌人。开始时是一种解放理论，现在它却受到新的解放理论的威胁；它成了一个思想的牢笼。

我们反对女权主义思想的霸权统治，坚持认为它还是一

种正在形成的理论，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批评、质疑、重新审视并且探求新的可能性。作为被压迫群体的一名成员，我有着受到性剥削和性歧视的经历，并且感觉到当前的主流的女权主义分析并不是形成我的女权主义意识的力量，这些都影响着我所一直坚持的批评。对于很多妇女情况都是如此。存在着这样一些白人妇女：直到女权主义运动让她们意识到她们可以并且应该反抗男性统治的时候，她们才会考虑这样做。我的女权主义斗争意识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刺激。我是个黑人，生长在南方一个父权统治的工人阶级家庭，我（和我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一样）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家长专制制度，它让我感到愤怒——我们都感到愤怒。愤怒使我对男性统治提出了质疑，还让我反抗性别主义的社会化。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常常让人觉得似乎是在她们提出了女权主义观点后，黑人妇女才知道了性压迫的存在。她们相信是她们为黑人妇女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和"这样"的解放纲领。她们不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像，黑人妇女以及每天生活在压迫中的其他妇女群体一样常常从她们的生活经历中获得对父权政治的认识，就像她们发展起反抗的策略一样（尽管她们的反抗可能没有坚实的或者有组织的基础）。

这些黑人妇女们看着白人女权主义者把她们的中心放在男性专制和妇女的受压迫问题上，似乎它是一个"新"发现，同时她们感觉到这个中心对她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对她们来说这只是那些中、上流社会的白人妇女们的特权生活状况的又一种表现，她们需要一种理论来"告知黑人妇女她们是受到压迫的"。这其中的含义是，那些真正受到压迫的人即使没有投入到有组织的反抗或者不能用书面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

他们所受到的压迫的本质,他们也知道自己所受到的压迫。这些黑人妇女在对妇女受压迫的政党路线分析中没有看到任何自由和解放。黑人妇女没有大规模地围绕"女权主义"问题组织起来(我们之中很多人还不知道或者不会使用这个词),我们没有途径可以获得能让美国公众认同我们对性别问题的分析或者理论的权力机器,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女权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或者使我们在与那些对着更广大听众进行演讲的白人和非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我13岁时对父权政治的理解使我产生了与其他年轻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截然不同的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期待。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第一次参加妇女学习班时,看到白人妇女们非常高兴能够聚在一起,对她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场合。对于妇女们不聚集在一起、不相互帮助、保护和深深关爱的生活我不了解。我不认识那些对于种族和阶级对她们社会地位和意识的影响一无所知的白人妇女。(南方的白人妇女对于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比美国其他地方的白人有着更加现实的看法)。对那些坚持认为我不能指望她们知道或者了解黑人妇女生活经历的白人同学,我很不赞同。尽管我有自己的背景(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区里),但我了解白人妇女的生活,而且,当然不会有白人妇女生活在我们的社区里,进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家里劳动。

当我参加女权主义社团的时候,我发现白人妇女们对我和其他非白人参加者持一种恩赐的态度。这种对黑人妇女的恩赐态度是她们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提醒我们妇女运动是"她们的"——我们能参加是因为得到了她们的允许甚至是鼓励;毕竟,要使程序合法化还是需要我们的。她们没有把我们视

为是平等的。对我们也不平等。虽然她们希望我们提供有关黑人经历的第一手资料，但却觉得应该由她们来决定这种经历是否可信。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妇女（甚至那些来自贫穷或工人阶级家庭的黑人妇女）也常常被当作纯粹的仿效者打发了事。我们在运动中的存在毫无价值，因为白人妇女深信"真正的"黑色意味着说着贫穷黑人的土话、没有受过教育、有着各种应付街头事情的智慧和其他很多固定的模式。如果我们敢于对运动提出批评、对重新形成女权主义思想承担责任或者引进新的观念，那么我们的话就会被打断、不予理睬，然后不让我们说话。只有在我们的陈述附和着讨论的主要观点时，才会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很少有人写出有关白人女权主义者企图压制黑人妇女言论这方面的事情。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会议室、课堂或者舒适的私人客厅里，在这些场合一个孤立的黑人妇女要面对一群白人妇女的带有种族主义的敌视。从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黑人妇女就加入了一些团体。但很多人在参加了一次会议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安妮塔·科恩威尔（Anita Cornwell）在她的文章"三个换一个：一个黑人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笔记"中的论述是正确的，她说："让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害怕遇到种族歧视似乎成了很多黑人妇女拒绝参加妇女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最近种族歧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就此进行了一些讨论，但这对于白人女权主义对黑人妇女的态度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忙着发表有关"忘却的种族主义"的论文和著作的白人妇女们在涉及到黑人妇女时就常常表现出一种屈尊俯就和恩赐的态度。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她们的讨论常常是只以白人听众为对象的而且其中心也只在于改变态

度而不是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去讨论种族歧视问题。她们在带有特权性质的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中,把我们视为“客体”。作为“客体”,我们与她们是不平等的,是劣等的。也许她们是真的关注种族歧视问题,但她们的方法表明她们仍然没有摆脱白人至上思想所特有的家长制作风。这些妇女中有些人把自己置于一种“权威”的位置上,认为自己必须在有种族歧视思想的白人妇女(她们自然地认为自己已经对她们的种族主义思想让步了)和她们认为没有能力进行理性讨论的愤怒的黑人妇女之间充当调解人,让她们进行交流。当然,要保持她们的权威地位,她们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教育优越主义思想体系就必须保持其完整性。

1981年,我参加了一个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生学习班,在发给我们的课程书目中包括了白人妇女和男性以及一名黑人男性的著作,但却没有黑人妇女、美国土著印第安妇女、拉美妇女和亚洲妇女的作品,也没有关于她们的著作。当我指出这一疏忽的时候,白人妇女们对我采取了愤怒和敌视的态度,其激烈程度让我觉得很难再留在这个班里。我认为这种集体愤怒的目的其实是想营造一种气氛,让我在心理上无法承受在班级讨论中发言的压力或者甚至无法参加这个班,我得到的回答是她们并不愤怒,愤怒的其实是我。几个星期后,学习班结束了,我收到了一个白人女生给我的公开信,她在信中承认了她的愤怒并且对她所作的攻击表示歉意。她写道:

> 我不认识你。你是一个黑人。在参加这个班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自己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往往是与你相抵触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争论

总是与种族歧视有关，而是因为我觉得其中隐藏的逻辑是如果我可以证明你在一个问题上是错误的，那么你在任何问题上便都是错误的。

在另一段中她这样写道：

一天我在班上说一些人受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诱惑要比另一些人少。我当时说我认为我们在受了15年的教育，学会了统治阶级的礼仪规范之后，可能比那些生活得离魔鬼的心脏非常近却没有受到惊吓的人更加容易受到诱惑。从那以后，我的一个同学就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而她曾经是我的好朋友、姐妹和同事。我想是我们也许不是所有妇女最好的代言人这一事实让她对自身的价值和她的哲学博士学位感到担心。

在白人妇女猛烈地攻击黑人妇女的情况下，她们常常把自己看作是被攻击的对象，是牺牲者。在我组织的一个有各个种族的妇女参加的团体中，我曾经和另一个白人女同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她告诉我她曾听说我在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班中是怎样"消除"别人的，她害怕自己也会被"消除"。我提醒她我当时是一个人对着一大群愤怒而且有攻击性的人说话；我几乎无法控制局面。含泪离开课堂的是我，而不是任何一个所谓被我"消除"的人。

黑人妇女强壮、超人的种族特性在很多白人妇女的头脑中形成了有效的荒诞说法，使她们忽略了黑人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受迫害的程度，以及白人妇女在保持这种迫害使之永久

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在她的自传《修饰痕》中写道:"我这一生从出生时开始便在听从黑人妇女的命令,需要她们,怨恨她们,几次没有服从她们便充满迷信。"赫尔曼所描写的黑人在她的家里当佣人,她们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地位。当这些黑人在向她提问、提出建议和指导的时候,她即使是个孩子,也是处于统治的地位;这些黑人可以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力是因为得到了她或者其他白人权力者的允许。赫尔曼把权力放在这些黑人妇女的手中而不承认自己对她们的权力;这样她便掩盖了她们之间关系的本质。通过赋予黑人妇女一种虚构的权力和力量,白人妇女既突出了她们自己无力被动的牺牲者的假象,又使人们不去注意到她们的攻击性、她们的权力(尽管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男性统治国家中这很有限)和她们想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欲望。很多白人妇女对社会的这些方面不了解,这阻碍了她们超越种族主义思想,并限制了她们对美国妇女整个社会地位的了解。

有特权的女权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各种不同的妇女团体交流,也无法说起她们或者为她们讲话,因为这些女权主义者不能全面理解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她们不愿意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女权主义对妇女命运的分析倾向于把焦点仅仅集中在性别问题上而没有为建立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她们反映了在西方父权统治者头脑中的统治倾向,即掩盖女性现实状况的真相,坚持认为性别是决定女性命运的惟一决定因素。当然,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种族或阶级压迫的妇女来说仅仅把焦点集中在性别问题上要容易一些。尽管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关注阶级和性别

问题，但她们倾向于忽视种族问题，或者她们承认种族问题很重要，然后继续进行着不考虑种族问题的分析讨论。作为一个群体，黑人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处于一个不寻常的位置，因为我们不仅都处于职业阶梯的底端，而且我们总的社会地位比其他任何群体都低。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压迫。同时，我们这个群体还没有社会化以至于可以扮演剥削者或压迫者的角色，也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让我们去剥削或压迫（孩子不代表这样的他者，尽管他们可能受到父母的压迫）。白人妇女和黑人男性具有这两方面的特性。他们可以是压迫者，也可以是被压迫者。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白人妇女可能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但种族歧视可以让她们成为黑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两个群体进行了支持他们利益的解放运动并且赞同对其他群体的继续压迫。黑人男性的性别主义者破坏了根除种族主义的斗争，而白人妇女的种族主义者破坏了女权斗争。只要这两个群体，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把解放理解为获得与白人男性统治阶级一样的社会平等，那么他们在持续的对他人的剥削和压迫中便有着既得利益。

黑人妇女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让我们去歧视、剥削或者压迫，她们通常都有直接向主流的阶级主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挑战的切身经历。这样的切身经历可能会形成我们的意识，使我们的世界观与那些有着特权地位（尽管这在现存制度中是相对的）的人完全不同。黑人妇女认识到自己处于边缘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并且利用这一点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主

义霸权,同时展望和进行反霸权活动,这一点在持续发展的女权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在发展女权主义理论中我们扮演着中心角色,并且把它提供给大家,做出了独特和有价值的贡献。自由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是大家必须共同分担的责任。虽然我对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女权运动的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尖锐而无情的,但我并不想削弱女权斗争而是想将它壮大,来共同承担建立解放思想和解放运动的工作。

2 女权主义：结束性压迫的运动

女权主义讨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我们无法在什么是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或者接受一个或几个能够协调不同观点的概念。没有协调一致的概念，我们便缺乏建立理论或者从事有意义的全面实践的坚实基础。卡门·瓦兹克茨（Carmen Vazquez）在她最近的一篇文章"迈向革命的道德规范"中表达了她那种由于没有明确的概念而遭受的挫折：

> 不管她信仰什么，也无论她如何定义形成我们的荣誉的原则，我们甚至不能在什么是"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像美国资本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困惑和任何只要能满足你的东西一样，亲爱的，你认为美国的女权主义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的一些姐妹咯咯地笑着说，有多少女权主义者，就有多少女权主义的概念。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有趣。

这不好笑。它表明，人们对作为一种激进政治运动的女权运

动越来越没有兴趣。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表现，说明了人们认为妇女之间的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说明了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政治幼稚，它是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的命运的传统特征。

美国大多数人把女权运动，或者叫“妇女解放”理解为使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运动。这个由媒体和运动的某些重要片断所宣传的宽泛的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既然男性在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阶级结构中是不平等的，那么妇女们希望取得与哪一种男性的平等呢？妇女们在什么是平等这个问题上是否有着共同的观点？这个对妇女的解放运动过分简单化的概念意味着没有考虑到种族和阶级因素与性别歧视一起决定了个人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对女性权力问题有兴趣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出于很明显的原因，满足于简单化的概念。她们口头上把自己与被压迫的妇女划为同一社会类别，其实并不想引起人们对种族和阶级特权的注意。

下层和贫穷的、尤其是非白人妇女不会把妇女的解放理解为妇女要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因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提醒不是所有妇女都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同时，她们知道在她们这个社会群体中，很多男性也受到剥削和压迫。由于知道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她们不认为与他们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是自由和解放。她们认识到性别歧视让男性在他们各自的群体中得到她们所没有的特权，她们更会看到男性之间大男子主义的夸张表现，这种大男子主义是源于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力和在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而不是一种全面的特权社会

地位的表现。从妇女解放运动之始，这些妇女就对女权主义持怀疑态度，这正是因为她们意识到了这个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她们认识到定义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女权运动可能很容易变成一种主要影响中、上层白人妇女社会地位的运动，而对劳动阶层和贫穷妇女的社会地位只是顺带产生一点影响。

正在形成概念而处于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前沿的妇女们并不是都满足于把妇女的解放理解为争取与男性的社会平等。在运动中很活跃的黑人妇女塞莱斯廷·威尔（Cellestine Ware）在《妇女权力：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的开头几页以"目标"为标题这样写道：

> 激进女权运动是为了在所有人类关系中根除统治和优越感。自主将是其最终利益，并且使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不复存在。

像夏洛特·本奇（Charlotte Bunch）这样的个人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者们把她们的分析建立在对统治策略的全面理解和对各种不同统治体系之间的联系的承认之上，即使她们的中心主要是性别歧视。那些对社会改革更加有兴趣的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对她们的观点并不重视。匿名的作者们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女权问题的小册子，叫做《妇女和新世界》，书中指出很多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很积极的妇女们更愿意把女权运动看作是帮助妇女们获得与她们这个阶层的男性的社会平等的一种改革，而不是把女权运动看作一种消除统治和改变社会的激进运动：

> 无论这个团体有着怎样的组织、场所和种族构成，所有妇女解放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的聚集是基于一种生物和社会的基础，而不是以观点为基础。妇女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聚集到一起，其基础是我们是女性和所有的女性都是服从于男权统治的。我们把所有的妇女都视为我们的支持者而把所有的男性都看作是压迫者。我们从没有对美国妇女接受与美国男性一样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程度表示过质疑。我们没有停下来去想美国妇女与美国的男性一样不愿意为一个以相互尊重、合作和社会责任的新价值为基础的新社会而斗争。

现在很明显的是很多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对改革很有兴趣，把它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彻底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齐拉·爱森斯坦在《自由女权主义的激进前景》中可以乐观地指出为社会变革而工作的自由女性身上潜在的激进主义，但这种激进主义出现的过程却是不清楚的。爱森斯坦把1978年由政府召开的有关妇女权力问题的休斯顿会议提出的要求作为表现自由女权主义者的计划中的激进思想的例子：

> 休斯顿会议的报告要求：作为人权，在决定我们的世界、国家、家庭和个人命运时，妇女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起到应有的作用。明确提出：(1)消除家庭暴力，为受到殴打的妇女建立避难所；(2)支持妇女的事务活动；(3)解决虐待儿童问题；(4)由联邦政府提供资助，对儿童进行没

> 有性别歧视的照顾；(5)制定完全雇用政策使愿意和想工作的妇女可以工作；(6)保护家庭妇女，使婚姻成为一种伙伴关系；(7)禁止在媒体中对妇女进行性描写；(8)生育自由，杜绝非自愿的绝育；(9)消除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双重歧视；(10)修改有关处理强奸的犯罪条例；(11)消除以性偏爱为基础的歧视；(12)建立不含性别歧视的教育；(13)审查一切福利改革建议对妇女产生的具体影响。

自由解放的改革对妇女的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应该导致认为已经消除了统治制度的设想。这些要求无处不在强调消除统治制度，但如果这些要求中任何一条已经达到的话，它便需要被废除。缺乏对统治的强调是与自由女权主义信仰相一致的，这种信仰认为不改变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或者不向它挑战便可以使妇女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达到平等。正是这种思想否定了自由女权运动中潜在的激进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早在 1976 年，巴西学者海莱斯·萨菲奥蒂(Heleieth Saffioti)就在其著作中强调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一直"无意识地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的女权主义"，她写道：

> 无论在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实践中有多少革命的内容，这都是由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在努力提高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们只寻求扩大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从不向它发出挑战。于是，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也许是一直致力于建立两性之间的社会平等，它所代表的觉悟始终是乌托邦式的，只希望产生部分社会变革并为此而斗争；人们相信不动摇

> 它的基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根本就不是女权运动;它实际上通过掩盖阶级社会固有的矛盾而使其更加巩固。

自由妇女的社会主张中激进的方面将继续作为意识形态的支持体系为维持自由主义提供必要的批评和分析动力,这种自由主义旨在承认妇女在当前白人至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国家中有更加平等的机会。这种自由妇女权力激进主义的本质是削弱女权主义斗争。哲学家米哈依罗·马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在他的文章"妇女自由和人类解放"中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 对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的解放构成重大障碍的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对人类本质的定义。如果如自洛克以来的每一位自由哲学家们力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自私、攻击、征服与统治的冲动真的是人类的特征,那么在文明社会中——如不受到国家约束的社会区域——压迫便是生活的一个现实,并且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基本民事关系将始终是在战场上。于是攻击性较小的女性或者是两者中较弱的一方,注定会被征服,或者她本身有更强的权力欲,试图去征服男人。两者都解放是不可行的。

虽然有关女权主义的自由观点包括会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的改革,但这肯定会受到抵制,因为如果实行这样的改革,就将为革命的变革建立舞台。显然社会对这些"女权主义者"的不具威胁性、甚至有助于维持现今社会的要求更加有反应。

珍妮·葛罗斯(Jeanne Gross)在她1977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道德规范"中举例说明了这种对女权主义策略的同化：

> 如果我们作为妇女想改变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是惟一有能力接受逐渐的变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接受我们不切实际的变化并且用它们来反对我们。例如，很多已婚的妇女认识到了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压迫，于是离婚了。在没有准备或者保护的情况下，她们被扔进了劳动力市场。对很多妇女来说，这意味着要在一排排打字机前找到自己的位置。企业现在认识到了剥削离婚妇女的空间有多大。这些行业中的人员变动惊人的大。"如果她不满意，会有人来代替她"。

特别是在涉及到工作的时候，很多自由女权主义改革只是加强了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说明资本主义的灵活性)，而没有真正从经济上解放妇女。

追求自由的妇女并不是孤立地在利用女权主义的推动力来扩大她们的利益。许多以不同的方式从女权主义引起的社会变革中获益的妇女不愿意被看作是女权主义的提倡者。如果没有女权运动便不会组织或资助现在在全美各地召开的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但参加会议的人不愿意被视为女权主义的提倡者。她们或者不愿意参加女权运动，或者讥笑它。一些美籍非裔、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美籍亚裔和拉丁美洲妇女发现，如果她们支持女权运动的话，便会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之中。甚至一些有着或好或坏名声(以及经济收入的增长)的女

性，由于她们的工作而受到大量支持女权运动的妇女对她们的关注，但她们对此采取的态度也是把注意力从她们与女权运动的关系上转移开。她们甚至会创造其他的术语来表达她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而避免使用“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创造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无关的术语为那些可能已经不愿意去探究女权主义意义的妇女们提供了现成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不愿意参加。这说明了对已遭曲解的女权主义概念的一种不加批评的接受，而不是要求对它进行重新定义。妇女们在脱离她们所理解的女权运动时可能会支持对某些具体的问题的探究。

专栏作家鲍勃·格里恩(Bob Greene)在旧金山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姐妹——内心”，对很多妇女对“女权主义”这个词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反感进行了评论。格里恩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很多妇女“显然相信骄傲的女权主义者所信仰的一切，但却回避‘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把它当作一种讨厌的、不愿意与之有联系的东西”。尽管这样的妇女常常承认女权主义所带来的提高某些群体妇女社会地位的改革措施给她们带来了好处，但她们不愿意被看作是女权运动的参加者：

> 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说服她们。“女权主义者”这个术语一直让很多富于智慧并且雄心勃勃的妇女感到不安和尴尬。她们就是不想与它有任何联系。
>
> 似乎它有一种她们不愿意涉及的令人讨厌的涵义。很可能如果你向她们介绍女权主义的主要信仰时她们会样样都支持——即使她们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会赶忙否认。

很多妇女不愿意宣传女权主义是因为她们对这个词的含义还不能确定。其他来自少数民族的受剥削和压迫的妇女回避这个词是因为她们不希望被认为是在支持一场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常常被等同于为白人妇女争取权力的努力。有很多妇女把女权主义视为女性同性恋的同义词；她们对同性恋的恐惧使她们拒绝与被认为是支持同性恋的任何组织产生联系。有些妇女害怕“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因为她们不想介入任何政治运动，尤其是被认为激进的政治运动。当然也有不希望与任何形式的妇女权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她们拒绝并且反对女权运动。大多数妇女对有关“妇女解放”的负面观点比对女权运动的积极意义更加熟悉。我们现在必须通过斗争来恢复和维持的正是这个词的积极的政治意义和力量。

当前的女权运动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术语。对这个词的定义所采取的“什么都行”的态度使它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什么都行”意味着通常任何一个想取得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的妇女，无论她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她可以是一个右翼的保守分子，也可以是国家共产主义者），她都可以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大多数为女权主义定义的企图都反映了运动的阶级本质。概念原来是很宽泛的，并且把焦点集中在个体的妇女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力上。在芭芭拉·博格（Barbara Berg）的著作《记住的门：美国女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把女权主义定义为“包括了妇女解放诸多方面的广泛的运动”。然而，她强调的是妇女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为了扩大以上概念，她又补充道：

> 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命运;摆脱了由他人控制的角色;摆脱了社会的压制性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充分表达她的思想并且自由地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女权主义要求接受妇女的个人良知和判断的权力。它要求妇女的基本价值是来自她的普遍人性而不是基于她生活中的其他关系。

女权主义的这一概念基本上是与政治无关的;但它是吸引了很多自由女性的概念。它唤起了一种非常浪漫的有关个人自由的想法,这要比强调激进政治行动的概念更能让人接受。

很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知道无论是强调妇女是有着自主权的自由人的女权主义还是强调获得与男性机会平等的女权主义,都不能消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和男性统治。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压迫的斗争。因此,一场消除统治思想的斗争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统治思想充斥着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同时还要对社会进行重组,以使人类的自我发展能够压倒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和物质欲望。用这样的方法下定义,妇女们参加女权运动就不会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对这样定义的女权主义的承诺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有建立在思想和信仰上的批评性的政治意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它最初是被用来强调妇女每天的现实生活是由政治形成并且也必然是政治性的)这个口号逐渐成为一种手段,鼓励妇女去思考其受歧视、剥削或者压迫的经历是与她对形成其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理解相一致的。其结果是,很多没有完全审视自己处境的妇女们对她们所处的政治现实及其与妇女群体的关系从

没有形成一种综合性的了解。她们受到鼓励来说出她们的个人经历。就像革命者为改变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命运一样，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们有必要强调看清和描述一个人自身现实的能力是自我恢复这个长长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但这仅仅是开始。当妇女们把描述她们自己的悲哀与发展一种批评性的政治意识是相似的这一观点内在化时，女权运动的进展便停滞了。从这种不完善的观点出发，所形成的理论和策略都不恰当和有误导性就不足为奇了。为了纠正过去分析的不当，我们现在必须鼓励妇女们对女性的政治现实形成一种敏锐而全面的理解。只有在我们审视了个人的政治、整个社会的政治以及全球性的革命政治以后，才会产生更加广泛的观点和看法。

从强调集体和个人经历的政治角度给女权主义所下的定义激发妇女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超越非政治的性别歧视制度是我们的命运，并且还要提高政治觉悟。妇女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解到，我们大多数人是很少谈论政治的。即使是在妇女们于当今女权主义的全盛时期谈论着性别主义政治，而不是让这种带着严肃政治内容的讨论引发对妇女社会地位的综合、彻底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坚持认为男性是"敌人"，是导致我们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于是我们只注意妇女与男人至上理论和性别歧视思想之间的关系。玛莱纳·迪克森(Marlene Dixon)在她的文章"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一种阶级分析"中强调指出，把注意力集中在"男性是敌人"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一种"心理压迫政治"，反映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把剥削的社会基础神秘化"的世界观。通过批评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应该是取得两性的社会平等的普遍观

点和强调应该消除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我们自己的分析实在需要一种对妇女的政治现实的各个方面的探索。这将意味着种族和阶级压迫与性别歧视一样会被当作女权主义问题来加以探讨。

当女权主义被这样定义，从而使人们注意到妇女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时，它将所有妇女的经历集中了起来，尤其是那些政治运动对其社会状况极少涉及、研究或改变的妇女的经历。当我们不再把重点放在“男性是敌人”这个简单化的立场上，我们便不得不去审视统治制度和在其维持和永久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缺乏充分的概念使资产阶级妇女——无论其观点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很容易地在运动及其发展方向中维持她们的统治地位。这种霸权在多数女权组织中继续存在着。这些有权力的人常常使那些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妇女们感到自己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她们根本不可能打破这种统治的模式。由于这种社会化，这些妇女们常常感到我们对于女权运动中的白人的、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的惟一反应是抛弃、拒绝或者背离女权主义。这种反应对于那些希望在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实践中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妇女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威胁。她们希望我们保持沉默，被动地接受她们的思想观点。她们更希望我们说话反对“她们”而不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有关女权运动的思想。

女权主义是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它的目的不是仅仅使某一群体、某一种族或者阶层的妇女获益。它不是使妇女享有男性所没有的特权。它有能力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既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现成的、可以让人直接进入的身份或者

角色。很多妇女把精力从旨在变革社会的女权运动中移开，转而注意一种反文化的发展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的形成，在这样的世界中女性几乎可以不接触男性。这种尝试并不表示对大量的不能把自己的文化表现与其他以女性为中心的社团所提出的幻想结合起来的妇女的尊重或者关心。玛丽·达利(Mary Daly)在她的著作《超越圣父上帝》中敦促妇女们放弃“由父权制体系所提供的安全”并且建立一个全新的、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珍妮·葛罗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指出当女权运动把中心放在建立一个新的空间上时所产生的矛盾：

> 创造“相反世界”把巨大的压力放在了试图从事这个计划的妇女们身上。这种压力来自这样的信念：这种努力的惟一真正的源泉是我们自己。完全是父权制的过去则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
>
> 如果我们不保留与其他人(和产生其特征的历史背景)的对话而开始着手创造一种不同的文化，我们便没有现实来检验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冒真正的危险，即文化的统治意识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在女权运动中进行着重新复制。

把女权主义斗争与生活在一种反文化的、妇女中心的世界里等同起来会产生一些障碍，把这项运动与大多数妇女隔离开来。尽管有性别歧视、剥削或者压迫，但很多妇女仍然觉得她们的生活是重要而且宝贵的。于是让她们为了另一种“女权主义”的生活方式而离开或者放弃这样的生活的建议自

然会遭到抵制。由于感到她们的生活经历被降低了价值,被认为是消极的和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妇女对女权主义的反应是猛烈地反对。通过抵制认为只有当妇女们创造了一种亚文化(无论它是生活空间或者甚至是在很多校园里受到排斥的像妇女研究的空间)才会产生的另一种女权主义"生活方式"的观点,并坚持认为无论一个个体的妇女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开始女权主义斗争,我们才能创立一种以我们的共同经历为中心的运动,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持续不断的运动。

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里,妇女们成立了很多以分离主义为导向的社团,于是运动的中心便从发展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转移到了对身份的强调。一旦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存在,要使它维持下去只有妇女们一直认为这是她们可以实现自我和得到自由的惟一空间。在设想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身份之后,妇女们常常去寻求"女权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妇女没有看到它是通过破坏女权主义运动来实现其设想,即"女权主义"只是妇女们在寻求其身份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的另一种事先包装好的角色。把女权主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一项政治承诺说明了这项运动的阶级本质。毫不奇怪,把女权主义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同起来的妇女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未婚、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常常是没有社会和经济责任的学生,而作为劳动阶层的、贫穷的妇女则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责任,她们是劳动者、是母亲、是主妇和妻子。有时同性恋者会寻求把女权主义与生活方式等同起来,但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我们的社会对同性恋的妇女有着偏见和歧视,所以另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社团是创造一种积极、肯定的环境的惟一手段。

尽管成立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不需要把它与"女权主义"生活方式等同起来）有着积极的原因，如愉快、相互支持和资源共享，但其对创造反文化空间的强调使妇女们远离了女权运动，因为这样的空间可以是教堂、厨房等等。

由于渴望社团、联系和一种共同目标的感觉，很多妇女在女权主义组织中寻找支持网络。在所谓"安全的"、"支持的"、以讨论女权主义思想为中心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关系里，她们得到一种个人的满足，于是不去问其他妇女对于社团是否有着同样的需要。当然，尽管受到剥削和压迫，但很多黑人妇女和来自其他种族的妇女们并没有觉得在她们的生活中缺少妇女团体。以女权主义为中心，作为一种发展共同的身份和社团的方式，对于经历过社团的妇女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她们寻求的是在她们的生活中结束剥削和压迫的方法。她们也许会对致力于消除性压迫的女权主义策略产生兴趣，但她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感到强烈地需要一种"女权主义"的身份和生活方式。

常常强调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会使人产生一种置身于实践中的错觉。然而，在任何以彻底的变革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中的实践不可能仅仅致力于为想要成为激进分子的人经历安全和得到支持创造空间。目的在于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积极地使参加者们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而斗争很少是安全或者愉快的。

我们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义务，反对强调个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这不应该与真正的团结理论和实践相混淆。）这种反对使我们投身于革命实践。西方社会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形成的道德规范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这些

规范告诉我们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于是个人的变化也就比集体的变化更加重要。帝国主义文化的这一特殊形式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以妇女个人的形式得以繁衍，把女权主义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这个事实与在理论与实践中不需要产生改变这种政策等同起来，尽管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或者对广大妇女有着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影响。

为了强调参加女权主义斗争是一种政治职责，我们可以避免使用“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句话(一种语言结构用于指身份和自我定义的某些个人方面)而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因为把女权主义不恰当地强调为一种身份或者生活方式，所以人们对它往往采取一成不变的观点。如果我们要修改我们的策略和方向，就有必要把注意力从陈旧的观点上转移开。我发现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意味着我自己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之中。当我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得到的反应往往是“什么是女权主义?”像“我提倡”这样一句话并不意味着很绝对地说“我是”。它不会使我们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这是西方社会所有统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它暗示已经作出的选择，意味着对女权主义的职责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不表明一个人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便失去了支持其他政治运动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对女权运动有兴趣的黑人女性，常常有人问我做一名黑人是不是比做一个女人更加重要；是不是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主义斗争比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更加重要，还是相反。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来源于竞争性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认为自我是由反对一个他者而形成的。因此，一个人不是别的什么，便是女权主义者。大多数人都社会化地用

对抗而不是和谐共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没有把反对种族主义的工作看成是与结束性压迫的工作完全一致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在争夺第一位的运动。当一个人被问起："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似乎就会被理解成这个人只关心女权主义，不关注其他的政治问题。当这个人是黑人的时候，肯定的回答很可能被理解成一种对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的贬低。由于害怕被误解，对于黑人妇女和被剥削被压迫人种的妇女来说要表达她们对女权主义的关注是很困难的。她们对于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谨慎。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转变为"我提倡女权主义"可以是一种消除把身份和生活方式作为中心的有效策略。它可以是一种方法，关注女权主义和其他政治运动的妇女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她们的支持同时避免了把某一特殊群体置于第一位的语言结构。它还会鼓励对女权主义理论的更深入的探索。

定义方面从主张社会平等到强调结束性压迫，这种改变导致了对理论发展的态度的改变。由于迄今为止女权运动的阶级本质和种族等级制度，发展理论(一整套作为行动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成为一种任务，专门从属于白人妇女的学术霸权统治。这使得很多处于特权种族或者特权群体之外的妇女们把发展理论的中心，甚至仅仅是措辞的运用，看作是一种只是为了加强精英群体而发挥作用的关注。这种反应加强了认为发展理论是白人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观念。在女权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有特权的白人妇女们，无论在观点上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她们都鼓励黑人妇女贡献出她们的个人经历、私人故事。个人经历对女权运动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代替理论。夏洛特·本奇在"女权

主义和教育:不是逐渐的"一文中解释了理论的特殊重要性:

> 理论让我们能够从长远目标的角度和全面看待世界的观点来看待眼前的需求。它提供了一种框架让我们可以用来评价长期和短期进展中的各种策略并且看到这些策略可能会带来的变化。理论不仅仅是大量的事实或者一套个人观点。它包括了建立在可利用的知识和经历上的解释和假设。它还依赖于有关如何解释这些事实、经历及其重要性的推测和洞悉。

由于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给女权主义下定义的方式使之显得对黑人妇女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于是她们便可以得出结论说黑人妇女不需要对发展理论做出贡献。我们要提供多彩的生活故事来记录和证明一系列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假设。(也许在瓦莱利·阿莫斯(Valerie Amos)和布拉蒂哈·帕玛(Pratibha Parmar)的文章"挑战帝国主义女权运动"中可以找到一种关于黑人妇女对女权运动的反应的有趣讨论。)把争取与男性的社会平等作为女权主义的定义导致了对歧视、男性的态度和法律改革的强调。女权主义作为一场结束性压迫的运动,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统治制度和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迫使我们关注妇女的经历和忍受着性压迫冲击的妇女们的社会困境,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美国妇女共同的社会地位的方法。把女权主义定义为结束性压迫对于理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指出探索和分析的方法的起点。

未来女权主义斗争的基础必须牢固地建立在这样的认识

上：即认识到必须消除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潜在的文化基础和原因。不挑战和改变这些哲学结构，女权主义改革将不会有长久的影响。因此，提倡女权主义的人目前有必要共同认识到我们的斗争不能被定义为一场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的运动，像“自由女权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这样的术语代表着一些必须解决的矛盾，这样女权主义就不会被继续同化，服务于特殊利益群体的机会主义目标。

3 女权运动的意义

当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引起了人们对全球范围内妇女受剥削和压迫问题的注意。这是女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贡献。她们渴望揭示出性别主义中的不公平，妇女们几乎仅仅把焦点集中在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上。不幸的是，它使女权主义看起来更像是两性之间的战争宣言而不是一场结束性压迫的斗争，一场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变革的斗争。白人妇女解放论者的花言巧语之下所暗示的意思是男性从女权运动中什么也得不到，女权主义的成功将使他们成为失败者。好斗的白人妇女们特别热衷于把女权主义运动变成一种妇女凌驾于男性之上的特权。她们的愤怒、敌意和激动如此强烈，以致于禁不住把运动变成了一个她们发动攻击的公共讲坛。尽管她们有时把自己看作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但她们的反应却是反动的。从根本上讲，她们认为所有的男性都是所有女性的敌人，并且提出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女性国家、隔离的社区来解决这一问题，甚至还提出要镇压或者消除所有的男性。她们的愤怒可能成为个人解放斗争和变革的催化剂。它

也鼓励与其他妇女结合来提高认识。它没有加强公众对真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性的理解。

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引发了两性之间的战争。从传统上讲战场是在家里。近几年来，这种战争发生在任何公共的或私人的，有女人和男人、女孩和男孩居住的地方。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在它没有被机会主义的反动力量同化的时候)在于它为两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见面场所，为批评、斗争和改变提供了一个空间。女权运动可以结束两性之间的战争。它可以改变关系使构成人类关系特点的疏远、竞争和非人化被亲切、共鸣和关爱所代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女权运动的正面含义常常被自由组织者和参加者所忽视。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发言人坚决主张妇女拒绝给他人当奴仆的角色，她们没有兴趣使男人们或甚至是其他的妇女们相信女权主义运动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她们非常自恋地仅仅关注女权主义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把她们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建立一种有着广泛基础的妇女运动永远也不是她们议程中的问题。在成立了很多组织后，领导者们表达了一种希望参与者更加多样化的愿望；她们希望那些不是白人、在物质上没有特权、非中产阶级或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参加进来。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从来就认为没有必要向广大的妇女解释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她们相信自己对社会平等的强调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认为这种思想有着其自身的吸引力。从战略上讲，不强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基层的组织、不让每个人都了解女权运动的积极意义，使女权运动显得只与那些参加了组织的妇女有关，从而使之处于一种脱离社会的边缘状态。

最近对女权运动的批评突出了这些失败之处,而没有强调修改策略和中心问题的必要性。虽然当代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着缺点和不足很好地建立了起来,甚至还变得制度化,但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真正的结束性压迫斗争的女权运动,就必须对它的方向进行尝试和改变。为了这项斗争,我们必须在分析的一开始,就让人们注意到消除性压迫可能会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所带来的积极的、变革性的影响。

很多当代女权主义的积极分子们认为消除性压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所有其他压迫的首要矛盾和基础。种族主义和阶级结构被认为是从性别主义中产生的。这种分析方式所暗示的是认为在把注意力集中到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上之前,有必要先消除性别主义这一"最古老的压迫"和"首要矛盾"。认为有一个压迫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并且性别主义处于第一位,会引起一种不必要的竞争性关注。虽然我们知道性角色的区分在最早期的文明中就已经存在,但对这些社会的了解却不足以让我们对妇女受剥削或压迫的状况下最终的定论。古代黑非洲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明,那里可能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问题和阶级社会。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可能与统治世界的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是主要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压迫形式。在西方背景中它们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理解,但不是通过一种人类发展的进化模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有形式的压迫都受到传统西方思想的支持。西方文化思想中的首要矛盾是相信优秀的可以统治劣等的。在《种族主义和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中,哲学家约翰·霍奇(John Hodge)认为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是美国所有压迫形式的意识形态基础。

性压迫有着第一位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是其他所有压迫的基础,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控制大多数人经历的做法,无论他们的角色是歧视者还是被歧视者,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它是大多数人甚至还不知道其他的群体压迫存在之前就已经从社会的角度接受了的统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消除性压迫就可以消除其他形式的压迫。所有形式的压迫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受到类似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支持,因此一种剥削体系不可能在其他压迫体系依然保持完整的情况下被消除。在消除所有形式的压迫的斗争中,向性压迫挑战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与其他形式的剥削不同,大多数人是在家庭背景中目击和(或者)经历性别统治的。而我们是在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目击和(或者)经历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的。霍奇在他的文章"双重文化及其范围之外"中强调我们社会中的家庭从传统上和法律上都"反映了有等级的和强迫的权威统治的双重价值",这在父母—孩子和丈夫—妻子的关系中可以得到验证:

> 大多数孩子正是在家庭的形式中首次学会了等级制度和权威统治的意义和做法。在这里他们学会了接受对他们这些非成年人的群体压迫,并且学会男性至上的理论和对妇女的群体压迫。在这里他们知道了男性的角色是在社会中工作、控制家庭的经济生活和给与物质和经济的奖赏或惩罚,而女性的角色只是在男性的经济统治下以母亲的身份提供情感上的温暖。正是在这里他们首先知道并且把上—下、优—劣和主人—奴隶的关系作为

"自然的东西"加以接受。

即使在没有男性的家庭中,孩子们可能也会通过他们与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关系以及对性别角色模式的严格划分来学会评价控制和权威统治。

在大多数社会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血缘结构:一个通过血缘、遗传或感情结合而连接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的地方;一个有着关爱的环境,尤其是对那些因太小或太老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大家共同享用资源的空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性压迫歪曲了家庭的积极作用。家庭的存在是一种空间,在里面我们从出生开始便社会化地接受和支持压迫的各种形式。霍奇在讨论统治的文化基础时强调了家庭的角色:

> 传统的西方家庭有其权威的男性统治和成年人统治,它是首先要求我们把群体压迫作为一种自然秩序来接受的主要的训练地。

即使家庭给了我们关爱,但同时也在教育我们这种爱与拥有统治他人的权力相比是不重要的。权力斗争,强迫性的权威统治和对统治的残酷的维持形成了家庭生活,因此家庭常常是产生极度的灾难和痛苦的地方。于是个人便自然地逃离家庭。家庭也就自然地分解了。

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家庭的分析常常在暗示,成功的女权运动既可以废除家庭为开始,也可以导致家庭被废除。这种想法使很多妇女感到恐惧,尤其是非白人妇女。(瓦莱利·阿

莫斯和布拉蒂哈·帕玛在她们的文章“挑战帝国主义女权运动”中认为欧美女权主义者讨论家庭问题的方式是有着民族优越感的，它使黑人妇女远离女权主义运动。)白人妇女积极分子可能首先把家庭视为一种压迫体系(它可能是一种她们在其中经历严重的虐待和剥削的社会结构)，而很多黑人妇女却发现家庭是剥削最不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家庭中存在着性别主义，但我们可能会拥有尊严、自我价值和人性，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家庭以外的世界中所没有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要面对所有形式的压迫。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知道，家庭不只是由丈夫、妻子和孩子或甚至是血亲所组成的家族；我们还知道由于在各种不同的家庭结构中都普遍信仰性别主义而产生的破坏方式。我们希望能够确立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家庭纽带对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惟一永久的支持体系。我们希望在不贬低家庭生活的条件下消除其中由性压迫而产生的虐待因素。

女权主义讨论中对家庭生活的贬低常常表现了这场运动的阶级本质。特权阶层的个人依靠很多制度上和社会方面的结构来确立和保持其利益。资产阶级妇女可以批评家庭但不相信她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放弃关系、关心和保护的可能性。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她还可以购买关心。由于很多在女权运动中非常积极的资产阶级妇女是成长在现代核心家庭中，所以她们尤其服从于由性压迫所产生的对家庭生活的反常行为；也许她们拥有物质特权，但却没有享受长久的家庭关爱的经历。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贬低使很多妇女远离了女权运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权主义是一项旨在改变家庭关系的激进的政治运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坚持认为家庭结构

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加强统治的模式,由此来对家庭生活加以肯定。女权主义向在我们意识中的西方哲学思想挑战,这种思想认为家庭生活基本上是破坏性的。通过这种挑战女权主义将解放家庭,于是它便可以是一种肯定的、积极的、以性别差异和性取向为基础的没有压迫的血缘关系结构。

从政治上讲,白人至上主义的父权制国家依赖于家庭来向它的成员们灌输支持等级控制和强权的价值。于是,这个国家在确立女权运动将破坏家庭生活这一观念时便有其既定的利益。社会学家巴里·桑妮(Barrie Thorne)在《重新考虑家庭:一些女权主义问题》中收录了一些文章,她指出女权主义对家庭生活的批评被新权力组织在他们的政治战役中所利用:

> 在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有关家庭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要求堕胎的权利、有要求通过立法来规定家庭的顺序和性安排、要求挑战男性的权威、改变妇女的经济依赖和独自抚育孩子的责任等等——是最有争议性的。

女权主义者在家庭问题上的立场降低了女权主义的重要性,使之容易被同化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人们担心家庭正在解体,而那些成为家庭成员关系特征的攻击、侮辱、虐待和暴力掩盖了家庭生活积极的方面。不能让人们认为反对女权主义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途径。女权主义积极分子需要肯定家庭作为血缘关系结构的重要性,它可以使人类繁衍并且养育他们;可以生动地表现性压迫和家庭瓦解之间的关系;它还可

以用实际和幻想的例子向我们说明，当不公平的权威被一种自治的思想、共同的责任和亲密的关系所取代后，家庭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结束性压迫的运动只是一种会在所有家庭中加强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社会改革运动。

在目前的家庭结构中，个人学会了把性压迫当作“自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且愿意支持其他的压迫形式，包括异性统治。有关这个问题霍奇这样说道：

> 在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成年人统治孩子，男性统治女性——都是群体压迫的形式，它很容易被转化成对那些被“种族”（种族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宗教”或“其他手段”所定义的人群的“合理的”压迫。

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破坏这种统治的文化基础上的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加强了其他的解放斗争运动。为消除性别主义而斗争但并不支持结束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的个人，其实是在破坏她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成就。为消除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而斗争但却支持性压迫的人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巩固所有群体压迫形式的文化基础。虽然他们发起了成功的改革运动，但他们的努力不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他们总体上与压迫的矛盾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矛盾，否则的话，他们每天都将在破坏他们自己的基本工作。

但不幸的是，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幼稚的人没有认识到压迫的形式是相互关连的，聪明的政治思想家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盲点。如弗兰茨·法侬、阿尔伯特·迈米、保罗·弗瑞尔(Paulo Freire)和艾米·西塞尔(Aimé Césaire)这些男性，他们的

作品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革命斗争的本质,但他们在其作品中也常常忽视性压迫问题。他们反对压迫,但只是从需要自由的受压迫“男性”的角度来定义解放的含义。弗兰茨·法侬在他的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的第一章中描述了压迫,把殖民者与白人等同起来,把被殖民者与黑人等同起来。到书的结尾,法侬写到了有关克服疏远的斗争:

> 这里考虑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拒绝把自己封存在物质化的过去里的黑人和白人将联合起来。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其他很多黑人来说,联合只有通过他们拒绝接受目前的定义才能实现。
>
> 我是一个男人,我必须夺回的是世界的整个过去。发生在圣多明戈的反叛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
> 每当一个男人把精神上的尊严贡献给胜利,每当一个男人对征服他朋友的企图说不,我的感觉与他的行动是一致的。

在保罗·弗瑞尔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中,有一篇文章帮助我们很多人产生了政治觉醒,它有一种把人类解放说成是男性解放的倾向:

> 因此解放就像婴儿的诞生,是痛苦的。出现的人是一个新人,他只有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为所有人的博爱所代替时才能生存。或者换句话说,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产生于把这个新人带到世界上的阵痛之中,这

个新人不再是压迫者，也不再是被压迫者，而是处于实现自由过程中的一个人。

（在与弗瑞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完全支持对他的作品的这种批评并且强烈要求我让读者也知道这一点。）这些翻译文章中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并不妨碍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们认同或者学习它的内容。这一点降低了但并没有否定这些作品的价值。但它也的确支持和延续了性压迫。

很多有关革命斗争的政治作品中以及赞同革命政治主张的男性的行为中对性压迫的支持破坏了整个解放斗争。在很多国家人们都投入到解放斗争之中，妇女从属于男性的思想被抛弃，危机的形势迫使男性接受并且承认妇女是他们在斗争中的同志，如在古巴、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但当危机时期过去的时候，旧的性别主义模式常常再次出现，于是形成了对抗，政治团结也被削弱。如果消除性压迫的职责是形成所有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它便会加强和肯定所有的解放斗争。女权运动对于所有渴望结束压迫的群体和个人来说都应该是首要的问题。很多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的斗争）中去的妇女耗尽了她们的精力，因为她们要不断地面对和处理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为了继续的斗争、团结和消除一切统治形式的真诚的许诺，为了它们的利益，激进的政治活动家们不能再继续忽视和远离性压迫问题。

当个人认识到需要为反对一切压迫形式而斗争的时候，便达到了政治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对性压迫的斗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只是对于妇女而言。在把我们从可

怕的性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方面和在使其他解放斗争激进化和使之更新的潜力方面,女权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

4　姐妹关系：妇女们的政治团结

妇女是受性压迫最严重的群体。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一样，性别主义能维持下去是通过制度的和社会的结构、通过实施统治、剥削或者压迫的个人、也通过牺牲者自己，他们已经被社会化而使自己的行为与现状保持一致。男性至上的思想使妇女们相信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只有通过男性或者与男性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价值。所受的教育使我们认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在减少而不是丰富我们的经历。我们还被教育说妇女是“天生的”敌人，我们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团结，因为我们不会，不应该，也不可能相互联合。这些内容我们都学得很好。但如果我们开展一场持久的女权运动就必须把这些都忘记。我们必须学会在团结中生活和工作。我们必须了解姐妹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虽然当代女权运动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团结的场所，但姐妹关系并没有被看作是妇女们将为之而工作和斗争的革命成就。妇女的解放论者对姐妹关系的观点是建立在共同压迫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不用说，主要是资产阶级白人妇

女，她们的观点解放而激进，公然声称相信“共同压迫”的主张。共同压迫的思想是一种错误而虚伪的说法，它掩盖和混淆了妇女们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性态度、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其他偏见把妇女们分裂开来。只有面对这种分裂并为消除它而采取必要的行动，才能有妇女们长久的联合。尽管所有妇女共同的经历很有价值，但对于共同压迫的一厢情愿的思考或浪漫的幻想是不可能消除分裂的。

近几年里，姐妹关系作为一个标语、格言和战斗口号不再能唤起团结中的精神力量。现在有些女权主义者似乎认为，由于我们的分歧，妇女之间的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放弃表达政治团结的姐妹关系的观点是在削弱女权主义运动。团结有助于加强斗争的反抗力量。没有联合阵线——妇女们必须采取主动并且显示其团结的力量——就不会有结束性压迫的、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女权运动。除非我们可以表明分裂妇女的障碍可以被消除、团结可以存在，否则我们就不能希望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变革。重点已经从姐妹关系转移开了，因为很多妇女——她们为所受到的共同压迫、同样的身份和其他共同性而感到气愤——批评或者完全脱离了女权运动。对姐妹关系的强调常常被视为掩盖了处于控制地位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机会主义的情感要求。它被看作是掩盖很多妇女剥削和压迫其他妇女这一事实的隐藏法。黑人妇女积极分子弗罗伦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早在1970年时就在为文集《姐妹关系是有力量的》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妇女之间是否存在团结表示了疑问：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对姐妹关系的奥秘：“我们

> 是姐妹"，"不要公开地批评一个'姐妹'"等等，感到难以接受。当一个女法官问我的当事人她所说的被她丈夫打的瘀伤在哪里（就像家庭法庭的法官西尔维亚·杰芬·莱斯那样），巧妙地说她肥胖，当另一个充满敌意的女法官放弃自己的资格，却拒绝命令好斗的丈夫离开房子时（即使他在其他地方还有适合居住的财产）——这些法官不是我的姐妹。

妇女们反对建立以肤浅的联合观点为基础的错误的姐妹关系是很明智的。如果我们让这些歪曲或者制造这些歪曲的妇女（很多妇女现在告诉我们妇女之间的联合并不重要）引导我们来贬低姐妹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便错了。（在当代女权运动的早期著作中（如《红长袜宣言》）使用了妇女作为牺牲者的形象。琼·卡塞尔在对女权运动中姐妹关系和象征主义的研究著作《一个叫做妇女的群体》中审视了女权积极分子之间的团结意识。像李·弗里茨这样的当代作家也追忆作为牺牲品的妇女形象来鼓励妇女团结。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她的《家庭姑娘》的序言中也讨论了这一趋势。）

当我们相互团结时妇女便会壮大，但我们不可能用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解放论者所说的姐妹关系模式来形成长久的关系或政治团结。根据她们的分析，联合的基础是共同的牺牲，所以她们强调共同的压迫。这一联合的概念直接反映了男性至上的思想。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告诉妇女们做个女人就是做一名受害者。妇女解放论者没有批判这一观点（它掩盖了妇女的经历——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妇女不总是被动的、无望的或者无力的"受害者"），而是迎合它，把共同的牺牲变成了

妇女联合的基础。这意味着为了感觉到女权运动与她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妇女们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而联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过分自信的、自我肯定的妇女常常在女权运动中没有一席之地。正是这种逻辑使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与黑人男性一起)提出黑人妇女非常"强大",因此不需要积极地参加女权运动。也正是这种逻辑,使很多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不再接受受害者的身份时就放弃了女权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渴望被视为"受害者"的、最强调受害者角色的妇女却要比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妇女更加有特权、更加有力。一些有关对妇女暴力的文章便是这种倾向的例子。每天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妇女不能放弃她们对自己的生活行使着一些控制权力的想法,尽管这些权力是相对的。她们不能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因为她们的生存还依赖于继续行使她们所拥有的任何个人权力。对这些妇女来说,在共同牺牲的基础上与其他的妇女联合将对她们造成心理上的道德败坏感。她们在共同的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联合其他的妇女。这正是女权运动应该鼓励的妇女联合。这样的联合是姐妹关系的根本。

作为"受害者"联合在一起的白人妇女解放论者没有被要求去面对她们自己经历的复杂性。她们不会相互挑战来审视她们对与自己不同的妇女的性别主义态度,也不去探索种族和阶级特权对她们与其他种族或阶级的妇女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她们便可以对自己在维护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负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们坚持认为男性是惟一的敌人。她们没有认识到和面对内部的敌人。她们没有准备放弃特权去做那些在发展激进的

政治觉醒中所必须的“肮脏的勾当”(建立政治认识所必须的斗争和面对，以及很多在日复一日的组织工作中完成的乏味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观、政治信仰等等作出客观的评价。然而姐妹关系成了另一种掩盖事实的东西，另一种支持体系。她们对姐妹关系的观点受到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有关白人女性气质的设想的影响，即白人“女士”(即资产阶级妇女)不应该受到任何让她不安或不舒服的东西的困扰，并且不应该接触可能会导致对抗的消极现实。她们对姐妹关系的观点要求姐妹应该“无条件”地互爱；她们应该回避冲突并且把争执降至最小；她们不要相互批评，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要求创造了一种团结的假象，压制了竞争、敌意、不休的争执和辱骂性的批评(垃圾)，这些通常是女权运动中的规则。今天很多有着共同身份的小派别(如 WASP[译注：White Anglo - Saxon Protestant，即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工人阶级、学院派白人妇女和无政府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等等)都在使用这种姐妹关系的模式，但参加这些团体的人尽力去相互支持、肯定和保护，同时则对处于她们选择的群体之外的妇女表现出敌意(通常是通过极度的诋毁)。在一个有选择的范围内团结起来的妇女通过排斥和贬低她们群体之外的妇女以达到加强纽带的目的，这与总是产生在父权制之下的妇女之间的个人团结非常相似——惟一的不同是对女权主义的兴趣。

在当代女权运动的开始，我(和很多其他黑人妇女)常常在妇女研究课、提高意识组织、会议等等这些场合中听到白人妇女们对缺乏黑人妇女参加者这个问题的反映，她们强调这与女权运动的结构无关而是认为黑人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

很多白人积极分子在著作中采用了“强大”的黑人妇女的形象(如萨拉·伊文思的《个人政治》;贝蒂塔·安普萨克的《妇女的遗产》)。

为了在妇女中发展政治团结,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不能固守着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关系。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团结的基础的是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运动的政治职责,而不是共同牺牲或者对一个共同敌人的错觉的反应。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后,我们不会把精力集中在获得与男性的平等这个问题上或者仅仅放在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上。我们不会再接受根据性别压迫的结构而对好女孩或坏男孩所进行的过于简单化的划分。在我们有能力反抗男性的统治之前,必须打破自己对性别歧视的依附;我们必须努力改变女性的意识。妇女们通过共同揭露、审视和消除我们自身中的性别歧视的社会化,可以相互肯定和增强自己,从而为发展政治团结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性别歧视首先表现在男性统治的形式上,这种统治导致了歧视、剥削或者压迫。在妇女之间,男性的性别至上主义价值是通过一种多疑的、防卫性的和竞争性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使妇女们毫无理由地觉得受到相互间的威胁的正是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教妇女们成为男性的性客体,那些对此提出批评的妇女们轻视那些没有对此提出批评的妇女,觉得自己比她们优越,在这种时候性别歧视也非常明显。性别歧视使妇女蔑视抚养孩子,膨胀了工作和职业的价值。妇女们告诉孩子只存在着两种行为方式,即统治或被统治,这正说明了对性别歧视意识的接受。性别歧视教妇女们仇视女性,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接触时我们便有意无意

地将这种仇视付诸行动。

虽然当代女权主义者，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唤起人们注意妇女对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接受，但支持父权制以及不加批评地接受性别歧视思想的妇女们可以忘记那种社会化，这种情况却没有得到强调。支持女权主义被认为与批判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是一致的。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被认为是一种个人转变的标志；于是，价值观改变的过程便不是被忽略了就是不能被解释清楚，因为它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有时，一些旨在提高觉悟的组织为妇女们提供了探究她们的性别歧视的空间。这种对自己和其他妇女的审视态度常常成为一种转化的催化剂。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妇女解放的政治》中描述了交谈小组的作用：

> 妇女们聚集在小组中交流个人的经历、问题和感受。这种公共交流使人们认识到被认为是个人的东西其实是公共的；被看作是个人的问题其实有着社会的根源和政治解决的办法。交谈小组批判了心理压迫的影响，帮助妇女们将它置于女权主义的背景之中。妇女们看到社会结构和态度是如何从出生开始便在塑造她们并且限制她们的机会。她们研究了妇女们在社会中被贬低的程度以及她们是如何对自己和其他妇女产生偏见的。她们学会了自尊并理解群体团结的价值。

在提高认识小组不再受欢迎后，并没有形成新的小组以起到与其相似的作用。妇女们创作了大量的女权主义作品但并没有强调摒弃性别歧视的方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宣扬时尚和对不同的价值进行暂时性的、肤浅适应的社会中,所以我们便会很容易地相信在极少或者根本没有变化的场所产生了变化。妇女们相互之间的性别歧视态度便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在全美,妇女们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辱骂其他妇女,其方式通常是恶意的闲扯(不要把它与进行积极交流的闲聊混为一谈)。电视里的肥皂剧和晚间剧也不断地把妇女之间的关系描绘成相互攻击、蔑视和竞争。在女权主义者中,对妇女的性别歧视表现在对那些没有加入到女权运动中的妇女的辱骂、对她们完全忽视以及缺乏关心或兴趣。这一点在大学校园中尤其突出,在那里,女权主义研究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与女权运动无关的学科或计划。1979年5月,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毕业典礼上对她的听众说道:

> 我不是在要求而是在告诉你们,不要加入到对你们的姐妹的压迫之中。虐待她们孩子的母亲是妇女,必须要有另一个妇女,而不是一个机构来阻止她们这样做。对学校校车纵火的母亲是妇女,必须要有另一个妇女,而不是一个机构来阻止她们这样做。阻止别的妇女在事业上得到提升的是妇女,必须有另一个妇女给受害者以帮助。羞辱顾客的社会和福利工作者也可能是妇女,必须要有其他女同事来平息她们的愤怒。
>
> 我对妇女们相互之间的暴力感到惊恐:职业暴力、竞争暴力、情感暴力。一些妇女对另一些妇女的奴役让我感到惊恐。职业妇女社会中的相互诋毁越来越缺乏尊严也让我感到惊恐。

为了开始一场政治化的、基础广泛的女权运动，妇女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克服在性别歧视的社会化还没有被忘记时存在的相互之间的疏远，如对同性恋的憎恶、以貌取人以及有着不同的性方式的妇女之间的矛盾。尽管女权运动是一个使妇女个体和群体团结到一起的契机，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转变妇女与妇女的关系，尤其是相互之间陌生的妇女或者来自不同背景的妇女。如果我们想建立坚实的个人关系和政治团结，就必须重新开始努力去帮助妇女们忘掉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是妇女团结的另一个障碍。当代女权主义者所表达的姐妹关系的意识形态没有承认白人妇女对其余多种族妇女的歧视、剥削和压迫，使得这两个群体无法感觉她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或政治关注。同时，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使交流变得困难。在黑人和白人女性之间的关系上尤其如此。从历史上看，白人妇女对很多黑人妇女来说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最直接地对她们行使权力，其方式要比带有种族歧视的男性更加地残忍和灭绝人性。今天，尽管受到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的统治，黑人妇女的工作环境中的直接主管、老板或者领导常常是白人妇女。黑人妇女认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从种族统治中得到特权，她们很快地对提倡姐妹关系的女权运动作出反应，指出其矛盾——我们要加入到剥削我们的妇女之中去帮助她们得到解放。很多黑人妇女听到的对姐妹关系的提倡都是在请求帮助和支持一项根本与我们无关的运动。正如托尼·莫里森在她的文章“黑人妇女如何看待妇女解放”中所说的那样，很多黑人妇女并不尊重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也无法想像去支持一项不会给她们带来益处的事业：

> 黑人妇女会嫉妒白人妇女（她们的外表、她们安逸的生活、男性对她们的关注）；她们会害怕她们（因为白人妇女对黑人妇女生活的经济控制）；甚至还会爱她们（如保姆和家里的仆人）；但黑人妇女发现要尊重白人妇女是不可能的……但黑人妇女没有把白人妇女作为有能力的、完整的人来钦佩，无论是与她们竞争极少几个普通妇女可以得到的工作职位，还是在为她们倒垃圾的时候，都把她们看作任性的、可爱的、坏脾气的孩子，而没有把她们视为有能力应付实际问题的真正的成年人。
>
> 白人妇女对实际生活非常无知——可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有男性的帮助，但无论如何她们都是无知的。她们完全依赖于婚姻或者男性的支持（情感上和经济上）。对于性，她们是偷偷摸摸的、完全放弃或压抑。那此有钱人则把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事都交给他人去做。（甚至现在，对于黑人妇女来说听到有关谈论解放的女权主义仍是一件可笑的事，有的女权主义者们家里那些善良的黑人老奶奶正负担着带孩子和擦地的日常劳动，而解放了的那一个则是回到家里检查家务、进行纠正、再和孩子们玩玩）。如果妇女解放需要这些老奶奶才能兴旺的话，它便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很多人认识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所说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在损害贫穷和劳动阶级妇女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她们的利益，而这些受到损害的妇女大都是黑人。当然这不是姐妹关系的基础，而且如果我们加入这样的运动的话，黑人妇女在政治上便

是幼稚的。然而,从政治组织上来看历史上和当前黑人妇女参加斗争的情况,重点应该放在政治团结的本质的发展和阐述上。

白人女性歧视和剥削黑人妇女,但同时在与她们的交互作用中嫉妒她们并与她们竞争。没有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可以产生能使信任和相互关系发展起来的环境。白人妇女用这种忽视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关注的方式形成了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后,她们把呼吁注意种族问题的责任转向了其他方面。在讨论种族歧视或者种族特权时她们不必采取主动,只是听非白人妇女在不以任何方式改变女权运动结构、不丧失她们的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讨论种族歧视问题。有了更多的有色人种妇女参加到女权组织中,她们便可以通过喜欢更多的人加入来表现她们的关注。她们并没有面对种族歧视。在最近几年,种族歧视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讨论中一个被接受的话题,但不是黑人妇女呼吁人们关注它(从运动的一开始就这样做了)的一个结果,而是作为白人女性对这样的讨论进行确认的结果,这是一个表现种族歧视是如何起作用的过程。格罗莉亚·约瑟夫(Gloria Joseph)在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三者的矛盾关系"中说道:

> 到目前为止,女权主义者还没有在一个与性别歧视平等的关系上具体地证实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的潜力或能力。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最近写的有关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文章便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典范。重复了很多黑人女作家已经说过的话,但人们对她文章的称赞再一次表明黑人的有效性需要由白人来证明。

女权主义者们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通常是要把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如此"结构合法化。正如白人至上论者或资产阶级男权统治者的赞助性行动议程一样,那些关于种族主义的冗长讨论或者流于口惠的重要性都旨在唤起对当代女权运动的"政治妥当性"的注意,而非进行彻底地抵制我们社会当中来自种族主义者的压力的斗争(不仅仅是女权运动中的种族歧视)。由于焦点涉及罪恶和个人行为,有关种族歧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含蓄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之所以成其为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个人是种族主义者。她们代表了这个社会中妇女的一小部分。她们开始时可能都是反种族歧视者,但消除种族歧视仍然需要成为一个中心的女权主义议题。种族歧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议题,因为它与性别歧视者的压迫是相互联系的。在西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哲学基础是相似的。尽管带有民族优越论的白人价值观使女权主义理论家们认为性别歧视先于种族歧视,但她们是在企图创造一种进化的文化概念,这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完全不一致的。在美国,维护白人至上即使没有优于维持严格的性别角色划分,但它也是相当重要的。只要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时,对白人妇女权力的关注也就加强了起来,这不仅仅是巧合。即使是在政治上最天真的人都会知道,当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被要求对受压迫的黑人的需要和白人妇女的需要(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作出反应时,它会为了它的利益而对白人作出反应。结束种族歧视的激进运动(一项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的运动)远比那些为了满足向上爬的白人妇女的需要而开展的女权运

动更有威胁。

这丝毫没有贬低女权运动的价值，也没有减少女权运动对于认识反种族歧视斗争重要性的需要。如果女权主义理论向妇女们展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总是相联系的方式，而不是把一项斗争置于另一项的对立面或者公然地忽视种族歧视，那么它是可以做出更大贡献的。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中心问题一直是为妇女争取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力的斗争。白人至上的概念正是依赖于白人种族的延续。白人父权制维持对所有妇女的身体控制是有利于延续白人在全球的种族统治的。任何一个每天忙于帮助妇女得到控制自己身体权力，但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白人妇女积极分子都否定和损害了她的努力。当白人妇女攻击白人至上的时候，她同时也就参加了消除性压迫的斗争。这只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本质相互交织、互补的例证之一。其他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去论证。

种族歧视让白人妇女用与激进斗争毫不相干的方式来构成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种族歧视的社会化教导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认为她们必然比其他群体的妇女更加有能力领导广大女性。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她们不想成为女权运动的一部分，而是想领导它。即使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对于基层组织工作的了解不如很多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但她们也确信自己的领导能力，并且自信地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形成中她们应该占主导地位。种族歧视教人膨胀的重要感和价值感，特别是当它和阶级特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贫穷的和劳动阶级的妇女，或者甚至是个体的、中产阶级的非白人妇女都不会认为她们可以在得到不同群体的妇女的

支持和加入之前就可以发起一场女权主义运动。伊丽莎白·斯帕尔曼(Elizabeth Spelman)在她的文章"种族和性别的理论:对黑人妇女的删除"中强调了这一影响:

> 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它部分意味着白人的自大总的来说被他们与黑人的不同和想像出来的优越性所深深地影响。白人可能认为他们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拥有奴隶或者仇视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的自大感不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它对白人和黑人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白人妇女不愿意面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她们傲慢地认为她们提倡姐妹关系是非种族歧视的姿态。很多白人妇女对我说过:"我们希望黑人妇女和其他非白人妇女参加到运动中",完全没有感觉到她们认为自己"拥有"运动,她们是邀请我们这些"客人"的"主人"。

尽管女权运动中现在的焦点是消除种族歧视,但在理论和实践的趋势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白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现在在课程大纲中包括了黑人妇女的作品,或者邀请某个有色人种的妇女去教授有关她那个人种群体的课程,或者确保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有色人种妇女加入女权主义组织(虽然有色人种妇女的这一贡献是必需的和宝贵的),但她们常常试图掩盖这样的事实:她们完全不愿意放弃她们对理论和实践的支配地位,而这种支配地位如果不是在一个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她们想要操纵有色人种妇女的企图——这是非人化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总是

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个时代》的 1983 年 7 月号发表了特莉莎·法妮西埃罗(Theresa Funiciello)的一封信，其主题是贫穷妇女和女权运动中体现了种族主义本质的妇女运动：

> 在由纽约分会 NOW 主办的有关城市妇女的会议之前，我接到一个来自 NOW 的代表(名字我忘记了)的电话，要求能有一个有特殊资格的福利事业的发言人。提出的要求是她不要是白人——她可能"太会讲话"——(比如说，不能是我)，也不能是个黑人，她可能会"太愤怒"。她也许可以是波多黎各人？她不应该说任何有关政治或分析性的东西，而只能局限在"妇女运动给我带来了什么"这个主题上。

法妮西埃罗组织了一个多种族妇女组织取代了会议作为对此的反应。这种行动表现了姐妹关系的精神。

对种族歧视的另一个反应是取消种族歧视讨论会，这种讨论会通常是由白人妇女领导的。这些讨论会是重要的，但它们的焦点主要是对个人偏见的精神宣泄和心理认识，而不强调政治义务和行动中的相应变化的需要。一个妇女参加了消除种族歧视讨论会，学会认识到她是个种族主义者，她的威胁性并不比那些没有参加讨论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妇女小。对种族歧视的认识只有在带来变革时才会有意义。在消除种族主义的社会化方面，还要作更多的研究、写更多的文章、对所发现的东西进行更多的实际操作。很多白人妇女每天在行使种族特权，但没有意识到她们在这样做(这解释了种族歧视讨论会中强调忏悔的原因)。她们或许并没有有意识

地去了解白人至上意识形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对待与自己不同的妇女的行为和态度。白人妇女常常以共同的种族身份联合在一起,而没有自觉意识到她们行为的意义。这种无意识的维持和白人至上的延续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种族歧视态度的存在的话,便没有人能为改变它而斗争。例如,一群相互不认识的白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共同出席一个讨论女权主义理论的会议。她们也许感觉她们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她们同为女性,但是当一个有色人种的妇女走进房间时,气氛会明显改变。白种妇女会变得紧张、不再轻松、不再愉快。她们不自觉地感觉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因为她们共同的种族身份。把她们结合在一起的"白"是种族主义身份,它直接与作为"他者"和"威胁"的非白种人的经历相关。有很多时候,我与白种妇女谈到种族主义的团结,她们都否认它的存在;这就像有性别歧视的男性否认性别歧视一样。除非白人至上为白种妇女所了解并加以攻击,否则就不可能有白种妇女和各个人种群体妇女之间的团结。

妇女们会知道,当白人女权主义者不是简单地承认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或者唤起对个人偏见的注意,而是积极地反对我们社会中的种族压迫的时候,她们已经开始用一种严肃而革命的态度来面对种族歧视。妇女们会知道,她们已经承担了消除种族歧视的政治任务,当她们帮助改变女权主义运动方向,当她们担任领导职位、形成理论或与其他肤色妇女接触之前,就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的社会化,这样她们就不会再维持或延续种族压迫,或无意、有意地虐待或伤害非白种妇女。这些是建立白种妇女和有色妇女间政治团结基础的

真正激进的举动。

如果有了姐妹关系，那么白种妇女并非惟一必须面对种族歧视的群体。有色妇女必须面对我们对白人至上观念的接受，“内部化的种族歧视”，这会导致我们感到自我嫌恶，相互发泄对不公平、而不是对压迫力量的愤怒，相互虐待、伤害，或导致民族群体之间不努力相互沟通。来自不同民族群体的有色人种妇女会相互敌视、怀恨或者相互竞争。亚洲、拉丁或北美印第安群体常常觉得自己因为共同仇恨黑人而与白人联合。黑种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延续这些民族群体的种族歧视模式和形象。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除非我们承担起责任（不仅仅是在反种族歧视基础上），共同了解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从多样性中获得力量，否则有色人种妇女之间的界限就不会消除。对于隔离我们的障碍以及克服这种障碍的途经，我们需作更多的研究、写更多的文章。我们民族群体的男性常常比我们有着更多的相互接触。妇女想得太多的是工作和家务方面的责任，于是我们便缺乏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我们群体或社区以外的妇女。语言的不同常常妨碍我们沟通；我们可以通过相互鼓励学说西班牙语、英语、日语、汉语等来改变这一状况。

使不同民族的妇女群体交流产生困难、甚至不可能交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一个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在另一种文化中是不被接受的、在跨文化中它会有不同的意义。通过“美国的第三世界妇女”课程的反复教育，我懂得了学习我们所说的相互之间的文化规范的重要性。一位学习日本传统的亚裔美国学生解释说她不太愿意参加女权主义组织，她请别人注意到女权主义者们讲话太快且不停顿，她们领会快，

随时作出反应。她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讲话前先停顿、思考,考虑一个人的话对别人的影响,她感觉亚裔美国人尤其如此。她表示在出席女权主义组织的各种场合里有跟不上的感觉。在我们的班级里,我们学会允许并且理解停顿。在这一文化规范上达成共识,我们的教室里形成了一种允许不同交流方式的气氛。这个特别班的成员主要是黑人妇女。几个白人女学生抱怨说课堂气氛"太敌对"。她们用课前噪声的强度和对峙来说明这种敌对。我们对此的反应是,解释她们所认为的敌意和侵略性,我们认为那是在开玩笑逗乐,是对欢聚时的愉快的一种热情的表达。至于讲话声音响,我们觉得那是许多人在一个房间讲话的结果,也是文化背景的原因;我们许多人都是在每个人都高声讲话的家庭中长大。抱怨的女学生,受的是白种人的中产阶级的教养,把高声直接的讲话与气愤联系在一起,我们解释说我们不是这样联系的,并鼓励她们转变文化规范,把它当作正面的举动。她们转变了规范后,在课上不仅开始有了有创造性的、愉快的经历,并且也懂得了沉默和轻声讲话在有的文化中意味着敌意和侵害。通过理解相互之间的文化规范、学会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们有了共同体和姐妹关系的意识。尊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统一或一致。(我在旧金山为"第三世界妇女在美国"的教学经历大大地丰富了我对不同文化背景妇女的了解。我对那里所有的学生表示感激,特别是贝蒂和苏珊。)

这些由多个种族组成的课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认识和承认我们和别人的差异和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中许多人从小到大都害怕这种差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相互提醒去理解这种差异。我们谈到有必要

认识到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苦难，但我们并不都受压迫，受压迫的程度也不同。我们许多人担心我们的经历不相关，因为这些经历与其他人的受压迫或剥削的经历不同。我们发现，当人们真正把中心放在自己的经历上，而不是以一种竞争的方式与别人相比时，我们便会有更强的团结感。一个叫伊莎贝尔·伊丽戈叶(Isabel Yrigoyei)的学生这样写道：

> 我们受压迫的程度不同。这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我们必须从我们之中讲话，讲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压迫——谈论别人的压迫不应让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就永远不要说。

当我们把中心放在个人经历上，开始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着共同民族背景的人也各不相同。我们对这些差异的理解意味着，没有我们可以被定为“墨西哥人经历”、“黑人经历”等等的单一的经历。一个长在讲西班牙语的农村家庭的美国墨西哥妇女的生活经历，与一个住在资产阶级白人占大多数的新泽西郊区、讲英语的家庭中的美国墨西哥妇女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这两位女性不会自动地团结在一起。即使她们来自同一民族群体，也必须努力地发展姐妹关系。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差异，我们也用我们的倾向去与其他的倾向相比较，来评价某些经历。我们也许认为，同样住在美国的，但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比讲英语的墨西哥人在“政治上更加正确”。我们不再被动接受学到的倾向，用它去进行比较和判断，于是我们便从每一种经历中看到了价值。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经历常常意味着我们有不同的需要，看

到并不存在一种用以提高政治觉悟的策略或公式。通过制订不同的策略,我们致力于团结,同时也承认差异。如果我们要发展政治团结,妇女们就必须探索相互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当有色人种的妇女努力共同相互学习时,我们承担了建立姐妹关系的责任。我们不需要依赖于白种妇女指引我们形成团结;机会主义常常把她们引向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妇女一起在我们内部建立团结。在政治团结、在女权运动中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恢复姐妹关系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划分种族界限时,阶级是妇女间的一个严肃的政治划分。早期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常提出,如果贫困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加入到运动中,阶级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想法是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否定通过剥削而获得的阶级特权的存在。为建立姐妹关系,妇女们必须批判和否定阶级剥削。一个资产阶级妇女,带一个不太有特权的"姐妹"去一家高级餐馆用餐,她也许承认阶级,但她没有抛弃阶级特权——她是在行使这一特权。穿二手衣服,住穷社区低价房子,但一边却在买股票,这不是一种团结那些被剥夺了权力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姿态。至于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方面,阶级的中心集中于个人的地位和变化。除非妇女接受在美国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并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否则就没有超越阶级的妇女联合。

十分明显,女权主义运动至今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白人男性和女性的利益。最近加入劳动大军(女权主义运动鼓励和促进的入口)的很多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凯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在《两份薪水的婚

姻》中强调这些妇女(大多数是白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帮助支撑了衰退的经济：

> 工作的妻子帮助家庭在通货膨胀期间维持生活水平。劳动统计局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973—1974年间，夫妇中一方有收入的家庭的购买力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妻子也工作的家庭则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妇女们会特别努力地维持她们认为受到威胁的生活水平。
>
> 妇女们不仅仅维持着标准。职业妇女们把几百万个家庭带入中产阶级生活。她们的收入意味着家里是住公寓还是住独门独户的房子，孩子是否能上大学……
>
> 在外工作的妻子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富裕——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贫穷。

十多年后，很显然大量的白人妇女个体(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会随着女权运动对追求名利的支持以及在许多行业中的赞助性计划而在经济上迈出大步。然而，大多数的妇女仍然和过去一样贫穷，甚至更加贫穷。对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来说，新闻广播员芭芭拉·沃尔特斯百万美元的薪水代表着妇女的成功。对于那些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只得到微薄的利益(如果有的话)的劳动阶层的妇女来说，这意味着继续的阶级压迫。

李·弗里茨的《梦想者和行动者》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它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自由的妇女试图掩盖阶级特权是以剥削为基础的；富有的妇女支持并且容忍那种剥削；遭受最大痛苦的是贫穷、生活水平低下的妇女和儿童。弗里茨试图通过强

调上层社会妇女心理上的痛苦、她们在男性控制之下的牺牲来唤起对她们的同情。她的“富有的妇女”一章是这样结束的:

> 女权主义既属于贫穷的妇女,也属于富有的妇女。它可以帮助她理解她自身的利益是与所有女性的进步相联的;依赖之中的舒适是一个陷阱;金丝笼也有栅栏;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在为父权制服务中受到过伤害,尽管留下的创伤各不相同。内心的骚动促使她去看心理医生,这可以为这场运动产生力量,只有这样的运动可以治愈她的创伤、让她获得自由。

弗里茨轻易地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只要存在可能经历性别歧视或剥削的富有的妇女,那么统治和剥削便是必然的。她轻易地忽略了阶级斗争。

来自下层阶级群体的妇女毫不困难地认识到社会平等妇女解放主义者在谈论解放的同时也提到了平等地追求名利和阶级灵活性。她们也知道在这样的解放运动中谁将会受到剥削。每天面对着阶级剥削,她们不可能轻易地忽略阶级斗争。海伦是一位在一个资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家中当女仆的白人劳动妇女,在她的文集《妇女危机》中提到了自己对女权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的理解:

> 我认为妻子是对的:每人个都应该是平等的。她不停地这样说道。但是然后她让我不停地在她的房子里工作,我和她是不平等的——她不想和我平等;我并不怪

> 她，因为如果我是她的话也会像她那样牢牢抓住我的钱。也许男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牢牢地抓着他们的钱。这是一场大的战斗，就像它总是关于钱的。她应该知道。她不会给她的“帮佣”丰厚的薪水。她是公平的；她不断地提醒我们——但她不会“解放”我们，就像男性不会“解放”他们的妻子或者秘书或者其他在他们公司里工作的女性一样。

妇女解放主义者不仅仅把心理上的痛苦与物质剥夺等同起来以弱化阶级特权；而且还常常认为它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她们设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妇女遭受着心理和物质上的双重痛苦，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她们的社会地位便应该得到比追求名利更多的关注。当然，遭受心理痛苦的资产阶级妇女比那些遭受物质剥夺和情感痛苦的妇女更加有可能得到帮助。资产阶级妇女和劳动阶层或者贫穷妇女之间在观点上的基本差别之一是后者知道，由于是女性而受到歧视或剥削可能是痛苦而非人的，但不一定像没有食物或栖身之所、饥饿、重病缠身而得不到医治那么痛苦、非人或者有威胁性。如果由贫穷的妇女为女权运动制定议程，她们可能会认为阶级斗争是女权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认为贫穷和被剥夺的妇女要努力地去理解阶级结构以及它使妇女们相互竞争的方式。

坦率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多为白人妇女，她们强调阶级，但并没有有效地在女权运动中改变对阶级的态度。尽管她们支持社会主义，但她们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仍然是由特权形成的。她们还没有形成集体政策来让没有激进政

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妇女相信消除阶级压迫对于结束性压迫的努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们没有努力地联合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这些妇女可能不一定认同社会主义者,但一定赞成在美国有重新分配财富的必要。她们没有努力让所有的妇女都提高认识。她们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谈论白人男性左派、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或者向其他女权主义者解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革命最好的策略。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常常被错误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单独的领域。虽然我呼吁人们注意她们没有采用的方向和策略,但我希望强调的是这些问题不应该在女权运动中由所有的激进分子来提出。当妇女面对阶级主义的现实并且承担消除它的政治任务时,我们便不会再经历女权运动中曾经那么明显的阶级冲突。我们只有把中心放在妇女间的阶级界限上,才能建立政治团结。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把妇女们相互隔离开。在女权运动中,对策略和重点的分歧和不一致导致形成了很多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和特殊兴趣群体对本来就很容易被消除的姐妹关系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特殊兴趣群体导致妇女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应该关注阶级问题;只有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才应该关注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压迫;只有黑人妇女或者其他有色人种妇女才应该关注种族歧视问题。每一个妇女都可以有反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异性恋主义和阶级主义压迫的政治立场。当然,如果她坚决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群体压迫,那么她可以把她的工作中心放在某个特定的政治问题或者某个具体目标上,这种广泛的观点将在她所有的工作中体现出来而不带有特殊

性。如果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反对种族歧视和阶级剥削，有色人种妇女或者贫穷妇女等等在场的话也不要紧。这些问题将被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尽管个人遭受特殊剥削最严重的妇女仍然处于这些斗争的中心。妇女们必须学会接受这样的责任，即反抗可能并没有直接侵害到我们个体的压迫。与我们社会中的其他激进运动一样，当对个人的关注和个人优先权成为参加的惟一理由时，女权主义运动便受到了损害。在我们表现出对所有的人的关注时，便是加强了我们的团结。

"团结"是一个在当代女权运动中很少提到的词。人们更加强调"支持"这一思想。支持可以意味着赞成某个人认为正确的观点，或者为它辩护。它也可以意味着作为较弱结构的支撑或者基础。后一种意义在女权主义者圈子中有着更大的意义。它的价值从对共同牺牲的强调中体现出来。妇女们承认"牺牲"，也就是承认了无助、无力和需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指女权主义者，即"姐妹"的支持。这与对姐妹关系的肤浅观点是紧密相连的。简·鲁尔(Jane Rule)在她的文章"以一切应有的敬意"中评论了它在女权主义者中的作用：

> 支持是妇女运动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汇。对太多的人来说它意味着给予和接受绝对的赞成。有的妇女非常善于在关键的时候从中退出。太多的人则相信没有它则不行。它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产生了很多妨碍理解的障碍并且造成了真正的情感伤害。真正的支持不是对重要判断的迟疑，而是指即使是在有严重分歧的时候也能做到自尊和尊重他人。

如果妇女们带着丰富而不是诋毁的目的来进行批评、加入到建设性的和人道的分歧和争论之中的话,就必须消除妇女们的仇视女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包括相互之间的厌恶、残酷以及恶语相向。当对所有的重要判断都迟疑,妇女对妇女的否定、攻击性的态度也就没有被忘却。当妇女们认为我们是不同的、认为我们必然会有分歧的时候,它就没有被忘却,但我们相互之间可以有分歧、可以争论,但我们的行为不能像是在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战斗,不能感觉到我们通过对他人的恶语相向而丧失自己的尊严。口头上的分歧常常是一个背景,在此妇女们可以证明她们参加了常常是男性之间的有输赢的竞争,尤其是在竞技场上。妇女也必须像男性一样学会如何与他人在不竞争的情况下进行对话。规则暗示妇女可以在不相互诋毁的情况下保持分歧,如果她们认识到她们并非将丧失价值或自尊,即使被批评:"只要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便没人可以污辱它,所以我不必让任何人为我的可怕的敌意而背上错误的包袱。"

妇女们需要在将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形势下走到一起,并且致力于改变那种相互影响,以便相互交流得以产生。这意味着当妇女们真正走到一起,而不是虚伪的联合的时候,我们便会认识到我们是分裂的,我们必须产生出克服恐惧、偏见、怨恨、竞争等等的策略。女权主义者圈子里的极端否定的分歧已经使很多女权主义者回避群体或者个人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中很可能有着能够产生对话的不同意见。安全和支持被重新定义为群体内部的事务,这些群体的参与者都是同一类人,有着共同的、相似的价值观。没有一个妇女会希望进入一种她会在精神上被摧毁的情境之中,妇女们可以在敌意的对

峙中相互面对、斗争并且超越敌意达到理解。结束敌意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它可以成为使我们达到更多的明澈和理解的催化剂，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妇女们需要有经过敌意然后达到理解和团结的经历，只要把我们自己从性别歧视的社会化中解放出来，这种社会化让我们回避交流，理由是我们会被牺牲或者伤害。我曾经多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演讲中我说的话激怒了某个听众，从而导致了武断的、有时是敌对的口头交锋。这种情况让人感到不舒服、消极和徒劳，因为那里有愤怒的声音、眼泪等等，但过后也许我会发现那样的经历会使我和听众都产生更大的明澈和发展。有一次，一位善于言辞的黑人妇女社会学家邀请我到她授课的班里去讲话。那个班里有一位可以被当作白人的年轻的墨西哥妇女。当我说到被当作白人给了她一种与那些黑皮肤的、永远不会被当作白人的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观点的时候，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指出任何一个不知道她种族背景的人遇到她可能都会认为她是个白人并且据此和她产生联系。当时这样的假设激怒了她。她变得非常愤怒并且最后哭叫着冲出了教室。老师和其他的学生一定把我看成是个没有得到一个姐妹的支持反而把她气哭的"坏家伙"。她们对我们的聚会不是愉快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而感到愤怒。我在那样的情境中自然也觉得很难过。可是，几个星期后，那个学生与我联系，探讨她在遇到我之后得到新见识和认识的感受，这对她的个人发展很有帮助。像这种开始似乎只是由于压力或者敌对而显得消极的事件，可以变成积极的发展。如果妇女总是刻意地回避面对面，总是处于"安全"之中，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经历任何革命性的变化、任何个人或集体的改

变。

当妇女们积极地用真正支持的方式来争取理解我们的差异、改变误导和被曲解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便是在为政治团结奠定基础。团结与支持不同。为了团结,我们必须有共同的兴趣、信仰和把我们团结起来、形成姐妹关系的目标。支持可能是偶然的。它可以被给予,但也可以轻易地收回。团结要求的是长久的承诺。在女权运动中,如果我们要发展,便需要差异、分歧和不同。正如格瑞斯·李·伯格斯(Grace Lee Boggs)和詹姆斯·伯格斯(James Boggs)在《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强调的那样:

> 对于矛盾现实的相同评价构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概念的基础。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那些由于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她们的差异和局限,亦即消极性,以促进她们积极地提高。对这一过程的普遍表达是"把坏的东西改变为好的东西"。

妇女不需要完全消除差异以求团结。我们不需要一起承受共同的压迫以求平等地斗争来结束压迫。我们不需要用反对男性的观点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共同分享的经历、文化和思想的财富是那样的伟大。我们可以成为姐妹,共同的利益和信仰、我们对差异的正确评价、我们的为了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和政治团结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5 男性：斗争中的同志

被定义为结束性压迫的女权主义使女人和男人、女孩和男孩都可以平等地加入到革命性的斗争之中。到目前为止，当代的女权运动主要是由妇女的努力而产生的，男性极少参加。这种不参与不仅仅是反对女权主义的结果。自由女权主义者把妇女解放定义为妇女得到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的同义词，于是她们努力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她们，而不是男性，把女权运动称为"妇女的工作"。尽管她们攻击劳动中的性别角色划分，指责制度化的性别歧视把没有报酬的、低价的、"肮脏"的工作分派给妇女，但同时她们也分派给了妇女另一个性别角色的任务：进行女权主义革命。妇女的解放主义者号召所有的妇女都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但她们并没有不断地强调男性应该承担起积极为结束性压迫而斗争的责任。她们争辩说，男性是强大的、是厌恶女人的、是压迫者——是敌人。女性是被压迫者——是受害者。这样的言谈加强了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它把两性间基本冲突的观念置于一种颠倒的形式之中，其中的含意是妇女的能力必然会损害

到男性。

至于其他的问题,坚持"只有妇女参加"的女权运动和充满敌意的反对男性的态度则反映了参加者的种族和阶级背景。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尤其是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有特权的白人男性否认她们平等地拥有阶级特权而感到嫉妒和愤怒。在一定程度上,女权主义为她们提供了一种表达愤怒的公开场所和政治讲坛,她们可以利用它来引起人们注意社会平等的问题、要求变化和促进特殊的改革。她们并不急于让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男性并不享有共同的社会地位,父权并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和种族特权及剥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同样从性别歧视中获益。她们不想承认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尽管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但与那些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非白人男性相比,她们有着更多的权力和特权,受到剥削或压迫的可能性也更小。很多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始终没有关注被压迫的男性群体的命运。为了可以继续行使种族和(或)阶级特权,她们认为这些男性的生活经历不值得她们去关注,于是疏远了他们,同时也把注意力从她们对持续的剥削和压迫的支持中转移开了。像"所有的男人都是敌人"以及"所有的男人都憎恨女人"这样的说法把所有的男人都归为一类,于是便认为他们都在平等地行使着所有形式的男性特权。《红色长袜宣言》是努力把反对男性的姿态作为女权主义中心立场的第一批书面声明之一。宣言的第三条是这样的:

> 我们认为压迫我们的力量来自男性。男性至上主义是统治的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所有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男性至上

主义的延伸；男人统治女人、少数男人统治其他的男人。整个历史中的所有权力地位都是男性统治和男性导向的。男性控制了整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并且用身体力量来维持这样的控制。他们用他们的权力使妇女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所有的男性都从男性至上主义中获得了经济、性和心理上的利益。所有的男性都压迫过妇女。

反对男性的观点使很多贫穷的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尤其是非白人妇女远离了女权主义运动。她们的生活经历告诉她们，与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相比，她们与和她们同一种族和(或)阶级的男性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她们知道这个群体中妇女所面对的不幸和痛苦；她们也了解男人们所面对的不幸和痛苦，并且同情他们。她们有着与他们一起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挣扎的经历。这一点对于黑人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在整个美国历史中，黑人妇女在所有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一直承担着与男性同样的责任。尽管有性别歧视，但黑人妇女一直同样为反种族歧视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当代黑人解放运动之前，黑人男性就经常地认识到了这一贡献。就是这样的纽带把黑人妇女和男性联合在一起。他们已经了解了政治团结的经历。正是这种共同的反抗斗争的经历使黑人妇女拒绝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反对男性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妇女不愿意承认黑人男性性别歧视的事实。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之中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将会通过抨击黑人男性或者对他们作出类似的反应来反对性别歧视或者对妇女的仇视。

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对于在解放斗争中产生的妇女和男人

的联合没有概念,与男性也没有这么多在政治上合作的积极的经历。父权制的白人男性统治通常贬低女性的政治影响。尽管在黑人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但每个人都认为黑人妇女在社会制度中的角色——无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在一次对克劳蒂亚·泰特(Claudia Tate)的采访中,黑人女作家玛娅·安格路(Maya Angelou)谈到了她对黑人和白人妇女在她们各自群体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认识:

> 黑人和白人妇女在我们各自的群体中处于奇怪的位置。在黑人社会群体中,黑人妇女总是处于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在教堂里,总是休斯顿修女、托马斯修女、韦瑟瑞基修女在使教堂充满活力。在世俗群体中,总是洛蒂做饭,是玛丽到正在举行热闹的晚会的波尼塔家里去。而且,在我们的群体中,是黑人妇女抚育孩子。白人妇女在她们的社会制度中地位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儿子、侄子和叔叔的白人男性对白人妇女这样说,或者至少有这样的含义:"我其实不需要你来运行我们的制度。我在某些地方是需要你的,并且你只能留在这些地方——在卧室、厨房、育儿室里和底座上。"黑人妇女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

没有黑人妇女作为参加者和领导者在物质方面的投入,很多黑人群体中的男性统治制度是不会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白人群体中都是如此。

很多黑人妇女拒绝参加女权运动因为她们觉得反对男性

的态度并不是行动的合理的根据。她们相信充满敌意地表达这样的情感会加强原本就存在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对抗，从而强化性别歧视。多年来黑人妇女（和一些黑人男性）一直为克服这种黑人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由内在的种族歧视（即，当白人父权制认为一个群体导致了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所导致的紧张和敌意而努力着。黑人妇女对黑人男性说："我们相互之间不是敌人"，"我们必须反对教我们憎恨自己和互相憎恨的社会化"。这种主张黑人妇女和男性联合的态度是反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如果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强调在反对使我们相互仇恨和害怕的性别歧视社会化中需要女性和男性的话，这原本也可以成为女权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她们选择了强调仇视，特别是男性的妇女仇视，指出它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因此在妇女和男人之间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有活力的政治团结。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有色人种妇女们和积极参加同性恋运动的妇女们一样，不仅仅在反抗斗争中经历了妇女和男人之间的团结的发展，而且承认其价值。她们不愿意把自己与反对男性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联系在一起从而贬低了这种联合。鼓励妇女和男人之间的政治联合以反对性压迫会引起对女权主义的改革潜力的注意。反对男性的观点是一种反动的观点，它使女权运动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可以使白人妇女夺取白人男性的权力，用白人女性至上的统治来代替白人男性至上的统治的运动。

在女权主义者的组织中，女性分离主义的问题最初是与反对男性的观点分离的；它们只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两个观点。很多只有女性参加的性别单一的组织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妇女认识到分离者的组织可以有助于妇女提高认

识，把发展团结的根基置于妇女之中，并且通常可以对运动起到促进作用。人们认为有男女都参加的群体会因为权力的过失而陷于困境。分离者的组织被视为一个必需的政策，而不是一种攻击男性的方式。最终，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平等相结合。

当激进女权主义者，如蒂－格瑞斯·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把性分离视为女权运动的终极目标时，分离者组织的积极意义便消失了。反动的分离主义来源于认为男性至上是我们文化的绝对方面，认为妇女只有两种选择：接受它或者从中退却去创造亚文化。这种观点否定了革命斗争的一切需要，并且对于现状没有任何威胁。芭芭拉·利昂（Barbara Leon）在她的文章"为了融合而分离"中强调男性至上主义者更加愿意女权运动停留在"分离和不平等"之中。她举例提到了乐队指挥安东尼娅·布里科努力把一个全是女性的乐队变成了男女混合的乐队，结果却发现她并不能得到后者的支持：

> 只要安东尼娅·布里科把自己局限于证明妇女是合格的音乐家，那么她的努力便会被接受。要她找来100名可以在乐队中演奏的妇女或者为她们找些经济支持并不困难。但事实证明要寻求对男性和女性在一个真正融合的乐队里演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为融合而斗争是对男性至上的一种威胁，因而也就更难做到。
>
> 妇女运动现在也处于这样的阶段。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接受分离，但那将意味着恰恰失去了发展这项运动的目标。反动的分离主义阻碍了女权主义的发展。

在当代女权运动的过程中，反动的分离主义使很多妇女放弃了女权主义斗争，它甚至保持了一种已经被接受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形式，如，和平运动中自治的妇女团体。作为一种政策，它助长了对女权主义斗争的忽略，使它变成更像一种对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特别是与男性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旨在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改变的政治运动。为了重新把女权主义作为革命斗争来加以强调，妇女们不能让女权主义成为另一个不断表达两性之间敌对的场所。妇女们积极参加女权运动以在反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形成新的、包括男性在内的政策的时候到来了。

所有的男性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支持和维护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女权主义者们在加强我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时，使之达到一定程度，但又不陷于困境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程度就是，我们不强调那种更不被强调的观点，即男性可以不剥削和压迫妇女而过着维护生命的、有意义的生活。像妇女一样，男性也被社会化了，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当他们不需要为自己接受性别歧视而责备自己时，他们必须承担消除它的责任。一些把分离主义作为女权运动目标来推动的妇女激进分子，在听到重点被放在了受到性别歧视迫害的男性身上时感到非常地愤怒；她们坚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敌人"是事实的表现。男性没有受到性别歧视的剥削或压迫，但他们在某种方式上也受到它的迫害。这种迫害是不能被忽略的。当没有办法消除男性对妇女的虐待和压迫的严重性，或者否定男性对剥削行为所负的责任的时候，男性所经历的痛苦便可以作为一种呼吁引起对变化的需要的注意的

催化剂。男性认识到性别歧视在他们的生活中所造成的痛苦的结果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提高认识小组来审视这一点。保罗·霍纳塞克(Paul Hornacek)在他的文章"男人的反性别歧视认识提高小组"中解释了这些组织的目的：

> 男人们说了很多不同的寻求提高认识小组的理由，所有这些都与女权运动有着根本的联系。他们中的大部分正经历着由于他们的男性性别而遭受的情感痛苦并且对此感到不满。有的人曾公开或者私下里接触到过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且不断地被批评是性别歧视者。有的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认识到性别歧视和父权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必须要改变的社会制度的要素。

霍纳塞克描述的提高认识小组里的男人们承认他们从父权制中获益，但也被它所伤害。和妇女的支持小组一样，男人们的小组也有牺牲政治分析和斗争而过分强调个人变化的危险。

分离主义意识形态鼓励妇女们忽视性别歧视对男性人格的负面影响。它强调两性之间的分化。如乔伊法官所说，分离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人压迫女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就是人，我们都受到严格的性别角色的伤害。很多分离主义者觉得后一种观点是同化的标志，代表妇女们拒绝面对男人是敌人这样的事实——她们首先坚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两种观点都精确地描述了我们的尴尬处境。男人的确压迫女人。人们被严格的性别角色方式所伤害。女权主义者应该承认伤害

——它存在。它没有抹去或者减轻男性支持和维护他们在父权制下剥削和压迫妇女的责任，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方式远比由对严格的性别角色方式的男性遵奉而导致的心理紧张或情感痛苦更加严重。

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没有想用任何方式把焦点集中在男性的痛苦上，为的是不会把注意力从男性的特权上转移开。分离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言论指出所有的男性都平等地享受着男性特权，所有的男性都从性别歧视中得到积极的利益。然而那些通过性别歧视意识形态被社会化的贫穷的或者劳动阶层的男性相信存在着他作为男人应该独自拥有的特权和权力，但发现在他的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利益的话，也极少会自动落到他头上。与美国的其他男性群体不同，他总是关注着他所受教育中的男性的观念和他不能按照这样的观念快乐地生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常常被“伤害”，留下情感的创伤，因为他没有社会教给他的“真正的男人”所应该拥有的特权或权力。因为被疏远、受到挫折，于是他很愤怒，于是他可能会攻击、虐待和压迫某一个或者所有的妇女，但他并没有从他对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和维护中得到积极的利益。当他殴打或者强暴妇女时，他并不是在行使特权或者获得积极的利益；他可能会在行使自己被允许的惟一形式的统治中感到满足。促使他对妇女进行性别歧视虐待的统治阶级的男性权力结构从他的行为中得到了真正的物质利益。只要他攻击妇女但不是性别歧视或者资本主义，他便是在帮助维护一种让他获得极少（如果有的话）的利益或特权的制度。他是一个压迫者。他是女性的一个敌人。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敌人。他也受压迫。他对妇女的虐待不是情有可原的。尽管他被社会

化而做出这样的行为,但现有的社会运动会让他能够为自我恢复和解放进行斗争。他忽视这些运动,选择了继续压迫和被压迫。如果女权运动忽视他的尴尬处境,无视他所受到的伤害,或者只是把他作为另一种敌人而一笔勾销,那么我们是在被动地宽恕他的行为。

男人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过程在男人是劳动阶层和贫穷的黑人群体中尤其显著。黑人女权主义者芭芭拉·史密斯在她的文章“对另一篇有关黑人女权主义论文的注释,或者,真正的敌人请站出来?”中说黑人妇女不愿意面对黑人群体中的性压迫问题:

> 把性压迫称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威胁着一个我们一直视为我们的同盟的群体——黑人男性。这似乎是开始分析我们生活中的性关系或性政治的障碍之一。“男人不是敌人”这句话同时忽视了女权主义和父权制的事实,并且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某些男性是敌人这一思想,尤其是白人男性和另一种意义上的黑人男性,那么我们将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一些事情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每天被殴打,为什么会被迫施以绝育手术,为什么我们被我们的邻居强暴,为什么我们12岁时就怀孕,为什么我们的家里有着超过我们可以养活或照顾的数量的孩子。承认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了“仇视男人者”或者必须要为了我们的生活而消除他们。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争取有一个与他们交流的不同的基础而斗争。

黑人群体中的妇女不愿意公开地讨论性压迫，但她们一直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也已被社会化，去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并且很多黑人妇女觉得黑人男性虐待妇女是男子气概受挫的反应——这样的想法让她们认为虐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情有可原的。绝大多数黑人妇女认为只是公开指出这些男人是敌人或者把他们视为压迫者对于改变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用处；她们担心这只会导致她们更大的牺牲。指出压迫的事实，在它之中的或者它本身的，给被压迫群体带来的变化不会比要求额外关注的特权群体多。公开地提到性别歧视通常不会导致对黑人的民权斗争作出反应的制度化的暴力。(不过私下提到时常常会遇到暴力压迫。)黑人妇女没有参加女权运动不是因为她们不能面对性压迫的事实；她们每天都在面对它。她们不参加女权运动是因为她们从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是那些让广大群众看的文章中，看不到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女权主义把男性视为敌人的言论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如果女权主义者呼吁人们注意统治阶级男性和普通大众男性之间的关系，后者尽管没有得到什么维护生活的利益，但还是被社会化而去维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那么这些男人可能已被激发起来去审视他们生活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在提到男人对妇女的虐待时常常把它当作是在行使特权而不把它视为一种道德沦丧、精神错乱和丧失人性的表现。例如，在芭芭拉·史密斯的文章中，她把白人男性看作是“美国社会中的主要压迫群体”并且讨论了他们统治他人的本性。在这段文章的最后她作了这样的评论：“不仅仅是富有和有权力的资本主义者约束和毁坏了生活。强奸者、

杀人犯、运用私刑者和普通的抱有偏见的人也由于这种白人的男性特权而在行使着真正的、暴力的权力。"这段陈述的含义是认为对妇女进行暴力犯罪的行为既是特权的一种表示也是对它的一种肯定。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使男人们相信他们对妇女进行暴力虐待是有益的——尽管这没有什么益处。然而，当我们始终把这些行为看作是反常的权力关系、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控制力、情感上的软弱、极端地失去理性以及在很多情况下是精神彻底错乱的表现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也肯定了这样的逻辑。男性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可以肯定地理解这种非正常的行为。只要男人们被灌输把对妇女的暴力虐待与特权等同起来的想法，那么他们就不会理解这对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也不会有改变的动力。

投入女权革命的个人必须提出男性可以忘记性别歧视的途径。当代女权运动从没有鼓励妇女们向男性指出他们的责任。有些女权主义言论完全"拒绝"与男性有关的妇女。多数妇女解放主义者都说："妇女已经照料、帮助和支持别人太久了——现在我们必须得为自己考虑考虑了。"妇女在性别歧视中帮助和支持男性长达几个世纪后，突然受到鼓励让她们收回她们的帮助，因为这成了一个"解放"的问题。坚持把焦点集中在个人主义、自我的重要性和由妇女解放主义者所理解的"解放"上并不是一个空想的、激进的有关自由的概念。但它的确为妇女个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与帝国主义父权制国家所维护的、把独立与自我陶醉等同起来的独立思想是一样的，而且缺乏对战胜其他人的关注。这样，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只是转移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不是在

攻击它。她们没有对现状提出实际的选择方法。事实上，即使“男人是敌人”这样的表述基本上也是男性至上的“女人是敌人”学说的逆转——现实版的古老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回顾过去，强调“男人是敌人”显然把注意力从改变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上转移开了，也从男人和妇女共同合作忘却性别歧视的途径上转移开了。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妇女利用了两性之间自然分化的概念来吸引人们对努力得到平等权力的注意。她们希望能从把男性描绘成敌人、把女性描绘成受害者中得到很多东西。她们是这样一群妇女：一旦她们在阶级特权中得到了平等便会抛弃她们与男性的联系。她们最终更加关心的是在阶级特权中得到平等而不是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斗争。她们坚持与男性隔离加强了这样的感觉：她们这些没有男人的女人需要平等的机会。大多数妇女由于经济不独立，在离开男性后不会有自由。认为妇女可能通过不与男性接触来反抗性别歧视的分离主义观点反映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观念。凯茜·麦卡利斯（Cathy McCandless）在文章“关于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一些思考”中指出，从很多方面讲分离主义都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分离的。”但她也讲道：

> 从社会的角度说这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你越富有，你就可以越少承认那些自己所依赖的人。钱可以让你买到很多的距离。如果有足够的钱，甚至可以对男人看都不看一眼。控制着你看着的人是一种极好的奢侈，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多数妇女的日常生存都得和男性有

> 面对面的接触,不管她们喜欢与否。在我看来,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批评那些与男性有联系的妇女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还近似是在批评受害者。尤其是如果出来规定这种标准的妇女是白人或中上阶层的妇女(我自己的经历中就常常是这样的)和那些不适用于这些规定的妇女的话。

贬低那些迫使很多妇女保留与男性接触的生活必需和不尊重妇女希望与男性保持接触的愿望一样,都给那些可能对女权主义非常有兴趣但又觉得她们不能达到政治上的正确标准的妇女造成了不必要的利益冲突。

女权主义的作品虽然谈到了危机,但没有充分地谈到妇女在与男性的日常的微妙接触中应该如何直接参加到女权主义斗争中。如果女权主义谈到由于性别歧视无所不在因而存在着负面因素的交流方式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它便在政治上与那些每天都在公开和私下与男性有接触的大量妇女是相关的。每天都与男性接触的妇女需要能让她们把女权运动与她们日常生活相结合的策略。由于当代女权主义没有充分地提及或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困难的问题,所以它把自己放在了社会的边缘而不是中心位置。很多妇女和男人都认为女权运动正在"那里"发生着或者发生过了。电视告诉他们"解放"了的妇女是一个例外,她首先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广告中会表现一个白人妇女从职业装换成轻薄暴露的衣服,还一直在唱着:"我把熏肉带回家,放在锅里炸,永远也不会让你忘记你是一个男人",这种广告重申了她对名利的追求将不会妨碍她扮演男性至上社会中为妇女设定的性客体的陈旧角色。

声称支持妇女解放的男性常常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了他们觉得有负面影响或局限性的固定的特殊、严格的性别角色后他们将从中获益。他们最愿意也是最渴望改变的角色是作为经济提供者。像上面提到的那种广告是在向男性确保妇女可以是负担家计的人，或者是"惟一负担的人"但仍然让男性统治她们。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的文章"男性的解放"探讨了这些男性利用妇女问题来使自己获益，特别是那些与工作有关的问题：

>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男性想从劳动力中退出来，让他们的女人去工作养活他们。男人们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不喜欢激烈的竞争，也不喜欢有老板。这就是所有关于作为"成功标志"和"成功人物"的抱怨和牢骚。那么妇女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尤其她们得到的工资还比男性低40%，通常做更乏味的工作，而且还很少得到"成功"的机会。但对于妇女来说，工作往往是在家庭中、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得到平等和权力以及一些独立的惟一途径。一个男人可以放弃工作和很多东西而仍然在家庭中保持主人的地位，为自己赢得很多的自由时间，因为他干的工作和他的妻子或情人干的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除了妻子的工作和自己的职业之外还要分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而他并没有努力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好、去结束残酷的竞争、去摆脱老板，而是让他的女人去工作——这和过去花钱找替身替自己服役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更加卑鄙。而这一切都是以结束"陈腐的角色区分"或者类似的胡说八道的名义做的。

这样的“男性解放运动”的形成只是对妇女试图让女权主义服务于男性个人的机会主义利益的解放运动的一种反应。这些男性把自己看作是旨在解放男性的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他们把严格的性别角色视为他们牺牲的根本原因,而且,尽管他们想改变有关男性的概念,但他们并不特别关注他们对妇女的性剥削和压迫。自我陶醉和普遍的自我同情是这些男性解放群体的特征。汉尼斯克在她的文章中作出这样的结论:

> 妇女们不想假装软弱和被动。我们不想要虚伪、软弱和行为被动的男性,也不想要虚张声势的超人或者别的什么。女人要的是男人的诚实。女人希望男人勇敢——勇敢的诚实,在他们的追求中敢作敢为。勇敢的热情、性感。妇女们希望她们自己也是如此。是男人们变得大胆激进的时候了。敢于去探寻他们自己剥削的根源,看到并不是妇女或者“性角色”或者“社会”造成了他们的不幸,而是资本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是男性勇敢地说出他们真正的剥削者并和他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

敢于对性别歧视和性压迫诚实的,选择承担反对和抵抗它的责任的男性常常发现他们自己是孤立的。他们的政见受到反对女权主义的男人和女人的蔑视,而且还常常被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所忽视。莫利斯·科勒利(Morris Conerly)在圣克鲁斯的地方报纸上谈到了他为公开支持女权运动所作的努力:

与几个男人交谈的时候肯定会提到妇女解放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大笑、窃笑、生气的嘀咕和谴责。有人一致认为男人处于一种被围困的处境之中，所以必须紧密团结以抵抗被误导的女性的攻击。必定无疑地，有的人会来问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我完全支持妇女解放。这让他们非常惊奇，他们看着我就好像我的眉毛上爬着虱子一样。

他们在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一个明白女人不是我的敌人的黑人。如果我是一个有权力的白人，就可以理解要维持现状的原因。即使那样，对剥削和压迫他人的道德沦丧的学说的保护将是不可原谅的。

科勒利强调说公开支持女权运动对他来说并不容易，这需要时间：

为什么要花些时间？因为我知道对妇女解放的支持将会给我带来的负面反应，这种反应让我感到恐惧。我能在自己的脑海里听到来自兄弟姐妹们的这样的声音："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谁是穿裤子的？""你为什么穿着那种白人的狗屎衣服？"等等，等等。当然这样的攻击我是预料到的，但到那时我的信仰已足以让我承受公开的嘲笑了。

发展伴随着痛苦……但我的经历是具有真实性的。

积极从事反对性别歧视斗争的男性在女权运动中有着一席之地。他们是我们的同志。女权主义者们已经认识并且支

持这些承担起反对性压迫的男性的工作——例如针对暴力者的工作。那些认为这种参与没有价值的妇女解放主义者必须重新考虑和重新审视革命斗争发展的过程。由于与女性的关系而产生痛苦,个体的男性有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的趋势。通常一个女性朋友或伙伴已经让人们注意到了他们对男性至上的支持。乔·斯诺德格拉斯(Jon Snodgrass)在他为自己编辑的书《致反对性别歧视的男性:一本知识读物》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告诉读者:

> 当妇女的解放运动中有一些方面吸引了男性,那么我的反应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男人的反应。我受到运动的威胁并报以愤怒和嘲笑。我相信男人和女人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不是女人受到男人的压迫。我争论说"男人也受到压迫",需要解放的是劳动者!我并没有看到男人和女人(劳动阶级)之间的等级差异,也不把它归因于男性的统治。现在我认为我对父权制的视而不见是因为我的男性特权。作为男性中的一名成员,我不是忽视就是压制了妇女的解放。
>
> 我对妇女运动的全部介绍是通过一种个人关系……随着我们关系的发展,我开始不断听到对性别歧视的批评。作为男性的反应,开始的时候我报之以愤怒和否认。不过,后来我及时认识到了这种批评的正确性,最终甚至认识到了我对这种批评的否认中所带有的性别歧视。

斯诺德格拉斯参加了男人提高认识小组并于 1977 年编辑了这本读物。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男性反对性别歧视

小组的兴趣下降了。即使男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支持妇女的社会平等的思想，但是与妇女一样，他们没有把这种支持与结束性压迫的斗争、与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女权运动等同起来。把女权运动视为结束性压迫斗争的男性必须在他们反对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斗争中更加地明确和公开。只有男性在结束性别歧视的斗争中承担了同样的责任，女权运动才会反映出我们想消除的性别矛盾。

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励我们相信妇女可以独自开始女权主义革命——事实上我们不能。既然男性是维护和支持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主要动因，那么只有让男性承担起改变他们和整个社会的意识的责任才能成功地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经过几百年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后，有比过去更多的非白人在呼吁人们注意白人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必须扮演的主要角色。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同样如此——男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加适合领导女权运动；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在反抗斗争中承担同样的责任。特别是男人在女权运动的揭露、面对、反抗和改变他们男性同类的性别歧视这一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当男人表示愿意在女权主义斗争中承担同样的责任、去完成任何必要的工作时，那么妇女将承认他们的革命工作，承认他们是斗争中的同志。

6 改变有关权力的观点

在这个社会中，权力通常是与统治及对人和物的控制等同起来的。积极从事女权运动的妇女们对于权力问题有着矛盾的反应。一方面，她们强调妇女的无力，指责男性把权力当作统治来行使；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妇女权力"，要求平等的权力——政治舞台上的平等保护、经济方面平等的途径。黑人激进妇女塞莱斯汀·威尔把她所撰写的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书起名为《妇女权力》，她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概念——行使结束统治的权力，她认为这是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

> 激进女权主义——这决不包括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所有立场——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是社会中的基本罪恶。人类关系中的统治是她们反对的目标。

激进女权主义者对把权力定义为统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且想改变其含义。但她们的努力没有成功。随着女权的发

展,资产阶级积极分子开始把焦点放在妇女克服她们对权力的恐惧上(其含义为如果她们想要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那么她们就必须平等地参加到对他人的统治和控制之中),从而淹没了对把权力定义为统治和控制的观点的批评。女权运动中对权力概念的分歧体现了个人的阶级偏见和政治观点。对能够产生与男性社会平等的改革有兴趣的妇女们想在现有的体系中得到更大的权力。对革命性的变革有兴趣的妇女很快把行使权力归为一种负面的特点,对作为统治、控制他人的权力和创造性的、维持生命的权力不加以区分。

像菲力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和艾米莉·简·古德曼(Emily Jane Goodman)所写的《妇女、金钱和权力》这类的书籍强调了妇女的无力并且支持妇女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通过工作得到权力,但对妇女行使权力会不会比男性少一些腐败或破坏性的问题却保留了矛盾的态度。在结尾部分,切斯勒和古德曼提到了女权运动中出现的有关权力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她们这样写道:

> 在现在的结构中得到相对或绝对权力的妇女可能只是在模仿男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压迫其他人,包括其他妇女的压迫者。例如,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预算中决定终止给学校的孩子们分发免费的牛奶。
>
> 或者说,一旦有了权力,妇女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获胜并且变得更加人道……妇女有权力欲吗?她们真的能抵御野心的压力吗?她们是不是不在意是为社会还是为自己工作?妇女是不是比男人有着更

> 加道德、更加真实的价值观，或者她们只是有条件地涉及一些短期的个人目标，或者她们只是缺乏信息？
>
> 在某些方面，妇女是不是不想要人对人的控制？妇女会不会因为道德会受到损害而拒绝工作上的升职？妇女会不会对这种控制——权力的道德公平，如果存在的话，提出疑问？

作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她们还提出了很多批评性的问题，如果女权主义者要理解妇女与权力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必须涉及的。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回答，那么很显然妇女不可能在不破坏结束性压迫斗争的情况下依照现有的社会结构所制定的标准来得到很多的权力。

在一条有关《妇女、金钱和权力》的作者的注释中，简·古德曼说道："根本的问题在于妇女如何可能得到足够的金钱和权力来确实地改变社会，而不被我们所必须的价值体系的方式所腐蚀、吸收和同化。"这段陈述表明了对个人获得金钱和权力（他们通过信奉、支持和维护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而做到这一点）的过程缺乏理解，或者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幼稚的拒绝。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把为得到以现有社会结构为标准的权力的斗争视为成功的女权主义斗争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她们认为她们应该首先得到金钱和权力，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为解放事业工作，这种想法对贫穷的和（或者）非白人妇女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这对那些统治群体的白人男性来说倒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些人没有受到那些承认现实的女权运动中的妇女的威胁。

很多女权运动的参加者真诚地相信妇女与男人是不同

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已经被社会化,接受了强调这种差异的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和重申这些差异的重要性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在《妇女、金钱和权力》中作者这样评论道:

> 妇女的价值观,或者说属于妇女的价值观与管理着美国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可能与政治、无知、害怕或者是心理作用无关。无论妇女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被允许追求的——都与男性的不同。

像这样的内容是女权主义者们经常表达的情感。她们把妇女经历的真正本质神秘化。妇女虽然由于性别的原因在社会中被分派了不同的角色,但并没有被教给一种不同的价值观。让妇女们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并且愿意接受一种事先决定了的性别角色的正是她们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接受。虽然妇女没有男性统治群体可以行使的权力,但她们对权力所下的定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和大多数男性一样,大多数妇女从儿童时代开始便受到教育说统治和控制他人是权力的基本表现方式。尽管妇女们还没有和男人一样在战争中杀戮、制定政府的政策,她们和男性统治群体及大多数男性一样,相信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如果让她们进行统治,社会的组成也不会和现在不一样。只有当她们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时,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组建社会。最近用"性别沟"来阐述的有关妇女和男性的感觉不一样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女权主义者提倡男性是敌人和妇女是受害者的观点使妇女们回避了从事创造新

的价值体系的工作。女权主义的参与者按照对妇女经历的性别歧视神秘化来行动，简单地接受这样的想法：妇女和男人是不同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也不同、对权力的概念也不一样，因而固然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很多事实表明妇女是养育者，是维持生命的，而男人则是杀戮者，是武士，是否定生命的。妇女扮演着养育者的角色，即使她们作为母亲或教育者告诉孩子们相信"权力产生公平"，即使她们对孩子们滥用统治和控制，即使她们越来越多地在身体上虐待孩子。当这样的矛盾被指出来的时候，陈旧的女权主义对此的反应是这些妇女在执行男人们的命令，她们已经男性化了。思路狭隘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会把男性的压迫政治的形成和持续与男性化等同起来；这两者是不同的。把它们等同起来后，妇女们便不必去面对导致她们努力地去统治和控制他人的对权力的追逐。女性要承担的统治和控制他人的责任可以被简单地放在男性的身上。如果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着与男性不同的价值观体系，那么她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认可对他人的统治和控制；她们不会接受"权力产生公平"的想法。

如果有更多的女权主义女性积极地对权力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她们将不会有意或无意地用存在于较广泛社会中的阶级和种族等级来开始女权运动。她们不会鼓励妇女们去仿效男性——她们所谓的"敌人"。然而那些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在寻求拥有力量、信心、自信和决定能力的角色模式的时候，她们选择了白人男性统治群体。她们本可能在行为上仿效同样拥有这些素质的劳动阶级妇女。科伦·科利亚斯(Karen Kollias)在她的文章"阶级现实：创造一个

新的权力基础"中鼓励资产阶级白人妇女们把劳动阶级妇女看作角色模式：

> 下层和劳动阶级的妇女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她们的力量表现出来，并且常常还不得不为他人承担责任。而多数妇女虽然也有些力量，但很多人由于她们的舒适和经济上有保障而根本不需要去发展它。
>
> 妇女运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直是消除妇女的软弱，并代之以自信和独立。这部分是因为那些有着某种保护者(成功的丈夫或父亲)的中产阶级妇女觉得对她们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感觉需要围绕它组织起来。这在其阶级背景之中是正确有效的。
>
> 中产阶级的力量模式主要是男性，并且力量通常是与权力等同起来的。另一方面，下层和劳动阶级的妇女，特别是非白人妇女则不能依赖他人来替她们作决定、养活她们。积极控制她们的生命和影响她们周围人的这一过程用作出决定的最基本的天性——生存，给了她们一生的经历。这种作出决定成为强烈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有着强烈自我概念的妇女应该成为那些寻求自信的妇女的典范。

贫穷和劳动阶级的妇女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角色模式，是因为后者认为她们没有练习这个社会所重视的权力的形式。也就是说，她们表现出的力量与经济权力是不同的。她们的权力与统治或控制他人是毫无关联的，而后者正是很多资产阶级白人妇女感兴趣和沉迷的。女权组织中出现的正

是这种权力形式，它在破坏和分裂女权运动。

很多曾经致力于消除性压迫工作的妇女由于对女权主义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感到失望，转而把她们的注意力置于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尽量多地得到权力和特权上。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现在知道当妇女们在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有了与男性同样的地位时，她们也可能与男性一样地行使权力。激进女权主义唤起对两性社会平等的需要的注意，但是男性统治群体只有在确认加入权力领域的妇女将致力于支持和维护现状的时候才愿意承认平等的权力。罗纳德·里根把桑德拉·戴·奥康纳任命到最高法院的事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奥康纳对多数能让妇女对她们的生活有更多控制的改革都是不赞成的，然而她却全力支持维持现状的政策。对她的任命向妇女们，尤其是白人妇女表明了，妇女个人如果支持现有的结构，那么便可以在这一结构中得到权力和声望。毫无疑问，《平等权力修正案》将会通过，如果男性统治群体相信有着激进政治观点的妇女可以在选票上和数量上被超过，像奥康纳这样的保守妇女能让她们保持沉默，而这种保守的妇女将与男性一起行使权力，继续支持白人至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话。这些妇女承认权力的概念是统治和控制，并且行使它，同时向男性保证他们的"男性"绝不会被消除。

男性统治群体能够同化女权主义改革，使其服务于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利益，因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天真地认为妇女会反对现状、有着与男性不一样的价值体系并且将为女权运动的利益来行使权力。这种设想使她们对创造将包括新的权力概念的不同的价值体系没有加以重视。尽管有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否认妇女应该得到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

态规定的权力,但她们会把所有的权力都看作是罪恶。这种反对的想法让妇女们不能以任何新的方式来考虑权力,并且加强了统治和控制是权力的最终表现的观点。同时,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也的确尝试了用新的组织策略来为权力积极地重新定义:交替的任务、意见一致和强调内在的民主。

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在文章"政治变革:关于权力的两种观点"中描述了妇女们尝试对权力进行重新定义时在女权运动中显露出来的挫折。她在文章中强调对创造性的和维持生命的权力的理解,这是把权力与行动能力、与力量和能力或者与带来成功感的行动等同起来的概念。她这样写道:

> 重要的是,这些对权力的理解不要求对他人的统治;精神和成就被理解为在她们之中的满足。这种权力要更加接近妇女运动所追求的东西……
>
> 有关领导、力量和成就的妇女运动的困难来源之一是我们对两种权力概念之间的差别缺乏清楚的了解。两个不同城市的不同妇女所写的一封退出妇女运动的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她们抱怨说被说成是"疯狂寻求机会的机会主义者,残酷而惟利是图,踏着她们无私姐妹的尸体一心追求名利"。信中说不应该把领导素质与希望成为领导者相混淆,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就或生产能力与希望成为领导者(其含义为统治他人)相混淆。这些陈述表明妇女还没有认识到不需要把被理解为精神、力量和有效交流的权力与要求在运动中统治他人的权力等同起来。

这篇文章1974年夏天刊登在女权主义季刊《寻求》上。它发表的时候，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比今天更加倾向于对权力的概念共同提出质疑和批评。潜在地说，对日常关系中的权力发起的女权主义挑战是根本性的，这种日常关系对所有形式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在这个对权力的不同概念讨论得更多的时代，盛行的、被看作是权力的最重要形式的是把权力作为统治和控制来行使。在女权主义圈子中这的确如此。

为了权力（统治和控制他人的权力）的斗争对女权主义运动是永久性的破坏并且可能加速它的灭亡。认为妇女的权力来自行使结束统治的权力的思想在伤感的气氛中被讨论得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被当作维持生命的养育者而受到赞美。在多数女权主义环境中，强调的重点是妇女得到社会所规范的权力。格雷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在他们撰写的《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对这种被误导的获得解放的途径提出了批评：

> 30年代的劳动运动、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有运动、黑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都是从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开始的，但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这样的事实……最终，每个运动都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关心的只是自己。当每个人可能都在谈论黑人权力、妇女权力、工人权力的时候，在最终的分析中大家都是在谈论分散的权力，或者说"一次行动"。没有人在谈论真正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包括的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人类的进步而对整个社会进行重新建

构。

在妇女们可以致力于重新建构社会之前,我们必须抵制这样的观点,即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权力将必然会推动女权主义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它可能会使许多妇女得到更多的物质特权,控制她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命运,这些都是重要的目标。它不会把男性统治作为一个体系来结束。认为妇女在可以有效地反抗性别歧视之前必须得到权力的想法来源于一种错误的设想,即认为妇女没有权力。妇女,即使是我们之中最受压迫的妇女,也在行使着某种权力。这些权力可以被用来推动女权斗争。伊莉莎白·简威(Elizabeth Janeway)在她的重要著作《弱者的权力》中描述了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权力形式。弱者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拒绝接受有权力的人提出的对自身的定义"。简威把这称为"对怀疑之权力的规则性使用"。她解释道:

> 的确如此,一个人可能没有一个连贯的有关自我的概念来与既定的社会神话所分派给他的位置相对抗,而且也没有必要有异议。通过怀疑,他将会被引导去怀疑规定的行为规范,随着他开始不按照规范去行事,不管程度如何,他都会清楚地发现其实处理或理解事物的正确方式不止一种。

妇女需要知道她们可以拒绝有权力者对她们的现实的定义——即使她们贫穷、受剥削或者处于被压迫的环境之中也可以这样做。她们需要知道行使这种基本的个人权力是一种反

抗和显示力量的行动。很多贫穷和受剥削的妇女,特别是非白人妇女,如果她们没有行使她们的权力来拒绝有权者对她们现实的定义,那么便不可能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很多女权主义思想反映了妇女对有权者所规定的女性的定义的接受。即使组织和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不是被动的、不自信的或者不能作出决定的,她们也维护了认为这些特点是典型的女性特征的思想,这种观点反映了男性至上主义者对妇女现实的解释。她们没有将这两种角色区别开,即很多妇女所设想的在与男性同类和(或)男性权威人士的关系中的被动角色,以及她们所设想的相互之间、与孩子之间、与那些个人、女性或社会地位比她们低的、被她们视为下等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中的自信的、甚至是盛气凌人的角色。这只是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没有拒绝由男性有权者所定义的关于妇女现实的简单化观点的一个例子。如果她们行使了怀疑的权力,那么她们便会对指出妇女经历的复杂性,对认为妇女必须是被动的或不自信的观点进行解构。

没有行使怀疑的权力使妇女们难以否定盛行的关于权力的概念,也难以形成新的观点。当女权主义者努力促使妇女们通过工作获得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时候,她们并没有给她们提供行使这种权力的指导和明智的忠告。妇女们没有得到提醒要保持政治意识,即只有带着推动女权运动的目的有意识地行使她们新得到的权力,这种权力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她们不情愿,有时不愿意承认得到以财富的形式表现的权力,是和支持对下层妇女和男人的剥削和压迫相近的,不承认这样的权力极少被个人用来给予这些群体。维维安·高尼克(Vivian Gornick)在她的文章"走自己的路的代价"中提出了这

一观点，她把妇女得到经济自足和积累财富区别开来：

> 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不剥削别人的情况下挣到很多钱，绝对不可能。如果是我，我会让资本主义和这个消费社会明天就结束；它除了贪婪和不公平之外没有产生任何东西。我愿意看到一个物质体验和需求都被控制在最小程度的世界……认为金钱带来权力和独立的观点是一种幻想。金钱所带来的只是想要更多的金钱。

有些妇女解放主义者鼓励妇女们相信她们在成功、金钱和权力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在传统上由男性统治的领域中）会推动女权主义运动。这些妇女需要知道她们的成功对妇女共同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减轻性压迫或者消除男性的统治。当这种个人主义使她们把个人成功和激进的政治运动等同起来的时候，这种个人主义便是一种危险的自恋。个人成就如果既满足了个人的抱负，又服务于女权斗争的共同利益，那么它才会推动女权运动。

只要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社会，就不会有多数的女性可能进入现有的权力等级之中。如果那些永远不会成为规定和行使统治和控制权力者的妇女被鼓励关注这些权力的形式，并且把自己看作受害者，那么女权运动是不会发展的。这些妇女应该行使的权力的形式可以让她们抵制剥削和压迫，让她们可以致力于改变社会，从而让政治和经济结构将为了妇女和男人的平等利益而存在。女权主义者必须强调这些妇女所行使的权力的形式，说明它们可以如何被

用来服务于她们的利益。妇女在经济领域行使的一种权力形式是消费权力。联合抵制常常被当作一种策略来使用,如果不提经济的话它在教育方面还是成功的。如果全美国的妇女都关掉电视以获得一段额外的时间,除了基本必需品之外不购买任何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对妇女的剥削(如,电视上越来越多地表现的对妇女的暴力),那么这些行为将会产生有意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果。由于妇女没有被全部组织起来,她们每天还受到从性别歧视和女性消费中获得利润的男性统治群体的操纵,所以我们从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力。多数妇女不理解她们可以行使的权力的形式。她们需要接受富有批评意识的政治教育,向她们说明如何行使她们拥有的有限的权力。

到目前为止,女权主义作家主要强调妇女由于缺乏经济权力而使她们的角色沦为消费者。菲力斯·切斯勒认为妇女作为消费者是无力的:

> 买东西可能是妇女的天分。妇女们的确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但从价格、重要性、其决定价值和对经济的总体影响上看,这些都是"小"东西。大多数男性控制或者至少参与购买家里的"大"东西甚至"更大的"工业和政府物品。消费权力是真实的——当消费者是有组织、有见识的,并且有足够的权力要求像核弹头这样的"大"件物品的时候。当像家庭妇女和母亲这样的消费者是无组织的、无知的并且只买"小"东西的时候,消费权力便是虚构的。

但妇女不购买核弹头,大多数男人也不买。与切斯勒的有关

购买小东西是不重要的设想相反,仅仅来自妇女时装销售的利润就成为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之一。不停地购买小东西会带来巨额的经济利润和庞大的权力。作为消费者,妇女有权力,并且如果组织起来她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权力来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

女权运动应该,也会对广大妇女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它在唤起对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的注意的时候提出妇女应该行使的权力的话。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应该鼓励(像性别歧视那样)妇女相信她们是无力的。它应该让妇女清楚地知道她们每天行使的权力,向她们说明如何将这些权力用于反抗性统治和性压迫。性别歧视从没有放弃认为妇女是无力的。它压制她们的力量或者剥削它。认识到那种力量、那种权力是妇女可以共同向着解放迈出的一步。

7 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

很多女权主义作品中工作的态度反映了资产阶级偏见。形成女权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妇女认为妇女们最紧迫的问题是要走出家庭去工作——不再“仅仅”是家庭主妇。这便是贝蒂·弗里丹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女性的奥秘》的中心原则。女权主义者声称，走出家庭去工作是获得解放的关键。她们说，工作将使妇女挣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反过来还能让她们反抗性统治。这些妇女谈论工作的时候，她们把它和高收入的职业等同起来了；她们所指的不是低收入的工作或者所谓的当“仆人”。她们被自己的经历蒙住了眼睛，没有看到其实绝大多数妇女（甚至在《女性的奥秘》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家庭之外工作了，可她们从事的工作既不能让她们从对男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也不能让她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本杰明·巴伯在他对妇女运动的批评文章“解放女权主义”中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对于那些寻求打发空闲时间的妇女的意义与它

对大多数人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对一些幸运的妇女、极个别的妇女来说，工作有时会有意义和创造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件不得不做的苦差事，面对耕犁、机器、文字或考数字——接触着产品、开关、文件以得到维持物质生存所必需的钱。

像巴伯提出的这样的批评并没有让当时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们重新审视她们有关妇女和工作的观点。即使把工作作为解放的观点对那些被剥削的、低收入的劳动妇女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它也为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从事或者重新从事劳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动力。它给很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被灌输了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的白人妇女一种支持，让她们忍受低报酬的工作，主要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打破个人封闭。她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享受新的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她们是在为维持不再单单依靠男人的收入来供养她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卡罗琳·伯德在《两份薪水的婚姻》中解释了她们成为劳动力的背后的动因：

无论是专业工作还是"粉红领"工作，妻子们都没有认为她们是处于经济历史的背景之中。她们不知道她们是在创造一次革命，也没有打算这样做。她们中的很多人为工作在家庭里"做帮手"，为了攒钱付买房子的费用、为孩子们买衣服或者支持越来越高的大学费用。她们急切地寻找兼职工作，即那种不会"影响"到她们家庭的工作。70年代出生的孩子没有把妇女们留在家中，而是迫使她们去挣到养活他们的开支，因为家里有孩子的妻子

较普通妇女更加愿意赚钱。

虽然很多这样的妇女从没有参加过女权运动,但她们认为自己是在向有关妇女位置的传统观点挑战。

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工作解放妇女”的观点使很多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特别是非白人妇女出于很多原因而远离了女权运动。像“家务劳动报酬”这样的运动(其组织者同时还向带有性别歧视的工作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起挑战)并没有成功地使公众的有关工作的女权主义概念激进化。巴伯在指出这些妇女常常会由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能使她们获得解放而希望放弃这一问题上是正确的:

> 在很多贫穷的美国妇女中,解放意味着一位母亲最终放弃她的工作而得到的自由——过着呆在家里的资本主义的生活,和过去一样。当然工作对她而言就是擦地或者洗厕所或者在打折衣服上没完没了地缝扣子,这更是一种自我生存而不是自我实现。即使是最廉价的仆人工作也一定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闲时间的尖锐矛盾的一种逃避——如果不是被迫的。能够工作和必须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作为工作者,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从她们的经历中知道工作既不是个人实现也不是解放——它在极大程度上是剥削和非人化。她们对资产阶级妇女所声称的妇女将通过工作得到解放表示怀疑,并且她们也同样受到威胁。她们受到威胁

是因为她们知道新的工作机会不是为那些寻求进入劳动市场的大量白人妇女创造的，她们害怕她们和她们那个阶层的男人都会失业。本杰明·巴伯同意她们的想法：

> 当大量的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妇女进入一个已经有很多相对没有技术的失业工人的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她们的工作可能意味着大量底层的人会失业。占失业人口很大比例的16岁到30岁之间的非白人年轻男性会发现找工作比过去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真正遭受苦难、压迫和不公平进行客观的衡量，并以此为基础规定一些优先权就变得极为重要，并且女权运动所强调的“压迫”这个词的真正代价也体现了出来。性别歧视是与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共存的，而不是存在于它们之中。解放主义者不能期待贫穷者正确地看待似乎是中产阶级斗争的东西把更多的工作从他们那里剥夺走。

黑人妇女和男人们是第一批表达出对已婚的白人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将对有工作能力的黑人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机会的恐惧的群体之一，其严重程度使白人至上主义把非白人阻碍和排斥在某些工作之外。通过把各阶层的白人妇女和非白人聚集到一起的赞助性行动计划，形成了一个让雇用者继续歧视非白人和通过雇用白人妇女来维持白人至上的制度。雇用者不会雇用任何一个非白人，以此贯彻赞助性行动的方针。当我在英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白人教授和他的同行们不断地告诉我，我将是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我的黑皮肤会让我找工作容易一些。但在我读书期间多数赞助性计划

的工作职位都被白人妇女得到了，这一直让我很困惑。当一个黑人(或者一个非白人)被雇用后，通常人们都会认为不再会考虑其他的有色人种了——这种事不会发生在白人妇女身上。但不幸的是，认为白人妇女是少数的女权行动主义帮助形成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曾经为有能力的非白人而设的工作可以给白人妇女去做，于是很多有色人种的人们觉得女权运动是对他们的解放斗争的一种威胁。如果白人女权积极分子敦促在赞助性行动计划中划分出两个类别——一种为与受压迫人种区别开的妇女寻求工作平等——它就不会让人觉得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是在以非白人妇女和男性为代价急于实现她们的目标。

强调工作是妇女解放的关键使很多白人女权主义者想到那些工作的妇女“已经解放了”。她们实际上是在对多数劳动妇女说：“女权运动不是为你们开展的。”这样形成的女权主义思想体系似乎与劳动妇女是无关的，于是资产阶级白人妇女便把她们排除在运动之外了。然后她们形成服务于她们的阶级利益的女权运动，而不用面对女权改革将会给广大劳动妇女所带来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黑人妇女从白人妇女那里得到暗示，认为她们已经在家庭之外工作就说明了她们已经得到了解放，不需要女权运动了。她们应该向这样的思想挑战，即任何工作都将解放妇女，并且要求女权运动关注劳动妇女。

如果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不仅仅是努力让妇女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同时也关注妇女工作场所的条件的改善和为各个阶层的失业妇女找到工作，那么女权主义将被视为一项关注所有妇女的运动。女权主义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追逐

名利,帮助妇女得到高收入的工作上,这不仅使大量的妇女远离了女权运动;它还使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妇女在工作并不表示妇女这个群体得到了经济权力。如果她们看到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的经济状况,她们便会看到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各个阶层的妇女沦为穷人。

既然很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离婚并且发现她们沦落到了贫穷和劳动阶层,于是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开始谈论"贫穷的女性化",并且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的妇女经济状况。芭芭拉·厄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和科伦·斯塔拉德(Karin Stallard)的文章"新穷人"唤起人们注意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进入了贫穷阶层并且强调从 1967 年到 1978 年,各个阶层妇女的贫穷程度增加了,这几年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妇女的经济繁荣时期:

> 冷酷的经济新闻给人造成一种 70 年代是妇女"解放的十年"的假象。对于某些妇女,在某些方面,它是。年轻、受过教育并且有进取心的妇女,通过打拼进入了曾经对她们关闭的职业,如医学、法律、大学教师和中层管理。在媒体上,有着 2 到 3 个孩子和旅行车的郊区家庭妇女是旧式的女性的理想形象,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拿着公文包、穿着套裙的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职业妇女。电视上"新闻节目女主持人"变得和昨天的新闻一样常见,chairmen 变成了 chairpersons,于是有时似乎惟一阻碍妇女的东西是不够"自信"。但是在乐观的画面下面,作为一个阶级的妇女——年轻的、年老的、黑人、白人——正在

> 逐渐失去她们的场所,而其中的黑人和西班牙妇女则更加贫穷,她们遭受着最惨重的损失。

不幸的是,白人妇女并不是偶然地到最近才开始关注这样的损失。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形成了这样一种妇女观点,即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认为这样的损失不发生在那些被剥夺者中间便不需要去注意它们。与此同时,最近很多对妇女和贫穷问题的关注(来自女权主义者和右翼)暗示着由于越来越多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可能有一天会进入贫穷阶层,于是这个问题便更加悲惨,更加值得注意,是一种更加需要改变的状况。这样处理妇女和贫穷的问题给了一个群体的妇女状况以特权。它鼓励妇女们去审视失业、离婚等等给白人妇女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促使我们去关注妇女整体的经济地位。如果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始终在注意整体状况,它就不会对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在失去而不是得到经济地位的情况感到吃惊,也会更早地提出这些问题。

如果用正确的方式处理,对贫穷的攻击可以成为联合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妇女的问题之一。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肯定地说:

> 贫穷的女性化——或者换句话说,妇女的贫穷——可能是当今女权运动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

结束对妇女的经济剥削,可以成为一种关注广大妇女的女权主义议题,从而消除将那些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小群体的妇女和社会中尚未参加有组织的女权斗争的较大群体的妇女分

隔开的障碍。它可以改变女权运动,使它不再服务于某一特殊群体的阶级利益。共同努力提出妇女受到经济剥削的问题将会关注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可能会指出在现有的体制中改善工作条件的方法,尽管这不会根本性地改变资本主义父权制。后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所回避的问题。虽然她们用了很多段落来描述这个问题,但她们只用了一段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

> 我们需要一个女权主义的经济纲要,这不是一个小的议题。有关妇女的需要的经济纲要将必须提到一些有关商业统治经济和男性统治社会中最根深蒂固的不公平。将它指出来会让我们超越由要求平等权力而定义的一些熟悉的舆论——产生新的问题、新的计划、可能还有新的观点。无论是否有过争论或者共同的突破,都太迟了;贫穷的女性化要求一个关于公平和民主社会的女权主义眼光。

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提出妇女应该致力于设想一个新的经济纲领,但她们在文章中却明显避免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我们必须接受这是一种为了其生存而依赖于剥削下层社会的群体的制度。我们还必须接受在这种制度中,很多妇女正是和将会成为阶级压迫的牺牲品。

积极于女权运动的大多数妇女并没有激进的政治观点,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特别是当她们作为个人在现存的结构中达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时候。她们不情愿,甚至不愿意知道支持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甚至一种没有性别歧视

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结束对下层群体的经济剥削。这些妇女害怕失去她们的物质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妇女失去了地位、进入贫穷阶层,她们可能会发现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描述的一个妇女便知道"艰难的时期可以用不平常的方式让我们睁开眼睛"。

由于更多的妇女面对着当前经济体系的破产,我们在通过有效的改革致力于改变妇女目前的经济困境的同时,必须努力去设想新的经济纲领。应该提倡通过缩短工作周的方法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妇女们应该努力结束男人们得到的"家庭工资"。妇女们应该支持福利并且要求福利改革。妇女们需要在一个非常基本的程度上学会如何更有效地支配她们挣到的钱。妇女们需要抵御对强迫性消费的沉迷。从事特殊工作的妇女群体需要组织起来共同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常常使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妇女们长期不健康、不必要地非人化、紧张和绝望。从事服务业的妇女们不知道如何提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她们需要得到指导和建议。可以进行的改革和改进计划是无止境的。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正在被提到,但它们如果得到更多的支持会更加有利。当妇女们看到她们的经济状况是女权运动的一个中心议题的时候,她们便会更加愿意去看待女权主义思想。

妇女们在工作中受到经济剥削,但她们在心理上也同样遭受剥削。性别歧视的思想让她们贬低自己对劳动力的贡献。消费主义使她们相信她们之所以工作仅仅是因为必需或者缺乏,而不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进行创造或者感受一种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的完成工作的满足。女权主义对工作本质的重新考虑将帮助妇女工作者反抗心理剥削,尽管这样

的努力不会改变经济状况。女权主义者如果肯定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无论是有报酬的还是没有报酬的工作,那么她们将为妇女们提供可选择的自我概念和自我定义。女权运动中对职业和事业的关注常常使参加者觉得所有其他的工作,特别是那些低报酬的工作是毫无价值的。于是,女权主义者对那些由广大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态度反映出了男性的态度。

在劳动市场上很多妇女从事的是服务行业,这种工作或者报酬很低或者没有报酬(如,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和其他服务工作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中尤其受到贬低。女权主义者为家务劳动的工资问题进行争论,她们把这看作是给妇女一些经济权力和给她们的工作以价值的一种手段。似乎给家务劳动付报酬不可能导致社会承认这些工作的价值,因为有报酬的服务工作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在有报酬的服务工作中,劳动者们得到经济上的报酬,但这样的报酬并不能减轻她们在心理上受剥削的程度。她们的工作有着与家务劳动同样不光彩的名声。《妇女和新世界》的匿名作者们认为给家务劳动以报酬"这项建议让我们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它把我们带入了市场并且对不光是妇女经济独立而且还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进行标价"。如果妇女接受了家务劳动的工资,那么它可能永远都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不可能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劳动。

有关服务工作和家务劳动的专著实在是太少了(关于家务劳动的书有:安·奥克雷(Ann Oakley)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学》、雷·安德烈(Rae Audré)的《主妇:被遗忘的劳动者》和由爱伦·马罗斯(Ellen Malos)编辑的一本文选《家务劳动的政治

学》)。也很少有女权主义研究涉及到良好的家务劳动对个人安康的贡献、对美学发展的促进和对减轻紧张程度的帮助。通过学习家务劳动，孩子和成年人都可以承担他们要求物质现实的责任。他们会学会欣赏和爱护他们周围的一切。因于这么多的男孩子都没有学习过家务劳动，他们在成长中就不尊重他们的环境，并且常常缺乏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技能。他们被培养了一种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的不必要的依赖，这种依赖的结果有时是不能发展起一种健康的自治感。女孩子虽然常常被迫从事家务劳动，但却通常教育她们这是不体面的，这样的态度使她们憎恨家务劳动并且剥夺了她们本可能通过完成这些必需的劳作而产生的个人满足。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工作，不仅仅是家务劳动，是一件苦差事，她们便会梦想一种不用工作的生活，特别是不用从事服务工作。如果教她们重视家务劳动的价值，她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工作。她们可能把工作视为对个人身份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认。今天，有很多年轻的西方人，包括女性和男性，都在遵循着各种东方的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希望能够达到自我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重新思考他们对工作、尤其是服务工作的态度。他们懂得了戒律是从认真完成各种任务开始的，尤其是那些在这个文化中被认为是“仆人”的工作。

重新考虑工作的本质对美国的女权运动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作为重新考虑的一部分，妇女必须学会尊重工作。很多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没有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妇女学习重视她们所做的工作，无论是有报酬的还是没有报酬的工作，都是一种代表着权力和反抗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姿态。她们的举动似

乎表明只有迫使男性，特别是统治群体的男性承认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比如说把家务劳动变成一种有报酬的劳动），她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如果妇女不重视那种工作，那么男性是否承认妇女工作的价值是无关紧要的。

和这个社会中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体一样，妇女通常普遍对工作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她们贬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告诉她们仅仅用交换价值来判断其重要性。低工资或者没有工资被认为相当于个人失败、缺乏成功、低人一等。和其他被剥削群体一样，妇女把有权者对她们的定义和对她们劳动的评价内在化。她们没有对工作形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把它看作一种尊严、纪律、创造性等等的表现。在格瑞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的著作《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指出了社会中的大多数劳动者，女性和男性，都认为工作是一种奴役形式，他们需要懂得她们通过参加劳动创造了他们的人性：

> 人类可以不工作而生存是难以想像的。有关工作的新的道德规范是从工作对人类的个性来说不可或缺这个观点而来的。但是男人、女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反对强迫工作而斗争，这使我们忘记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工作，我们就不是人类。我们存在于反对劳动和消除旧的劳动原因的技术革命的斗争的历史最高点上。所以我们必须重申人类必须工作，但他们不是以旧的方式和为旧的原因而工作。除非我们相信有新的人类工作的原因，否则便不能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或者新的理由……
>
> 我们需要有两极化，一种对工作的两种态度之间的

> 对立。无论是不是尊敬地称它们为对工作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态度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认识到在这个历史的接合点、转变期，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工作的仇视和批判，破坏人性；另一种是承认工作是人类发展自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从传统上说，工作不属于妇女为了发展她们的个性、自我概念等目的而参加的人类活动范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已经在经济上自立的人，还常常和那些做着没有报酬的劳动、在经济上依赖他人的妇女们一样，不能把他们自己从与性别歧视者的被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些劳动妇女常常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她们发展个性、自我概念等等的场所。她们可能会坚持认为自己有一天会遇到一个“好”男人，从而从工作的需要中解放出来。这种想法使她们去支持和维护性别歧视的思想体系。和劳动阶层的妇女们一样，她们可能从女权主义者对工作本质的重新思考中获益。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的和被迫依赖于福利的妇女被统治群体鼓励把她们自己看作是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存的寄生虫。社会福利制度的构成使接受者要想得到帮助必须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的过程。这个过程常常会产生绝望，使这些妇女麻痹并且使她们不能把自己从依赖者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些妇女也能从女权主义者对工作本质的重新思考中获益。她们可以参加到女权主义者主张的重新建构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努力之中，把它和工作的积极概念结合起来，使它可以引向工作。

如果关注广大妇女的需要，那么未来女权运动将会持续下去。通过致力于重新考虑工作的本质，女权主义积极分子

将会形成运动的方向,使它与所有的妇女都有关系,让她们都来加入。

8 教育妇女：一项女权主义议程

很多当代女权运动的参加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这很容易让我们假定我们的学历身份和特权在妇女中是普遍的，于是我们便没有把教育、特别是基本的读写能力作为女权主义的一项议程来强调。虽然女权主义者已经在教育制度和儿童的社会化中进行了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但她们没有更深地探求这个社会中对妇女的性剥削和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包括缺乏基本的读写技能。女权主义者和学者夏洛特·本奇在她的文章“女权主义和教育”中强调了读写能力的政治重要性：

> 革命运动几乎总是把发展普遍的读写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然而在这个我们认为我们之中多数人能够读和写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
>
> 读和写对妇女来说是很重要的，妇女应该有获得快乐的途径。除此之外，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们对于妇女状况的改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它们提供了一种

传达思想和信息的方式，这些思想和信息可能从大众媒体中是不容易得到的。比如说，妇女解放的思想首先就是通过油印的文章传播的……其次，读和写可以帮助发展个人的想像力和思考能力……第三，这是一种个人途径，通过阅读有关现实的各种阐述，提高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反对文化规范的能力和为社会设想别种选择的能力——这些都是政治行为的基础。第四，读和写可以通过提高妇女在她所选择的为之努力的事业中的活动能力，从而帮助每一个妇女在世界中生存和成功。最后，书面文字仍然是大量交流的最便宜和最容易得到的形式……当我们想起为什么读写能力对运动是重要的，那么很清楚，我们既不应该认为妇女已经能够读和写了，也不应该忽视教妇女读和写的重要性，要把它看作是女权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阶级偏见使组织女权运动的妇女简单地认为把女权主义理论和策略传播给广大妇女的最好的方式是书面材料。仅仅使用书面材料实际上使很多妇女无法了解女权运动。在美国还有地方看不到女权主义作品，在那里妇女和男人从没有听说过"女权主义"这个词，或者听说过但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思。如果从事于制定运动方向的女权主义者考虑到了读写能力的问题，那么她们就会知道强调书面材料会使女权主义思想只能为某些阶级和群体的妇女所了解。她们会知道依赖于书面文字来传播信息的运动还需要重视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学会读和写的计划。虽然印刷的书面材料实际上已成为表达女权主义理论的惟一方式，但读写能力的政治重要性在女权运动中

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强调。很多理论家根本没有打算让她们的思想为广大公众所了解,结果我们必须为终结于公众的想像——比如通过电视——的肤浅而被曲解的女权主义思想承担责任。女权主义者现在开始强调读写能力、为妇女们开始读写培训计划还不算太迟。通过女权主义者开始的读写计划,让来自各个阶层的文盲妇女,特别是那些来自贫穷和劳动阶层的妇女,可以学会读和写,同时学会如何进行批评性的和分析性的思考。

由于很多女权主义者的中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她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身上,既作为学生也作为老师,她们很少或者根本不注意那些缺乏基本技能的妇女的受教育的需要。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为妇女学者和权威创造追求和提高她们工作的机会上。虽然这种努力是重要的,但它不应该比确保所有的妇女都能读会写的斗争有更大的优先权。在美国各个领域都进行很多财政缩减的情况下,不可能让妇女们依赖公共基金来建立扫盲计划。然而,这些计划可以由来自热心于激进政治变革的学术界的妇女和男人们的经济捐助来资助进行。即使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小的扫盲计划也可以在附近和社区里进行,在那里,有政治热情、有技能的人们可以教妇女们读书写字。

即使这个社会中很多的妇女都会读书写字了,女权主义思想还是必须通过口头文字来宣传。很多妇女不愿或者不能离开家去参加女权主义会议、听公开演讲;挨户访问可以成为宣传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方式。这种接触可以由已经参加了女权主义组织的妇女群体来进行。全美很多大学里研究妇女问题的学生在专注于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在智力和学术上的

追求是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妇女有关，与“真实”世界里的妇女有关。如果这些学生走进社区，挨家挨户地讨论女权主义问题，那么他们就是在致力于填补他们的教育经历和广大妇女的教育经历之间的差别。

很多妇女害怕接近陌生的妇女。有一个学期我在一个妇女学习班里教一门叫做“美国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课程，虽然学生们的种族背景每个学期都不一样，但这个学期特殊，所有的学生都是白人。所有的学生都悲叹没有更多的有色人种妇女。我布置给她们一个作业，让她们到校园里去找非白人妇女交谈，问她们不参加妇女学习班的原因。鼓励她们去邀请学生们到班里来。开始时学生们对这个作业感到不安。她们对接近她们不认识的妇女感到不自在。大多数人发现她们的谈话对象常常把不了解课程和老师作为从不听妇女学习课程的首要理由。学生们把她们的发现汇报来之后（有的真的带了一些非白人妇女到班上来），我们讨论了可以让所有的学生更多地学习妇女研究计划的方法。虽然每个人都同意印刷的宣传品（学校报纸或布告栏上的广告）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还是认定与妇女们谈论这些课程是最有效的方法。在对话中，妇女们问问题并且以此消除成见或者她们可能会有的对女权主义和妇女学习计划的害怕。口头交流的重要性对传播女权主义思想是很适用的。在挨家挨户的访问中向更多的听众重新介绍女权主义政策，妇女们可以有机会问问题、阐明问题、给出反馈。如果，在一年的时间里，妇女们不再用几千美元去组织只有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的成员参加的会议，那么带着把女权主义从大学带到这个社会的街头和家庭里的目的，那一年的目标在每个州都将得到很大的超越。

通过妇女的学习计划,女权主义教育在大学里已经制度化了。虽然这些计划是必须的并且在给大学生以女权主义教育方面也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但它们对广大的妇女和男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能让大学生之外的人得到同样知识和信息的相应的妇女学习计划非常少。很多的学生、包括女性和男性,发现他们对性别歧视社会化的重新思考主要是在妇女学习班里进行的。通常他们接受的信息根本地改变了他们对现实的观点,也改变了他们对自然性别角色的观点。这种信息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她或他对女权运动所承担的政治义务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学术的积极实践都可以在当地的社区中心、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男青年会、教堂等地方提供妇女学习课程。即使教授的小时或天数不如他们在大学里那么多,但任何花在能让公众得到妇女学习上的时间都是重要的。

在这一年的"黑人历史周"里我回到我成长的肯塔基小镇进行了一次演讲,题目为《黑人女作家:关于社区的想像》。这次演讲旨在突出黑人女作家利用黑人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方式。我习惯了教授大学课程,那里的学生熟悉文学,我发现要想出办法给他们讲授同样的知识是有挑战性的,这些人(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年龄不同,有识字的,也有文盲,很多妇女对所讨论的作品和作者根本不知道。我主要依赖于读各种形式的东西——诗歌、小说、戏剧——选用对日常事件进行了不寻常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的片断。当我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我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要向听众发出"指示"。我想保持在大学教室里作演讲时的智力水平。于是我在思考的时候便进行了转化——给出同样的信息,但用不同

的方式、简单的句子结构等等。

把思想内容“转化”后传播给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文化水平的听众的能力是女权主义教育者需要有的一种技能。女权主义教育者集中在大学里助长了使用学术理论风格的习惯，这种风格使教师们无法与那些既不熟悉学术风格也不懂得专门术语的人进行有效的交流。教育者们，特别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常常担心，如果用一种能让更多听众接受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将不被其他学者重视。如果这些教育者能考虑用很多不同的风格、“译本”来展示他们的著作，那么他们在让他们的著作让广大群众接受的时候，也会满足严格的学术标准。令人难以理解是很多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问题。一篇用专门的学科术语写成的复杂、抽象的有关革命思想的女权主义文章不会对妇女和男性的觉悟产生它所应该有的影响，因为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读懂它。虽然女权主义学者们觉得用复杂的风格写作比较自如，但如果他们真正希望他们的思想能让尽量多的人了解，他们必须用一种更加易懂的方式写作，或者用他们选择的方式写作并且确保这篇文章用容易理解的方式让其他人接受。

女权主义作品的价值不应该用它是否符合学术标准来衡量。一篇女权主义作品是否有价值也不应该决定于它是不是难读懂。同时，作品也不应该仅仅因为其难读就被舍弃。如果女权主义作品和知识旨在促进和发展女权运动，那么其表现方式和风格就必须与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考虑。如果女权主义思想只能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理解，那么就不会有基础广泛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果书面文字仍然是宣传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女权主义者必须要考虑到没

有受过教育的妇女的教育需要。

教育一直没有在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中首先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和学者与把教育和资产阶级特权等同起来的、对知识分子非常抵制的运动的参加者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形成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实践（运动行为本身）之间一种错误的分裂，使一个群体控制着“实践”。其结果是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无法调和。这会使一些行动（如为那些由于杀死虐待自己的配偶而被关进监狱的妇女组织一个保护委员会）的妇女更加觉得自己比那些专注于理论发展的妇女优越或者“在政治上更加正确”。从一开始，妇女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就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进行一种解放性的女权主义实践（保罗·弗瑞尔把它定义为“为了改变世界而对它采取的行动和反应”）。这种努力被反理智主义和认为自己的“思想”不需要与真实生活联系起来的精英学者们破坏了。

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使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家形成了与多数妇女的生活经历没有或很少有关联的理论、对进行女权主义革命没有用的理论。很多妇女被这些理论所激怒，认为所有的理论都与她们没有关系，从而抛弃了它们。然而妇女们需要知道思想和理论对于设想和开始成功的女权运动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是一场将动员各个群体的人来改变社会的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革命政纲的缺乏了解使妇女们认为思想和理论是不重要的。格瑞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在“辩证法与革命”中讨论了思想对于革命积极分子的重要性：

> 革命主义者寻求改变现实，使它变得更好。因此，革命者不仅需要革命的辩证哲学。他们需要革命的思想体系，如，一套以分析他们所要改变的特殊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设想出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矛盾可以在这样的现实中得到解决，并且把这种解决与对它负责和能够实现它的社会暴力或者军队联系起来。只有在达到了正确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发展革命的政纲才有意义，如，动员和组织革命的社会军队所需要的纲要。如果你们的思想体系是错误的，比如说有误导性或者是有限的，那么所有有关武力行动的光辉计划都必须对这一过程非常清楚——从革命哲学，到革命思想，到革命政纲。

对女权运动中的反理智主义的支持是一个破坏和阻碍进步的思想体系的很好的例证。作为一个群体，妇女被否认(通过性、种族和阶级剥削和压迫)了权力和发展知识的特权。很多妇女被剥夺了获得思想的权力，这种思想有利于促进形成解放斗争中所必需的批评和分析性的理解。这种被剥夺使妇女们觉得知识工作不可靠并且害怕了解新的思想和信息。这可能会使我们因为一些与我们有关的东西具有挑战性而把它作为无关的东西而放弃。

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有色人种妇女常常是反对知识的。我们之中很多人没有上大学的途径，也没有高等学历。我们可能会把白人妇女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支配控制与受教育程度等同起来。我们可能没有抨击这种支配(来自阶级和种族等级)但却“拒绝”了知识。有些有色人种的妇女放弃了理论和有特权的组织工作后，她们可以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投

人到了真正有意义的运动之中。然而接受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后,我们便把自己始终放在一个经验性的位置上,于是便是在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常常是受到白人妇女的鼓励),即她们的角色是做"脑力"劳动,发展思想体系、理论等等,而我们的角色要么是做"肮脏"的工作,要么是用我们的经验来证明和记录她们的分析。有色人种的妇女需要发展知识。虽然我们不必为没有受过某种教育而感到羞耻,但我们需要负起责任,相互促进和帮助用专门的知识来形成组织性的、实用的技能。我们应该审视一下为什么知识妇女中有色人种女性是那么少。我们之中受过教育的、有较高学历的人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蔑视智力活动。有色人种的和来自非特权阶级的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了解知识发展的价值的妇女、明白这会使那些寻求自我恢复和社会的政治变革的受压迫者变得坚强的妇女们,应该让所有的女性都了解她们的认识。我们必须积极地斗争以摆脱女权运动中的反知识偏见。我们必须坚持批判毫无意义的知识工作,坚持促进本身就是女权主义实践的研究和学术工作。

夏洛特·本奇在她的作品中鼓励妇女接受教育的挑战,无论是努力培养读写技能还是发展批评和分析能力。关于妇女对理论的消极态度,本奇写道:

> 在教授女权主义理论时,你必须反击这样的态度,还要找到一些方式去鼓励妇女们系统地思考这个世界。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当今所有的社会)只训练了很少的人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人大都来自社会希望他们控制社会秩序的阶级。当然大多数妇女都没有被期待去进行

> 控制，于是也不鼓励她们进行分析性的思考。实际上，批评性的思考是与妇女的传统角色相对立的。一般认为妇女应该关注的是世俗的生存问题，考虑命运，用一种个人的方式来梦想。没有人要我们分析性地思考这个社会，质疑事物运行的方式或者考虑事情如何会不同。这样的思考与社会有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关系。它要求有信心认为你的思想值得研究并且你会带来一种变化……我教授女权主义思想的目的在于促使妇女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她们的生活和这个社会。

鼓励妇女们争取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应该是女权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

只有我们形成了满足所有妇女需要的教育方法论，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用了 Freire 的另一个短语）对妇女而言才能变成现实。这是一项重要的女权主义议程。

9　结束暴力的女权运动

当代女权运动成功地使人们注意到了结束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的需要。在全美各地都有妇女积极分子为受虐待和被殴打的妇女建立的避难所，旨在帮助这些受害的妇女恢复自我、开始新的生活。尽管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工作，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问题仍在持续增长。女权主义者常常认为这种暴力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暴力形式是不同的，因为它明确地与性别歧视政见和男性至上——即男性统治妇女的权力——相联系。苏珊·谢奇特(Susan Schechter)对被殴打妇女的运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撰写了《妇女与男性暴力》，她在书中不断地强调"对妇女的暴力来源于男性统治"。在"家庭中对妇女暴力的分析"一章中她阐述了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鼓励并且支持了对妇女的暴力：

> 对殴打的理论性解释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实施；通过分析造成对妇女暴力的环境，提出了为结束暴力而进行的运动的方向。对妇女的虐待在这里被视为是表现在

家庭中的传统男性统治的表达方式，并且现在被制度、经济安排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的性别区分所强化。只有对产生殴打的整个环境进行分析，女性和男性才能制定出一个长期的计划以消除它。

虽然我同意谢奇特所说的男性在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是男性统治的表现，但我相信暴力是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所有发生在有权者和无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男性至上的思想鼓励使用虐待的方法来维持男性对妇女的统治，但导致对妇女的暴力、成人对儿童的暴力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暴力的根源是西方哲学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和强迫性权力。性别歧视和其他群体压迫的思想体系都是以这一信仰为基础的；只有消除这一基础它们才能得以消除。

对于旨在结束对妇女暴力的持续的女权主义斗争来说，把这种斗争看作是全面结束暴力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非常有必要的。到目前为止，女权运动一直把焦点放在男性暴力上，其结果也陷入了性别歧视的老调，即认为男性是暴力的，妇女不是；男性是虐待者，妇女是受害者。这种思想方式使我们忽视了这个社会中的妇女(和男性)接受和维护这样一种思想已达如此程度，以致于认为那种用强迫手段维持对被统治者的权力的统治政党或群体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它让我们注意不到或忽视了妇女对其他人施加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行为所达到的程度。妇女可能不像男性那样频繁地使用暴力，但这并不能否定女性暴力的事实。如果我们要消除暴力，必须了解这个社会中支持它的男性和女性群体。

在白人至上的社会等级中,资本主义父权制在理论上使男性有权力,妇女没有;成人有权力,儿童没有;白人有权力,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没有。在特定的形势下,如果权力受到挑战或威胁,无论哪一个当权的政党都有可能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维持权力。虽然大多数妇女明显没有使用虐待和殴打来控制和统治男性(尽管有少数妇女殴打男人),但她们可能使用虐待的手段来维持与她们的权力对象的交互作用中的权力。我们之中很多人成长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家里的男性用虐待妇女和儿童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和控制,我们的问题常常由于妇女们也相信有权力的人用暴力来维持权力是正确的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家庭中的有些妇女对孩子使用强制性的权力(在男性不使用暴力的家庭中的妇女也会如此),有时是没有明确原因的随意的暴力行为或经常性的谩骂。这种暴力与男性对儿童和妇女的暴力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它可能没有那么普遍(这也未必,因为有 90% 的父母曾对孩子使用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虽然强调妇女在处于权力位置时也有可能使用强迫性权力并不能消除男性对女性暴力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意识到这一点会提醒我们妇女和男性一样,必须努力忘记那种教导我们用强权或暴力维持统治是可以接受的社会化。如果仅仅致力于结束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女权主义者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们可能会鼓励妇女抵制男性的强权统治但不鼓励她们反对所有形式的强权统治。

谢奇特在分析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的理论章节"理论建设中的问题"中认为有必须对导致殴打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她用同性恋关系中的妇女有时会遭到殴打这样的事实来提出这种情况如何"符合"把男性统治视为殴打原因的

理论这一问题。她回答说:"你在理论上可以说,以权力和统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模式在这个社会中非常普遍,它们的确影响到了同性之间关系的本质。"不过她不愿意接受这个理论,因为它没有肯定男性的统治是殴打的基础。因此她认为在把两种形式的殴打联系起来之前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我,认为殴打是因为这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认为等级制度和强权是自然的,于是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以权力和统治为基础的,因此所有形式的殴打都是相关联的。哲学家约翰·霍奇在《种族主义和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中认为是在传统的西方男性独裁和成人独裁的家庭环境中,我们大多数人被社会化地接受了群体压迫和使用暴力来维护权力。这些形式构成了我们所有关系的基础:

> 二元论文化中的大多数私人关系都发生在确立的制度中。结果大部分个人关系都包含一种强烈的等级要素。大多数个人交互作用产生于等级结构之中并且由这些结构形成。我们只是考虑了这种关系通常普遍存在于接受了成人统治非成年人和男性统治女性规范的家庭之中。除了这些个人关系之外,其他的个人关系通常还存在于这样的等级结构之中:雇用者—被雇用者、老板或工头—工人或职员、生产者或所有者—使用者、地主—佃户、借出者—借入者、教师—学生、统治者—被统治者,总之,是控制者和被控制者。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统治集团所行使的权力是靠威胁(有用或没有)来维持的,如果这种等级制度受到威胁的话,将会使用

虐待性的生理或心理惩罚。

个人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使用虐待性的暴力来维持统治和控制的最突出表现。它集中体现了等级统治和强权的概念。与对儿童的暴力、或者白人对其他种族群体的种族暴力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被公开宽恕和接受的暴力,在这种文化中它甚至受到赞美。社会对暴力的接受和维持有助于维护它并且使它难以被控制或者消除。通过暴力来支持男性对女性统治的父权制只是对这种接受的部分解释。男性父权制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父权制允许所有的男性在家庭中对妇女进行绝对的控制、决定她们的将来和命运。男人可以随意地殴打妇女而不害怕会受到惩罚。他们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谁、是否让她们读书写字等等。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发展,男性失去了很多这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丧失没有与减少对男性至上意识形态的强调相一致。然而,认为工人是供养和保护家庭的家长的思想已经转变为他的劳动首先使资本主义国家获益。

男性不仅不再对妇女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控制,他们也不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控制。作为工人,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男性(与工作的女性一样)是受控制、被统治的。与工作的女性不同的是,工作的男性每天还被灌输男性至上和权力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力,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但他们没有反抗经济秩序或者进行革命。他们被统治权力社会化了,接受了工作的公共社会中对他们的非人化和剥削,并且让他们期待私人的世界、家庭世界和亲密的关系将使他们恢复自己的权力感,他

们把这种权力感与男性等同起来。他们被教导他们将可以在家庭中进行管理、控制和统治,这是他们接受一种剥削性的经济社会秩序所得到的巨额回报。男性资本主义统治者通过宽恕和维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来阻止对工作的反抗,以确保男性暴力将表现在家庭中而不表现在劳动力中。

妇女成为劳动力也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且从男性那里拿走了更多对妇女的控制。于是男性便更多地依赖于使用暴力来建立和维持性别等级,在这样的等级中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他们的统治曾是决定于他们是惟一有工资收入的人。他们统治妇女的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说是由男性至上的思想构成的)与对"统治"他们的雇用者的被压抑的进攻一起使家庭环境成为导致暴力的剥削紧张状态的中心。由于男性不会因为他们伤害妇女,特别是妻子或情人,而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妇女便成了攻击对象。而如果他们攻击雇主、警察的话是会受到惩罚的。

黑人妇女和男性一直在呼吁对"暴力循环"的注意,这种循环开始于在公共环境中所受到的心理虐待,男性工作者在这种环境中可能会屈从于老板或有权力的人的带有侮辱和贬低性的控制。由于他的物质生存依赖于工作境遇,他不会去攻击或反对会用开除或关押来惩罚他的雇主。他的这种暴力压抑了下来并且在我所说的"控制"环境中释放出来,在这种环境中他不用害怕会遭到报复,他的暴力行为也不会给他带来不幸。家庭通常就是这种控制环境,他虐待的目标通常是女性。虽然他对妇女的暴力表现部分来源于他的情感痛苦;但这种痛苦被释放到了女性身上。当痛苦消失的时候他感到了轻松,甚至快乐。尽管没有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面对或解

决这种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消失了。由于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的男性心理教导男人们承认和表现痛苦是与男性相悖的,而且是缺乏雄性的表现,产生痛苦而不是表现它让男人们找回了完整的男性的感觉。这个社会中很多年轻黑人男性的生活便有着暴力循环的特征,这种暴力的高潮往往是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死亡,他们的生活集中体现了努力实现由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统治群体所社会化地建构的男性幻想的危险性。

与很多撰写有关男性对妇女暴力作品的女权主义者不同,黑人妇女和男性强调"暴力循环",这种循环开始于工作场所,因为我们知道系统的虐待并不是只限于家庭中,尽管暴力虐待更多地出现在家庭中。为了打破这种暴力循环、解放自己,黑人男性和所有的男性都必须对男性至上的性别歧视观念提出批评,去审视资本主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被贬低、被疏远、被剥削的程度。男性必须向把男子气概与对他人行使权力等同起来的男性观念挑战,尤其是通过使用强迫性的暴力对他人行使权力。这一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必须要由不行使暴力的男性来进行,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价值观的男性。很多对妇女采用暴力的男性并不寻求帮助或者改变。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接受并且坚持对妇女使用暴力是错误的。社会因此而奖赏他们,这怎么会是错误的呢?电视屏幕上每天都充斥着男性的暴力,特别是男性对妇女的暴力。它被赋予迷惑力,让人感到有趣和性愉悦。一个男性角色采用的暴力越多,无论是英雄还是坏蛋,他受到的注意就越多。一个男主角常常必须使用非常严重的暴力来征服一个坏蛋。这种暴力是受到肯定和褒奖的。男主角越暴力(通常是为了搭救或者保护一位妇女或者受害者),他从女

性那里得到的爱和肯定就越多。他为了保护而采取的暴力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关爱的表现,是他对女性的"爱"和对人类的关注。

部分妇女和男性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是另一个难以动员大多数人起来结束暴力的原因。在真实生活中,把爱和暴力等同起来是早期的儿童社会化的一部分。1982年10月的《小姐》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简·帕特里克(Jane Patrick)的文章"关于爱、暴力和独身妇女的特别报道",文章呼吁人们关注很多既不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也没有通过法律契约属于男性的妇女也不反对男性的暴力,因为她们把它与爱等同起来。罗德尼·凯特(Rodney Cate)是专门研究家庭学科的教授,他把父母对孩子的暴力与成年人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的接受联系起来,帕特里克引用了他的话:

> 审视一下父母处罚孩子的情况,你便更加容易理解受害者——和施虐者——是如何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的。不难看到,我们如何把某种身体惩罚与爱一致起来,并且相信别人伤害我们是因为爱我们。

很多父母教导孩子暴力是结束冲突和确保权力的最容易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可以让人接受的)。父母在使用暴力来控制孩子的时候对他们说诸如"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爱你"之类的话,这不仅是在把暴力与爱等同起来,而且是在不加解释和讨论的情况下灌输一种爱近似于被动接受的观点。在很多家庭里,孩子和十几岁的青少年发现他们希望与父母讨论问题有时被认为是向父母的权威或权力挑战,是一种"讨厌"的行

为。父母在觉察这种挑战或威胁的时候往往会采取暴力手段。这里再一次需要强调，用暴力、虐待来维持权力是正确的这一思想是由教堂、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教给个人的。

爱和暴力在这个社会中相互缠绕，使很多人，尤其是妇女害怕消除暴力会导致失去爱。像丑角系列丛书这样的通俗爱情读物在十年前并没有描述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但现在却在描述殴打、强奸等行为，并且全部都是在浪漫的爱情故事背景中。有趣的是这些故事中的大多数女性都有专门的职业并且常常有性经历。这些故事认为必须用男性暴力来征服这些“傲慢”的女性，她们虽然在工作场所中与男性平等，但在家庭中必须被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它们很少提出妇女应该放弃工作。她们的工作通常被描写成一种挑战的姿态，这种挑战增加了家庭中性冲突的激情，提高了男性使用暴力把这些“傲慢”的女性变得被动、顺从时的性愉悦。当然，这里的男性总是白人、富有，并且是统治阶级的成员。

几百万妇女用她们辛苦挣来的钱买来这些书，去阅读这些强化性别角色和把对妇女的暴力浪漫化的东西。应该注意到它们也是在支持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这是在鼓励阅读这些爱情故事的妇女接受暴力提高和加强性愉悦的思想。也是在鼓励她们相信暴力是一种男性和男性关爱的标志，一个男性暴怒的程度和他关爱的强度是一致的。于是，女性读者们便认为，如果她们接受爱和关心的话，就必须被动地接受暴力。妇女们的生活常常就是这样的。她们会接受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无论是异性恋的还是同性恋的关系，因为她们不想放弃这样的关爱。她们把忍受虐待看作是她们付出的代价。她们知道自己可以过没有虐待的生活；但却不能过没有

关爱的生活。

提到为什么贫穷的妇女不会摆脱暴力关系，谢奇特说道："贫穷的人们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压迫，暴力可能只是很多虐待中的一种。"当然很多黑人妇女无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都必须面对某种程度的虐待。研究院里的黑人妇女和其他很多处于边缘的群体常常受到教授心理上的虐待，这些教授在他们攻读学位的几年里一直贬低和羞辱他们，或者非常"粗暴"使他们最终放弃。专业位置中显得"能干"的黑人妇女常常是雇主和讨厌她们的同事们的攻击对象。从事服务业的黑人妇女每天都受到可以对她们行使权力的人的轻视、贬低的评价和行为。社会中绝大多数贫穷的黑人妇女发现自己一直服从于公共机构、商店等的虐待。这些妇女常常觉得虐待是她们的多数个人交互作用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在有报酬或利益、在虐待并不是交互作用的惟一特征的环境中，她们更加倾向于接受虐待。由于这种环境通常是男性暴力发生的地方，她们可能不情愿、甚至不愿意结束这样的关系。和其他群体的妇女一样，她们也害怕失去关爱。

直到女性和男性都不再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理解到亲密关系中的不一致和冲突可以不用暴力来解决，拒绝男性应该统治女性的观念，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才能停止，其他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攻击也同样如此。为了帮助结束对妇女的暴力，女权主义者已经首先批评了男性至上思想体系并且揭示了它支持和宽恕这种暴力的方式。然而只有把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作为结束暴力的整体斗争的一部分，它才能得以结束。

当前女权主义者对核裁军的支持把军国主义和父权制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分析对妇女的暴力一

样，这些讨论也倾向于针对男性对暴力的支持——一个限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焦点。很多提倡女权主义的妇女认为军国主义证明了父权制的男性概念和男性统治他人的权力。对这些妇女来说，反对军国主义就是反对父权制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苏珊·科恩(Susan Koen)在介绍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集《我们并非无路可走：给妇女的关于核思想的手册》时这样写道：

> 我们认为由核活动所引起的暴虐仅仅是这个每个领域都有着统治和剥削特征的文化的最后和最严重的表现。出于这个原因，世界上核思想的存在只能被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强烈要求把核力量和核武器问题与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观点区别开来，这些观点产生于对这一问题的有限的理解，于是也限制了可能的解决方法。然后我们争论说这些控制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的、由男性定义的结构直接产生了核工厂和核武器的增长。父权制是这个问题的根源，由核思想所带来的即将来临的危险让我们注意到父权制的基本问题。

把军国主义和父权制等同起来后，提倡女权主义的妇女们在她们的争论中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即男性是力量、攻击的同义词，代表着统治他人的愿望和对他们实施暴力；女性则是软弱、被动的同义词，代表着养育和维持他人的生命。这种二元论的思想是西方社会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的基础。即使它转化或者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目的，如核裁军，它也是危险

的，因为它加强了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它促进了一种陈旧的、认为男性和女性天生不同的观念，认为女性由于性别原因，在支持和维护帝国主义（和服务于维持帝国主义制度的军国主义）或者其他的统治制度方面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有人争辩说男性被教导把男性气质与行使暴力的能力等同起来，而女性则被教导把女性气质与养育等同起来，但事实上很多女性和男性并没有遵守这些陈规。当代大多数有关女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讨论把妇女的角色进一步神秘化，而没有为妇女阐明我们在维持统治制度中所行使的权力，也没有提出反抗和改变的策略。

与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教义相应，妇女在这些讨论中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被谈论着。我们没有被描述成是像男人一样作出政治选择的劳动者和行动者，而被描述为被动的观察者，对积极维持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毫无责任，这个价值体系声称暴力和统治是人类交互作用中最有效的交流工具，这是一个鼓吹和挑起战争的价值体系。有关女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讨论并没有向妇女阐明我们在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中担任的角色，似乎所有的女性都是反对战争、反对使用暴力的，而男性是问题之所在、是敌人。这是对妇女经历的歪曲，不是对它的澄清或重新定义。贬低妇女扮演的角色必然导致对妇女真实情况的歪曲的观点。我使用了“贬低”这个词，是由于男性发起战争和制定战争政策而妇女只是被动地看这一观点拒绝把妇女看作一种积极的政治存在，即使在我们从属于男性的时候。被认为是低劣的或从属的必然定义出一个人究竟是谁或者他到底如何行动，这种设想是性别歧视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否认妇女行使的相关权力。即使照着丈夫样子投票的

妇女也是在进行政治选择。我们需要把妇女看作是政治性的存在。

一些讨论妇女和军国主义问题的激进分子在描述妇女的真实情况时一个歪曲的观点的例子便是普遍认为“妇女是战争的天敌”。很多女性反战积极分子认为妇女作为孩子的生育者或潜在的生育者必然比男性更加关注结束战争——这是在暗指女性比男性更多地维持生命。莱斯利·卡甘(Leslie Cagan)在《南端出版社新闻》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证实说参加裁军工作的妇女常常提出由于她们要生育孩子,所以她们“与这个星球的生存有着特殊的关系和责任”。卡甘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观点”,因为它把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生物性上,并且“倾向于强化女性等于母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观点”。她解释说:

> 可能有一些、甚至很多妇女由于关注她们的孩子而变得激进。对一些不想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核战争中被炸的父亲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仅仅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这一狭隘而局限性的观点是正确的。说它是局限性的是因为它认为妇女与这个关系到我们星球未来的重要问题的关系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生物因素。

我们这些关注女权主义和军国主义问题的人必须坚持妇女(即使是那些生孩子的妇女)并不是天生的非暴力或维持生命者。很多做母亲的女性(无论是单身母亲还是与丈夫一起)都教她们的男孩子把打斗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攻击视为可接受的交流方式,是比关爱的交互作用更有价值的方式。尽管妇

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常常被认为扮演着养育的、维持生命的角色,但她们并不一定会像她们通过暴力实现的情感压迫或权力主张那样重视或尊重这个角色。我们必须强调真的出来抨击(即使是受到母性的激发)暴力和统治及其最终表现形式——战争的妇女是作出了政治决定和选择的政治思想者。如果致力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妇女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继续暗示妇女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反战倾向,那么她们便是在冒强化生物决定论的危险,这是男性至上观点的哲学基础。她们也是在冒掩盖这一事实的危险,即美国很多妇女不是反帝国主义者,不反对军国主义,也不反对把暴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来使用。直到妇女们改变她们的价值观,她们都必须和男性一样被视为坚持人类关系的所有形式都包含社会统治的观点,并且她们必须对她们的行为负责。

现代军国主义的核心基础是帝国主义而非父权制(尽管它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利益,用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来连结男性观点)。世界上很多由男性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很多妇女作出了支持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决定。从历史上说,为妇女的权力而努力的美国白人妇女并没有发觉她们的这种努力和她们支持西方帝国主义征服地球的企图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她们常常争论说平等的权力可以更好地使白人妇女帮助这个"伟大"国家的建立,如,帝国主义理想。20世纪早期的很多坚决主张妇女解放的白人妇女是前帝国主义者。

海伦·蒙哥马利(Helen Montgomery)于1910年出版的《东方国家的西方妇女》描述了五十年来白人妇女在国外传教方面的工作,这样的书记载了美国白人妇女的解放斗争和西方

价值观及西方对全球的统治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蔓延之间的联系。作为传教士,白人妇女去往东方的国度,带着心理武器去破坏东方妇女的信仰体系并代之以西方的价值观。海伦·蒙哥马利在著作的结尾这样写道:

> 有这么多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这么多的慈善事业等着我们去效忠,我们都快忘记哪个是最好的。妇女传教运动的使命是把基督的王国带到人间,对最痛苦的需求作出回应,为了那些被牧羊人从羊圈里丢失的可爱的迷途羔羊到沙漠里去,为了和没有特权的人共享特权,和不快乐的人共享快乐,看到获得宽恕的人类的可能性,他们专心、安详而坚定地停留在上帝的福音之光里。

尽管当代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女权运动是以白人妇女为首的,但她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能代表这个社会大部分白人女性或者妇女整体的价值观。美国的很多白人妇女继续全身心地支持军国主义。女权主义者必须使这些妇女对她们的政治决定负责并且努力改变她们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男人和父权制当作惟一的敌人,那么我们便是在回避这种挑战。

男性在全球进行了大部分的帝国主义行为和战争中的暴力行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当国家处于危机中受到召唤去做这样的事情时,妇女也要投入战斗并且也没有必要反对战争。我们还必须记住战争并不只简单地包括战斗,妇女们在家中和远离前线的地方所作的努力也是对战争有所帮助的。帕蒂·沃尔顿(Patty Walton)在她的文章“我们血液中的文化”的最后讨论了妇女对战争的参与,她

这样写道：

> 妇女们没有在战争中参加战斗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情况而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比男性有道德或者因为任何对我们的生物上的限制。妇女的工作既支持了社会的战争也支持了它的和平活动。而且我们的支持总是来源于作为妇女的特殊的社会化。事实上，妇女和男人的社会化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需求进行了补充。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需要改变这些物质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制造者的性别。男性并不是天生更加富于攻击性，女性也不是天生就是被动的。我们有战争的文化，所以我们也可以有和平的文化。

劳动力的角色区分意味着妇女作为母亲也在支持战争，其方式是通过向她们的孩子灌输对统治的接受和把暴力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在人类的意识中灌输这种思想与把军国主义国家作为对男性的全面统治一样重要，这种统治是通过控制坚持认为男性是战争制造者的男性群体，并且对他们加以奖励来实现的。美国的妇女和男性一样对目睹暴力有着很高的忍耐力，这是从过多地看电视中学到的。为了反对军国主义，我们必须抵制日常生活中教我们被动接受暴力的社会化和宣传，它告诉我们可以用暴力来消除暴力。反对军国主义的妇女必须不再支持战争，把对暴力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在日常生活中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再把男性当作使用、接受和宽恕暴力以及制造暴力文化的惟一群体。作为妇女我们必须为妇女

在宽恕暴力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责任。仅仅呼吁人们关注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或者认为军国主义只是男性暴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我们便没有充分地阐述暴力问题并且难以形成可行的抵抗策略和解决方法。(在辛西亚·恩洛伊[Cynthia Enloe]的著作《卡奇变成你?》中有对军国主义对妇女生活影响的更加全面的讨论)虽然我们不需要减少男性对女性暴力问题或者男性对国家、全球暴力的严重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一起创造了美国的暴力文化并且必须共同努力来改变和重新创造这种文化。女性和男性都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把暴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来使用:战争、男性对女性和暴力、成年人对儿童的暴力、青少年暴力、种族暴力等等。女权主义旨在结束男性对女性暴力的努力必须延伸成为结束所有形式的暴力的运动。有了广泛的基础,这样的运动才可能激进其意识,并且在努力消除认为等级制度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基础的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必须结束男性对女性统治的认识。

10 父母职责的革命性改变

在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女权主义对母性的分析体现了参加者的种族和阶级偏见。一些中产阶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争辩说母性是妇女解放的一个严重障碍，是一个把妇女限制在家中的陷阱，让她们只是打扫卫生、做饭和照顾孩子。其他人则简单地把母亲职责和抚养孩子看作是妇女压迫的场所。如果黑人妇女说出了她们对母性的观点，那么它就不会被认为是我们妇女解放的一个严重障碍。种族歧视、没有工作、缺乏技能或教育以及很多其他问题才是最严重的——而不是母性。黑人妇女不会说母性阻碍了我们进行有偿的工作，因为我们一直在工作。从奴隶制到今天，美国的黑人妇女一直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工作，在田里、在工厂、在洗衣店、在别人的家里。那样的工作在经济上得到的报酬极少，但却影响或妨碍了对孩子的抚育。从历史上说，黑人妇女把家庭中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充满仁爱的工作，这种工作承认了她们作为女性、作为人类所表现出的关爱，这正是白人至上的思想声称黑人没有能力表达的东西。与在人道的家庭环境中所

从事的工作相比,家庭之外的劳动常常被认为是有压力的、侮辱性的和非人的。

这些有关母性和家庭之外工作的观点与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所表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黑人妇女说:“我们想有很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我们希望离开那些边缘的工作。”很多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说:“我们对独自呆在家里、只跟孩子和丈夫交流已经厌烦了,厌倦了情感和经济上的依赖;我们希望得到解放、参加工作。”(这些不是那些和黑人妇女劳动者一样厌倦了边缘工作的白人劳动妇女的声音。)希望成为劳动力的妇女解放主义者过去没有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边缘劳动的世界。现在她们看到了。在过去 20 年的女权运动中,很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成为有报酬的劳动力,并且发现在种族歧视仍然是规范的、存在着鼓励个人之间的嫉妒、猜忌、敌对和怨恨的不必要的竞争的环境中工作,使工作有压力、受挫并且常常完全不满意。同时,很多喜欢和享受带薪工作的妇女又的确感到它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使她们没有什么空间有其他令人满足的追求。虽然工作可能会帮助妇女得到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或者甚至完全的经济独立,但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这并没有充分满足其人性的需要。于是,妇女们寻求在关爱的环境中从事工作导致了再次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和母性的积极方面。加之多数积极的女权主义者的年龄都处于 35 岁到 40 岁之间,面临生物钟的变化,她们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母亲职责上。这种注意力的更新使很多对抚养孩子有兴趣的参加了女权运动的女性选择了生孩子。

虽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声称尊重和承认家务劳动和对孩子的照顾,但她们并没有给予女性抚养孩子和母性足够的重

要性和价值。这是一个在女权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表现出来的姿态。早期女权主义对母性的攻击使大量的妇女远离了这项运动,特别是贫穷的和(或)非白人妇女,她们发现抚养孩子是让她们得到肯定和欣赏的极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一。不幸的是,最近女权主义对母性的积极关注的重点仍集中在有关性别歧视的陈词滥调上。母性被一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浪漫化了,就像19世纪的男男女女们赞美"崇拜家庭生活"的美德一样。她们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母性不再被视为首先发生在异性婚姻结构或甚至异性关系之中。与男性没有关系的妇女——异性恋或同性恋者——比过去更多地选择生育孩子。尽管单亲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但其焦点在于赋予母亲与孩子之间关系的那种"做母亲的快乐"、那种特殊的亲密、亲近和结合。像菲力斯·切斯勒的著作《与孩子在一起:母性日记》这类的书便狂热地描述了生孩子和照顾孩子的快乐。如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的《母性的将来》、伊莉莎白·巴蒂特(Elisabeth Badinter)的《母爱》、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的《我的母亲/我的自我》和南希·肖德罗(Nancy Chodorow)的《母性重演》这类更有学术性、更加严肃的著作都反映了对母性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母亲职责兴趣的复苏对女权运动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含义。从积极的方面说,存在着研究女性抚养孩子的需要,这也是这种兴趣所促进和鼓励的。艾德里安娜·里奇在《生为女人》一书的序言中说她觉得写一本有关母性的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女权主义理论中至关重要而又尚未探讨的领域"。选择生育孩子的妇女肯定不需要再为这种选择会把她们排除在

女权运动之外而担心,尽管这可能仍然会妨碍她们积极地参加到其中。从消极的方面来说,通过把母性浪漫化、使用性别歧视主义者所使用的认为妇女天生就是维持生命的养育者的专有名词,女权主义者们强化了男性至上思想的中心原则。她们暗示说母性是妇女真实的天命;认为没有做母亲的女性,把生活重点更多地放在事业、创造性的工作或政治工作上的女性是有所缺憾的,感情生活一定是不完满的。虽然她们没有公开地攻击或者诋毁不生孩子的妇女,但她们(和社会整体一样)认为生孩子要比妇女的其他劳动更重要并且也更加值得报偿。她们可以简单地说这的确重要并且值得报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常常是由很多有着成功事业、现在选择生孩子的白人资产阶级妇女说出来的。她们似乎是在对广大妇女说事业或工作永远都不会像生孩子那么重要、那么令人满足。

这是一条特别危险的思路,它出现的时候很多还没有明白很多目标的十几岁少女在大量地生孩子而不是推迟生育,政府告诉妇女大众她们不承担固定的性别角色便是在破坏家庭生活。通过大众媒体和传播体系,妇女现在被淹没在对她们生孩子的物质奖励之中。报纸上刊登着题为"母性归来"的大字标题故事;女性杂志上也全都是有关新母性的文章;时尚杂志刊出了专为孕妇设计的服装;电视上的脱口秀对现在选择了抚育孩子的职业妇女进行专访。在有孩子的妇女更加可能生活在贫困中的时候,在每天增加几千个无家可归、无父无母的孩子的时候,当妇女们继续独自承担着抚养孩子的职责的时候,这样的宣传破坏并且威胁到了女权主义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白人女性对母性的浪漫化是在

试图修复过去的女权主义批评所造成的损害,是在给予做母亲的女性她们应得的尊重。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批评中最蛮横的也没有把性别歧视比作剥削的原因和对母亲的侮辱。女性抚养孩子是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认为,包括女权主义者。它应该在重新努力思考母亲职责本质的女权主义范围中得到应有的承认、赞扬和庆祝;既不要把母亲职责当作一种被迫的义务也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剥削或压迫;无论是女性独立完成还是与男性共同完成,都要把女性抚育孩子当作一种好的、有效的抚育。

玛丽·爱伦·斯库梅克(Mary Ellen Schoonmaker)在她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抚养孩子"中强调了常常提到的男性在抚养孩子中没有承担同等工作的问题:

> 由于早期对母亲职责的矛盾心理,妇女运动的全部目的一直是要求平等——从母亲职责的压迫中解脱出来,把"母亲职责"结合成"父母的职责",让那些选择生育孩子的人与男性和整个社会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回顾过去 20 年,这些目标似乎是妇女运动中最难达到的。
>
> 如果男性真的在抚育孩子中承担了同等的责任,那么这将意味着用地位来和妇女交换一些时间。很多男性发现与妇女分享工作中的权力比分享她们在家中的权力容易。即使成百万的有着婴儿和小孩的母亲们现在都走出家庭外出工作,但很多妇女仍然从事着大量的家务劳动。

除非男性从儿童时期在观念上就受到教育，懂得父性和母性一样地有意义和重要，否则男性是不会在抚育孩子中承担同等职责的。只要妇女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女性在她的身体中孕育孩子并且将它生出来便把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独特的和特殊的，或者把这种身体上的经历看作女性比男性与孩子有着更加密切、更加重要的关系，那么抚养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还将继续主要是女性的工作。即使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也被认为比男性更加适合照顾小孩，因为她天生就应该是一个会照顾孩子的抚育者。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怀孕和生孩子的身体上的经历都不应该与妇女必然比男性更会照顾孩子的观念等同起来。

字典上对“父亲”一词的定义把它的含义与接受责任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提到如“亲切”和“慈爱”这样的词，然而“母亲”这一词的定义中却用到了这些词。社会把抚育孩子的责任——即满足孩子情感和物质上的需要——完全放在妇女的身上，从而强化了母亲比父亲重要的观点。“父亲”和“母亲”两个词构成了定义，而且对这两个词的使用恰恰反映了这两个词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如果要男性和女性在抚养孩子承担同等的责任，那么妇女和男性必须用同一种方式来定义父性和母性的工作。即使是强调男性在孩子的抚养中必须承担同等责任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也不愿意放弃母性的特殊价值。这说明了女权主义者赞美母亲职责的生理经历的愿望，同时也说明了不愿意让步，把母亲职责视为一种女性行使权力和控制的社会生活的舞台。

妇女和社会整体常常认为承担了同等抚育责任的父亲是独特的、特殊的而不是代表了本应如此的观点。这样的男性

甚至被认为扮演了"母性"的角色。伊莉莎白·巴蒂特在她的著作《母爱》中描述到照顾孩子的男人这样评论道：

> 在妇女施加的压力之下，新一代的父亲同样照顾着孩子并且有着传统的母亲的形象。他和其他母亲一样，爬到母亲和孩子之间，孩子和父亲、母亲都有着同样亲密的接触。我们只注意到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刊登出父亲们把新生儿抱在赤裸的胸前的照片。没有人惊讶于他们脸上表现出的彻底的、母性的温柔。在几个世纪的父性权威或父性的缺乏后，父爱似乎是一种新形成的、与母爱同等的概念。尽管女性照顾孩子的样子显然是男性努力模仿的模式(因为照顾孩子的时间要比男性长很多年)，但这些男性正在成为父亲、实际意义上的父亲。他们并不是在变成母亲。

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证出现在莎拉·鲁迪克(Sara Ruddick)的文章"母性思想"的结尾。她设想了一个男性将共同照料孩子的时代并且写道：

> 到那时，将不再有"父亲"，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性别的人对其孩子的生命有权力和在孩子的世界中有着精神权威，尽管他们从事着充满关爱的工作。两种性别的人都将成为母亲，他们在共有双亲关爱的社会中经历着改变了的母性思想——实际地、情感地、经济地和社会地。这样的社会将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学会如何重视孩子们的生命。

在这一段以及在整篇文章中,鲁迪克把"母性"思想浪漫化并且强调了男人变得有母性这一显得目光短浅的观点。由于"母性"这个词是与妇女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男人们即使在行为上显示出传统的"女性化",他们也不会认同这一点。愿望并不能改变我们社会中有关母性的概念。与其改变它,不如使用有着相同意思的另一个词"父性"。告诉一个用布娃娃来扮演关爱的父亲角色的男孩他正在表现出母性并不会改变妇女更适合照顾孩子的观念;只会加强它。对一个男孩说他的表现像是一个好父亲(就像女孩子对布娃娃表现出关爱的时候对她们说她们是好妈妈一样)会教给他一种实际意义上的父性的养育孩子的观点,那与母性是一样的。

把抚养孩子的男性看成"母性"加强了认为妇女天生更加适合照顾孩子的陈旧的性别歧视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和妇女一样照顾孩子的男性是在模仿而不是在做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应该有一种不把母性和父性区别开的、关于照顾孩子的概念。鲁迪克所描述的带着关爱的照顾孩子的模式被仅仅使用在妇女身上并且妨碍了父亲们学习如果照顾孩子。他们被允许仅仅从行使权力和提供物质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父亲这一角色。他们被教导把这个角色看作是次要于母亲的角色的。除非男性学会用和妇女一样的方式来照顾孩子,否则他们是不会在孩子的抚养中承担同等责任的。他们甚至还会感觉到他们不应该加入其中,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自己在抚育孩子方面是不适合和效率低下的。

男性被社会化,回避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并且这种回避得到妇女的支持,她们相信如果男性同样加入到对孩子的抚

育中她们便会失去这一片权力范围。许多这样的妇女并不希望与男性共同承担抚育的责任。女权主义者们常常忘记美国的广大妇女仍然相信男性不能有效地抚育孩子而且甚至不应该作这样的尝试。这些妇女要理解男性应该也可以进行基本的抚育工作,否则她们不会希望自己生活中的男性在抚育孩子中承担同等的责任。即使她们做到了,男性也不会热情地反应。人们应该知道男性不参与抚养孩子对家庭关系和孩子的成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女权主义者努力向男性指出不参与抚养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这种努力有被资产阶级指导的倾向。她们很少讨论到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和男性不分性别的或男性对孩子的抚育。实际上,鲁迪克在她的文章中所提倡的母性抚育特别强调了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关注,其实这种形式的照顾对很多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的劳动阶层的父母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对于那些要在经济上挣扎生存的家庭中的男女来说,要给予孩子特别的关注则更加困难。他们的挣扎鲜明地对照出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这些家庭中的白人妇女和男性可能更加了解男性参与抚养孩子的积极作用,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不需要总是担心物质因素。让独自承担照顾孩子责任的妇女同时满足工作和抚育孩子的要求也是很困难的。

女权主义理论指出了妇女独自抚育孩子时所出现的问题:女性抚养没有给孩子男性抚养的角色模式,这巩固了抚养孩子是女性的天职的观念,并且强化了男性的统治和对女性的恐惧。然而这没有涉及到社会。在男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回避抚育孩子的责任,在女性由于从事了更多的工作而对孩子

照顾得比过去少，但却更多地独自照顾孩子的时期，这样的说法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事实提出了两个未来女权主义运动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孩子得到父母的有效照料和其他抚养的权力；以及重新建构社会以使妇女们不再独自提供那样的照料。

消除性别歧视是解决男性不共同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抚养小孩这一问题的方法。因此更多的妇女和男性都必须认识到支持和参与女权运动的必要性。广大妇女仍然相信她们应该首先负责照料孩子——这一点不能过分强调。女权主义者帮助妇女忘记这种社会化会使她们更多地要求男性共同参与抚育孩子。在妇女健康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印制和散发小册子，强调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抚育孩子的重要性，是使更多人了解这一需要的一种方法。在当地的社区开展强调不分性别和共同抚育孩子的讨论会是另一个能使更多人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在妇女怀孕之前，她们需要理解男性共同参与抚育孩子的重要性。一些与男性有关系的、可能正在考虑怀孕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男性说他们不会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而改变主意。这些妇女认为她们选择与拒绝共同抚育孩子的男性生孩子是一种强调共同参与抚育孩子的政治观点，是在结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我们需要更多地听到这样的妇女所作出的选择。也有一些与男性有关的怀孕妇女事先就知道对方不会共同参与抚育小孩。在未来有关女性抚育孩子的研究中，理解她们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妇女必须知道，在怀孕或孩子出生之前与男性讨论抚育孩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也有的妇女和男性签署了法律合同或书面协议来规定各自的责任。有的妇女发现在怀孕或孩子

出生之前，男人们口头上赞成共同抚养的想法，但在孩子出生后却不能坚持这样做。书面协议有助于阐明形势，要求各自说出他们对抚育孩子的看法，谁将负责，等等。大多数妇女和男性在孩子出生前并不讨论抚养孩子的问题，因为通常都认为妇女将是照看者。

尽管男性共同承担抚育孩子非常重要，但很多妇女与和她们没有关联的男性有了孩子。在有些情况下，这反映了男性对抚养孩子或妇女的选择缺乏关注。有的妇女并不觉得自己的孩子得到男性的照料和抚育非常重要。在黑人社区里，单身母亲依赖于男性亲戚或者朋友来帮助她们照料孩子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由于越来越多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妇女选择了与她们并没有紧密关联的男性生孩子，因此越来越需要社区对孩子的照顾，使孩子们与男性有接触，使他们不会在成长过程中认为女性是惟一照顾或应该照顾孩子的群体。照顾孩子的人不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可以是教师、图书管理员等等，即使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主要是女性，这也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可以经历一种男性的照料。有些单独照料孩子的母亲感觉当她们的孩子偶然接触到父亲时，自己的地位便受到动摇，父亲们可能会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时光但却完全不参与日常的照顾。她们有时必须面对孩子们更加重视父亲因为他是男性（性别歧视的思想告诉他们男性的关注比女性的更加有价值）。这些妇女必须知道教给自己的孩子不带性别歧视的价值观可以帮助他们赏识女性的抚育并且消除仅仅建立在性别歧视标准上的偏爱。

由于妇女承担了大部分的抚育责任，建立用赋税为基金的、有着同等数量的女性和男性工作人员的公共育儿中心一

直是一个紧迫的女权主义问题。这些中心可以把妇女个人从单独抚育孩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并且还可以提高对男性参与抚养孩子的必要性的认识。虽然这还是一个需要人们来推动的问题。未来女权主义组织(特别是为了建立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论坛。女权主义者总是把对孩子的公共抚养看作是解决妇女单独抚养孩子这一问题的方法。斯库梅克在她的文章"抚养孩子"中对育儿中心的需要进行了评论，她这样写道：

> 至于家庭之外对孩子的抚育，认为日常照顾是容易、可靠和有效的妇女运动把它设想为一个似乎很简单的概念，但事实上它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当个人的、常常价格高昂的托儿所符合了中产阶级的需要，那么公共托儿所的不充分便会引起不满。华盛顿的一个儿童提倡和游说组织——儿童保护基金——报告说可能有600至700万儿童，包括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在他们的父母工作的时候被单独放在家里，因为他们支付不起托儿所的费用。

大多数既满足劳动阶级也满足资产阶级需要的育儿中心里并不是不存在性别歧视。除非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便学会了以性别为基础的角色区分并不重要，否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还会继续认为女性首先应该是照料孩子的人。

很多人反对以税金为基金的公共育儿中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妇女在试图逃避抚养的责任。他们应该知道，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所从事的独立抚养对于抚养孩子和做母亲的女性来说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伊莉莎白·简威在她的著作《交叉的

片断》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强调指出个人独立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是世界上最不寻常的抚育方式，这种方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把孩子和父母与社会隔离开来：

> 马萨诸塞教育顾问委员会的研究所获得的例证说明了当今的家庭隔绝可以达到怎样的极端程度……他们发现：
>
> 1.由于有收入者专注于他们的工作，从而与配偶和孩子隔绝；
>
> 2.孩子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职业社会的相互隔绝；
>
> 3.年少的孩子与不同年龄的人的普遍隔绝，包括成年人和其他孩子；
>
> 4.家庭与不同社会、民族、宗教和人种背景的人在居住上的隔绝；
>
> 5.家庭成员与亲属和邻居的隔绝。
>
> 这样的隔绝意味着家庭作为使孩子社会化的代理人的角色在目前无论母亲们是否外出工作都不能被充分体现。孩子们现在的成长环境中没有两种性别的多种成人角色模式的帮助，并且对有偿劳动的世界一无所知。让妇女们回到以家和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并不会解决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丧失的问题。妇女运动让社会来开办育儿中心的努力不是在把母亲的责任交给别人而是在争取社会的帮助来增加父母固有的责任，过去常常都是这样的。

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公共育儿中心将是克服这种隔绝的最好

的方法。在父母们必须开车把孩子送到很远的托儿所的时候,对父母的依赖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共托儿所会使小孩更多地控制他们的生活。

抚养孩子是一种可以与别的抚养者共同承担的责任,和那些不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的人共同承担。这种形式的抚养在这个社会中是一种革新,因为它处于父母、尤其是母亲应该是惟一的抚养者这一观点的对立面。很多在黑人社区里长大的人都经历过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料。必须走出家庭去工作来帮助养活家人的黑人妇女不能支付把孩子送到日间托儿中心的费用,而且这样的托儿所并不总是有的。她们依赖于社区里的人帮忙。即使是在母亲呆在家里的家庭中,她也可以依靠社区里的人的帮助。她不需要每次孩子跑到外面玩的时候都看着他们,因为很多住在附近的人都会帮忙看着的。没有孩子的人常常承担共同照顾孩子的责任。我自己的家庭中共有七个孩子,在我们成长期间父母不可能整天看着我们或者给予孩子们他们有时所期待的特别的关注。这些需要常常是由邻居和社区里的人来满足的。

这种对照顾孩子责任的共同承担可能在人们相互之间都认识并且信任的小的社区环境中实现。在父母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和其他人形成养育的关系,甚至是和亲戚。如果社区里有日托中心,那么孩子们与父母之外的人发展友谊和养育关系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这种关系在一个教师要照顾很多孩子的日托中心是不可能形成的,在这种日托中心里,除了学校之外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见到教师的。任何一个在公共照顾的环境中长大的人都知道,只有父母可以接受其他的

成年人像父母一样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这创造了一种孩子们必须面对很多照看者的环境，但如果孩子的情感、智力和物质需要不能单独在父母那里得到满足时，这也给了他们依靠。在黑人社区里当人们共同抚养孩子时，常常是较年长的妇女和男性在参与。现在很多孩子与老人没有接触。社区公共育儿所能避免的单亲家庭或甚至核心家庭抚养的另一个危险是父母对孩子在情感上的过分投入。这是很多人在多年不要孩子后又选择生孩子时会出现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把孩子变成“爱的对象”而无意教他们与更多的人有联系。这对女权主义者、抚育孩子的男性以及其他的父母来说同样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起初，妇女解放主义者认为控制人口的需要和认识到这个社会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是不要孩子的政治原因。这些原因依然存在，尽管它们现在受到忽略或抛弃。然而如果不十分强调有“自己的”孩子而是更加强调去照顾那些已经存在并且需要照料的孩子，那么将会有大批有责任心的妇女和男性加入到对孩子的抚育之中。露西亚·瓦尔斯加（Lucia Valeska）在1975年的一期《寻求》上发表了文章“即使一无所长，我仍然是个母亲”，她在文章中支持了这一立场：

> 今天，有我们自己的生物意义上的孩子从个人和政治上讲都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你有健康、力量、精力和金融资产可以给孩子，那么这样做吧。那么，谁会有孩子呢？如果没有孩子的人抚育已经出生的孩子，那么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人“有”孩子。那么生物意义和非生物意义上的母亲的界限便会消失。我们是不是在冒使人类灭

> 绝的危险呢？你在开玩笑吗？
>
> 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成百万的孩子和母亲急切地需要个人和社会的支持。

有些选择不要孩子的人努力参与抚育孩子。然而，和很多父母一样，大多数没有孩子的人认为除非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是不会对抚养孩子有兴趣的。没有孩子的人要参与抚养孩子必须面对那些对此不理解的人的怀疑和反对，这些人认为没有孩子的人都不喜欢他们。人们对那些愿意帮助抚养孩子而又不要报酬的人特别警觉。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努力参与抚养孩子，我们把孩子们留在家中一段时间，以此让母亲，特别是单身母亲有一个休息的机会，也让我们的生活中有孩子。如果我们解释这种举动背后的动机，人们通常都会惊讶和支持，但也很警觉。我想他们警觉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同寻常。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使我们接受了一种不得不与孩子减少交流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孩子。这种与孩子的隔绝促使很多女权主义者生孩子。

在把妇女从独自抚养孩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的抚养孩子的共同责任存在之前，妇女和男性都必须革新他们的认识。他们必须愿意认识到孤立地抚养孩子(与抚养者的性别无关)并不是培养孩子或者成为快乐的抚养者的最有效的方法。由于在这个社会中妇女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责任，并且这种情况似乎在近几年里不会改变，因此必须围绕着抚养孩子的问题进行新的女权主义组织。这个观点并不是要诋毁单亲，而是强调共同抚养的需要。全美国的妇女必须团结起来要求把花在军备竞赛和其他军事目的的税金用于改善社会中抚养

孩子的条件和儿童保育上。女权主义理论家强调单亲的危险，并对需要男性共同参与抚养孩子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些人通常生活在有父亲的家庭中。这使她们忽视了这样的抚养方式并不是很多妇女的选择这一事实（即使这可能是抚养孩子的最好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存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有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公共托儿中心里。妇女和男性比过去更加需要围绕育儿的问题组织起来以确保所有的孩子将在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社会结构中成长，确保妇女不再是惟一的、初始的育儿者。

11　结束女性性压迫

在当代女权运动的早期，妇女解放常常被与性解放等同起来。在吉尔梅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著作《女宦官》（20世纪70年代传播最广的女权主义著作之一）的封面上，这本书被描述成“性自由的终极表达”。在封底，格里尔被描述成“一个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的、有幽默感的女人”。（吉尔梅尼·格里尔的著作《性与命运》是对生育问题的一个有趣的反思，生育问题向作者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所倡导的女性性自由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像格里尔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相信强调性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解放的姿态。她们鼓励妇女提倡性爱、享受性、尝试新的关系、在性方面“自由”。然而大多数妇女没有空闲、灵活性、接触甚或欲望来沉湎于这种所谓的“性解放”。单身并且没有孩子的年轻的异性恋女性、少女和大学生以及政治改革论者是最渴望并且也能够在性行为上模仿这种形式的群体，它从本质上说是男性性解放观点的一种逆转。提倡真正的性自由是积极的，并且妇女从经历中也懂得了产生性关系的自由、非单一配偶的性关系、尝试群体性关系和性

受虐－施虐狂等等有时可能是令人兴奋而愉悦的；不过这并不破坏男性和女性在性方面的权力关系。很多妇女觉得性解放的思想让她们醒悟。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继续强调性自由的重要性、反对认为它应该模仿男性模式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群体，包括女性异性恋和同性恋者开始反对性自由的思想，甚至反对与男性有性接触，因为她们认为女性受到旧式性规范的剥削。这些女权主义者越来越把男性性行为看作是令人厌恶的、是必然要剥削女性的。

性自由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女权主义问题在当前还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一章节写完后又出现了很多讨论性问题的女权主义作品，包括切丽·莫拉加（Cherríe Moraga）的《战争岁月的爱情》，安妮·斯尼脱、克里斯廷·斯坦塞尔和莎伦·汤普森（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编辑的《欲望的权力》，罗莎琳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的《女性欲望》及休·卡特里奇和乔安娜·瑞恩（Sue Cartledge and Joanna Ryan）编辑的《性与爱》等等。）埃塞尔·珀森（Ethel Person）在她的文章"性作为身份确认的关键：心理分析的观点"的结尾这样写道：

> 那么，总体上说虽然性解放对一些个人是重要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社会批评和政治策略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解放在其最坏的情况下是个人崇拜的一部分，它只要求把个人需要的表达合法化，这种需要在她看来是一种原始"冲动"的生活，是在不考虑社会顺序自身的政治性重新排序的情况下违背社会要求。取得女性自治所必须的条件是真正的性解放的前提。

人们并不认为反思性、改变性的观念是女性性自主的前提;因此,具有"性自由"含义的性是一个重要的女权政治的相关问题。

要女性来描述和批评性的消极方面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是在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构成的;要她们揭露男性对女性的客体化和非人化,公开抨击强奸、色情、性暴力、乱伦等等也非难事。但要女性构想新的性规范、改变性观念则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只有在重视性安康的环境中这样的工作才能受到鼓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放弃性愉悦、性安康和性满足的问题,认为它们是一些不相关的问题。当代对于性革命或任何性表达的强调使很多女性和男性认为我们社会中已经存在性自由,并且甚至过分强调它了。然而,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肯定真正性自由的文化。爱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在她的文章"关于女权主义性革命"中批评了认为由于缺乏很多限制所以存在着性解放的社会的设想,她说:

> 因此,从激进的立场说,性解放不仅包括废除限制,而且要存在鼓励令人满意的性关系的社会和心理条件。从这一立场看,我们的文化仍然是非常具有压制性的。很明显,男女之间性方面的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相互敌对是性愉悦的毁坏性的障碍。我还要说,尽管有了性解放,但大多数在孩提时代所受的教育使成年人对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对性的限制使人们通过强迫的性活动和专注于性来不顾一切地努力克

> 服障碍达到满足。对当前充斥着我们公共生活的性的强调——尤其是大量的性建议和治疗的需求——证明的不是性自由而是我们不断的性挫败。

把男性性行为视为天生可鄙的女权主义者们一直是那些最不愿意强调性自由问题的人。她们仅仅强调男性性表现中与加强男性对女性统治的有关的那些方面,因此她们不情愿或根本不愿意认识到在这个有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建构的性既没有"解放"女性,同样也没有"解放"男性(尽管它显然在某些方面压迫女性而不压迫男性)。威利斯认为承认"性的破坏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既反映也巩固了压制制度的歪曲",因此便有可能"设想一种连贯的女权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对性自由的义务扮演着一个完整的角色"。只有当个人不再受到以生物概念定义的性别的压迫的时候,如:压制、犯罪、耻辱、统治、征服和剥削,那么性自由才能存在。为了给性自由的发展设定出阶段,女权运动必须继续把焦点放在结束女性性压迫上。

对"性解放"的关注总是认为这种努力的目标是使个人可能更多和(或)更好地参与到性活动之中。然而性观念中让很多人觉得有压迫性的一个方面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参与性活动。这种"应该"是性强迫的一种表现。提倡性自由常常意味着任何不关注自己的经历的性质或得到更大性自由的个人都在精神上受到干扰或者受到性压抑。在首先强调结束性压迫而不是强调性解放的时候,有可能会设想出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性活动都是性自由的一种表现。

性观念目前的社会构成方式总是把积极的性表现凌驾于

性的欲望之上。有性行为被认为是自然的、正常的;没有则是不自然不正常的。这种想法是与性别角色模式相一致的。男性被社会化而有性的行动,女性则不(或者只是对男性的性表示作出反应)。妇女解放主义者坚持妇女应该在性方面积极活跃,并把它视为一种解放的姿态,这有助于把女性的性欲从压抑的双重标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但并没有消除性冷淡的坏名声。除非消除了这种坏名声,女性和男性才会在他们有欲望参与性活动时感到是自由的。他们会继续对强迫作出反应,或者是促使男性为了证明他们的"雄性"(如,他们的异性性行为)而采取性行为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强迫,或者是迫使年轻女性为了证明她们的"女性气质"(如,她们愿意成为异性恋中的性客体)而对这样的示爱作出反应的性强迫。消除附加在性冷淡上的社会坏名声就相当于改变性观念。它将对女性和男性,尤其是青少年产生很多积极的意义,青少年在这一历史时期最有可能受到带有性别歧视的性观念的迫害。最近对青少年异性恋之间的性关系的调查表明,强迫仍然是参与性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女孩"为男孩而做",一个17岁的女孩这样对她的母亲说(摘自爱伦·古德曼的文章"青少年的性骚动"),而男孩子这样做是为了向其他男孩证明他们是异性恋者,并且他们可以对女孩行使"男性"权力。

消除异性恋——强迫的异性恋——的女权运动对于结束性压迫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回头:8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的序言中,盖丽·古德曼、乔治·雷奇、裘迪·雷奇和埃里卡·桑尼(Gerre Goodman, George Lakey, Judy Lakey and Erika Thorne)把异性恋定义为:

> 对同性恋的压制和否认，认为每个人都是或者应该是异性恋，并且相信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被动角色模式是固有的优越。强迫的异性恋产生了异性恋主义，前者妨碍了自由的表达和异性恋及同性恋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

在女权运动中，同性恋女性在呼吁人们关注结束异性恋压迫的斗争方面做出了最努力的工作。同性恋女性在更大的性解放争论中对双方都支持。她们向很多异性恋女性说明了她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是在支持和巩固强迫性的异性恋。她们还向妇女们说明了我们可以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情感上共有的性的满足。有些女同性恋者认为由于同性恋与生殖无关，因此它可能是支持那种性的政治的最直接的表达。结束女性性压迫的女权运动是与同性恋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结束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女权主义议程。它是结束女性性压迫运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肯定同性恋，有着不同性取向的妇女们才能抵制强迫性异性恋的长久存在。

整个女权运动中一直有一种把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变成一种竞争的倾向：异性恋与同性恋者之间的竞争。在运动的早期，在"熏衣草威胁"的阴影中对同性恋的排斥和压制被认为是合理的。后来，同性恋主义被当作一种选择，可以消除处理异性恋冲突问题的需要，或者是女权主义者最正确的政治选择。即使很多女权主义者承认，反对性压迫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憎恨男性是不同的，但在女权主义聚会和组织中，

异性恋和同性恋女性有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男性的情绪,而且那些不是同性恋者的女性和那些与男性有或没有关系的女性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种情况在那些可能支持女权主义但却不公开支持同性恋者权利的女性身上尤其如此。人们常常忘记了我们都处于提高激进政治觉悟的过程之中,它是一个“过程”,它使建立团结的努力遭到挫败,并且当女性没有直接支持我们认为是相关的问题时,便指责或断定她们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妇女是同性恋者的想法(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女性都这样认为)设定了另一个性标准,这种标准把女性判断为不合格。虽然女权运动中的女性认为妇女应该是同性恋者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在有关异性恋讨论中却把这种想法传播开来了,这些讨论认为男女之间的生殖器接触都是强奸,认为在情感和性方面属于某个男性的妇女必然不可能承担忠诚的、女性身份的政治义务。就像结束性压迫的斗争旨在消除异性恋主义一样,它不应该赞同任何一种性选择:独身、双性恋、同性恋或异性恋。女权主义者需要忘记我们所作的政治选择不是由我们选择与谁有生殖器的性接触来决定的。芭芭拉·史密斯在她给《家中少女:黑人女权主义诗选》写的序言中断言:“黑人女权主义和黑人女性同性恋主义是不可互换的。女权主义是一项政治运动,而很多女性同性恋者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很多异性恋的女性也同样不是。即使女性在性方面与男性有关系(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政治选择无疑会改变个人关系的性质),她们也可以承担女权主义斗争的激进政治责任,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妇女,尤其是对异性恋的妇女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妇女都应该知道她

们可以不管自己的性取向如何而承担女权主义的政治责任。她们需要知道女权运动的目的不是建立“政治正确”的性规范。从政治上说，承担着结束性压迫责任的女权主义者必须致力于消除对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压迫，把它作为能让女性(和男性)自由选择性伴侣的整体运动的一部分。

女权主义者必须注意到我们对异性恋主义的合理批评不是在攻击异性恋行为。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妇女，她们实际上认为有异性恋取向的妇女既是叛逆者也有可能是反对同性恋者。对异性恋行为的批评使那些希望与男性有性关系的妇女觉得自己不能参加女权运动。她们得到的信息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都不是异性恋的。这很容易让人把支持非压迫的异性恋行为与信仰异性恋主义相混淆。例如，对于《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中的“攻击异性恋主义对于加强那些希望与男性在一起的妇女的自我概念毫无用处”的说法，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谢丽尔·克拉克(Cheryl Clarke)在她的文章“失败的改变:黑人社区中对同性恋的憎恨”中这样回答道:

> 胡克斯间接地给了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们一击，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黑人。胡克斯还会有效地攻击异性恋主义的制度，因为它是美国黑人妇女受压迫的最根本的原因。

谢丽尔·克拉克误解并且也错误地解释了我的观点。我并没有涉及异性恋主义，并且正是异性恋行为等同于异性恋主义才使克拉克看起来似乎是在攻击这种行为本身而不仅仅是异

性恋主义。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广大异性恋妇女觉得自己受到轻视或者被视为在做什么错误的事情，那么女权主义永远都不会吸引她们。我的评论的目的不是要以任何方式责备女性同性恋者，因为她们并不是批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指责所有异性恋行为的惟一女权主义群体。

正如旨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应该创造一种女性同性恋者和男性同性恋者不再受压迫的社会环境、一种能让他们的性选择得到肯定的社会环境一样，它也应该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异性恋行为不再受到异性恋主义的约束，让它也得到肯定。这样做的一个实际理由是，认识到作为一项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的发展要依赖于广大妇女的参与，其中大多数是异性恋者。只要女权主义的女性（她们可以是独身、同性恋、异性恋等等）批评男性的性行为，并且其范围包括了与男性有性关系的妇女，那么女权运动便被破坏了。造成了无益也是不必要的分割。同时，只要任何的支持异性恋主义的话被当作是对同性恋的隐蔽的攻击，那么我们便是在巩固认为它们是、也应该是相互对抗的性行为的想法。要想在不以任何方式批评异性恋的情况下指出同性恋的积极或消极方面是可以做到的，反之亦然。虽然爱伦·威利斯没有在她的文章中讨论到同性恋对于女权主义的女性来说是一个政治上更加正确的性选择这个观点，或者讨论到这代表着把一种性标准强加给妇女的企图，但她对新维多利亚逻辑的评论适用于对女性与男性的性接触的攻击：

> 新维多利亚主义也破坏了女权主义对权利的反对，把女权主义与她们自己的性态度等同起来，把和她们意

> 见不同的妇女从运动中排挤出去。由于她们有关恰当的女权主义者的性行为的主张附和了传统的道德评判和当前来自右翼的反对性行为的宣传，所以她们散布的犯罪感也是很有效的。很多认识到自己的性的情感与新维多利亚理想相矛盾的女权主义者陷入了困惑而有歉意的沉默。毫无疑问，有很多妇女静静地得出了结论：如果这种理想是女权主义，那么女权主义便是与她们无关的。其结果是运动中广泛传播的冷漠、不诚实和极大的不团结，运动面临着威胁到其生存的顽固的敌人。

目标在于消除性别歧视压迫和性压迫的女权运动不能忽视或放弃妇女所作的异性恋的选择。很多妇女尽管是异性恋者，但她们认识到并且接受了她们不一定非要是异性恋（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而是仅仅或者首先选择了异性恋的想法。她们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通过选择她们享受了性自由。她们的选择可以不像那些反对她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受到异性恋特权的影响。大多数异性恋特权与一个妇女在异性恋关系中可能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相比，便显得很无力。也有例外。很多妇女选择异性恋是因为她们喜欢与男性个人有性接触。女权运动丰富并且扩大了同性恋性行为的范围，因此没有理由不可以对异性恋进行同样的做法。有着异性恋取向的妇女需要知道，即使女权主义向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提出了挑战和反对，但它不是一项否定她们的选择的政治运动。

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我也是其中之一）相信，如果个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在相互对抗的性行为中作出选择（最明显的便是异性恋和同性恋），并且服从于所选择观点的期望，那么结

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将不会改变具有破坏性的性规范。性的欲望改变了范围并使其具有多样性,很少像一些规范所说的那样是"惟一的"。一种自由的性行为不会教妇女把她们的身体视为是可以让所有的男性或所有的女性得到的。它赞成一种建立在个人交流基础上的开放或封闭的性。性取向思想中的含义是认为任何有性倾向的人都可以接近一个人的身体。这是一种提倡客体化的概念。在异性恋中,它使每个人,尤其是妇女,成为性客体。由于性政治造成的权力差异,妇女们很可能会被任何男性接近,因为男性受到的教育是他们应该接近所有女性的身体。如果抛弃去除了性欲望的特殊性的规范和标志,那么性行为将会改变。就像斯蒂芬·希思(Stephen Heath)在《性的凝滞》中总结的那样:

> 压迫的结束是重新建立一种使男人和女人都自由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性的商品化,作为一种性的特性消除了流通和交换中的暴力和疏远,一种性的特征,符合了这种或那种形象、这种或那种观点,符合"性"。

虽然有着"异性恋"的特征,但由于性压迫的政治性,这个社会中的很多妇女很少从男性那里产生性欲望;男性的统治破坏并且扭曲了这种欲望。这是男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压迫的恶劣行径,这使女性难以提及与男性的积极的性交流。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指出,她们选择与某个男性个人有关系,但反对认为她们欢迎或接受任何男性的示爱的异性恋观点。这种行为攻击了强迫性的异性恋,这种异性恋否认女性有权利通过判断这种关系是否支持和肯定她们来选择男

性性伴侣。女性们坚持维护选择的权利,向认为女性的性行为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要而存在的想法提出挑战。她们的努力加强了结束性压迫的斗争。选择的权利必须成为个人之间一切性交流的特征。

随着结束性压迫的斗争的进展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变化将会减少性行为的纠缠。这不一定意味着性行为的减少。这意味着性行为将不再有社会赋予它的重要性,这个社会用性来表现维持性别不平等、男性统治、消费主义的目的,以及把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需要中转移开的性挫败和不愉快。就像斯苔芬·希斯评论的那样:

> 真正的问题和任务总是社会革命。赋予性特权并不意味着性解放;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社会通过这一事实来发展,并且以之为参照,在有效的变革过程之外保障社会秩序,精确地建构一个包容性的空间和"革命"或"解放"的意识。

要消除性压迫,女权主义者必须继续努力形成一种性政治理论。我们必须记住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只是改变社会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12 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发展

今天几乎没有人提到女权主义革命。考虑到这种革命会简单而迅速地发生，好战的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们觉得标志着早期女权运动特征的行动浪潮——抗议、组织和提高认识——是它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虽然女权主义激进分子认识到要消除性别歧视的压迫就必须改变社会，但女权主义的成功主要产生在改革的范围内（这主要归功于像"面包和玫瑰"和"康巴伊河集体"等激进组织的努力和眼界）。这样的改革帮助很多妇女在现有的白人至上、父权制制度中的很多领域内向与男性社会平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这些改革没有与减少性剥削和（或）性压迫相一致。占主导地位的性别价值和设想依然没有受到触动，在政治上保守的反女权主义者要破坏女权主义改革是很容易的。很多政治进步的女权运动批评者把改革的推动力看作是反生产的。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在她的文章"女权主义：改革或革命"中赞成改革，认为它是革命过程的一个阶段，她写道：

> 改革者的头脑中可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它就像是一幅新社会的图画。改革将一点一点地填满这个画面。有的改革相对来说没什么困难(如同工同酬)，其他的要做到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每份工作同等机会)。但无论困难是大是小，对于每种变化社会中总会有一个先例——在某个地方，并且所需要的变革只是那些将产生在人们期待的新社会的画面之中的。于是在长期的一系列少量的改变之后，每件事都会逐渐改变从而使整个制度变得完全不同……在这种变化模式下，一系列的改革可能会形成革命。

改革可以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重要的是所进行的改革的类型。女权主义关注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很多妇女和男性都没有看到社会整体改变的需要。如"平等权利修正案"(ERA)运动便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用到了本应该是一项广泛的政治运动的建立女权主义选举区的改革上面。这种选举区将会确保 ERA 的成功。不幸的是，把用女权运动来教育广大妇女和男性、告诉他们这将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作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性改革并没有在进行。参加女权改革的妇女考虑得更多的是得到与男性的平等和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改变社会。

妇女运动中很多激进的积极分子对于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得到与男性的社会平等并无兴趣，而更加倾向于攻击带有剥削和压迫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她们把男性看作是坏人、"敌人"，她们把注意力放在揭露男性的"罪恶"上。批评和攻击色情作品便是一个例证。色情作品显然是在提倡贬低妇女，提

倡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并且,如果不对社会的改革和暗含的性的改革加以更多的强调,那么对于色情作品的不断谴责是毫无结果的。女权运动并没有更严重地注意这场更加重要的斗争。(在艾莉斯·安科尔斯[Alice Echols]的文章"文化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反色情品运动"中可以找到有关女权主义反对色情作品工作的政治主张的更加全面的讨论。)对"男人"和"男人的行为"的关注掩盖了对妇女在政治方面发展自己的强调,后者使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能为建立新社会秩序铺平道路的文化变革。很多女权主义者的认识的提高集中在帮助妇女理解个人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的本质,特别是与男性统治有关的内容上。当然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但不是提高认识的惟一工作。

女权主义的提高认识没有有效地使妇女形成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在极大程度上它没有帮助妇女理解资本主义——它是如何作为一个剥削女性劳动的制度来运作的以及它与性压迫的相互联系。它没有促使妇女们去了解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或者鼓励妇女去创造和设想新的政治制度。它没有对物质主义和我们的社会对过度消费的沉溺进行攻击。它没有向妇女说明我们是如何从剥削和压迫全球的女性和男性中获得利益的,或者向我们说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不断地促使妇女们去理解,只有投入到革命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旨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才能成功。

新的社会秩序在逐渐建立。这对于美国的个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已经被社会化,相信革命要么总是伴随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极端的暴力,要么革命的发生是非常迅

速的。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寻求立刻满足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要求得到尽快的答复。和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任何解放运动一样，女权主义也历尽艰难，因为这些态度没有使参加者形成一种使革命得以成功的长期斗争的义务。于是，女权运动没有能维持其革命运动。它只是一次成功的反抗。格瑞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强调了反抗和革命之间的区别：

> 反抗是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它不是革命。它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它代表了"抵抗"，这是被压迫者的人性的声明。反抗让被压迫者和每个人都知道一种形势已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在被压迫者中形成了一种交流的方式，并且同时让那些对他们同类的命运一无所知的人打开眼睛和耳朵。反抗挣断了把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对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和假设的永久性提出质疑。他们动摇了旧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再维持现状。社会的惯性被打破了。我们只有了解了反抗能做到些什么才能看到其局限性。反抗可以瓦解社会，但它没有提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东西。

虽然女权主义反抗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形成进一步的革命发展。从内部来说，它的进步受到一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的阻碍，这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认为运动的存在是为了所有女性和男性的进步，她们似乎认为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个人参与者得以提升，她们受到与占主导地位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和思想的威胁，她们努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她们

不承认有必要继续努力创造一个解放的意识形态。这些妇女抵制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性的审视,拒绝承认其局限性。从外部来看,阻碍女权主义运动的是有组织的反女权主义行动,还有那些因尚未完全了解问题的两方面而不知采取何种立场的妇女和男性在政治上的漠不关心。

为了超越女权主义的反抗阶段,为了打破构成当前女权运动特点的偏局,妇女们必须认识到重组的必要性。女权运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我们必须承认在通过政治教育来提高大众对女权运动的必要性的认识方面,女权主义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还没有形成一种策略。如果女权主义是一项用革命和变革的方式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的话,那么这种策略便是有必要的。我们还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女权运动当前面对的很多进退两难的局面是由资产阶级妇女造成的,她们用服务于她们的机会主义的阶级利益的方式形成了这项运动。我们现在必须努力改革其方向,以便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能看到女权运动是服务于她们在结束性压迫中的利益的。认识到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利用了女权运动,不应被视为是在攻击所有的资产阶级妇女。有个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批判其阶级特权;她们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她们已经、正在或愿意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投入到女权运动之中以推动其发展。重新建构女权运动的阶级政治思想是一种策略,它可以让所有阶层的妇女都加入到女权主义斗争中来。

为了创立一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我们必须有一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的有关解放的思想。要创造这种革命的思想,只有去理解、涉及和吸收那些处于边缘的、受到性

压迫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人们的经历才行。他们必须作为理论的创造者和行动的领导者到女权运动之中去。在过去的女权主义实践中，我们满足于依靠一些自封的个人，其中有些人更加关心的是权威性和行使权力，而不是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交流。这样的人没有去了解女性共同的经历，而是强加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领导者是需要的，领导者应该是那些承认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并且对它负责任的人。她们应该有能力表现爱和同情，通过她们的行动来表现这种爱，并且能够进行成功的对话。保罗·弗瑞尔认为这种爱可以改变统治：

> 然而，没有对世界、对女性与男性深切的爱，对话是不可能存在的。给世界定名是一种创造和再创造，如果不倾注爱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爱也是对话的基础、是对话本身。它必然是重要的主题并且不可能存在于统治关系之中。统治体现了病态的爱：统治者的虐待狂和被统治者的受虐狂倾向。由于爱是一种有勇气的行为，而不是恐惧，所以爱是对他人的承诺。无论哪里有被压迫者，爱这一行为都将承担起他们的理想——解放的理想。这种承担由于是有爱的，因此也是对话方式的。

妇女们必须在理解了我们所有的人（无论种族、性别和阶级）都曾经与现存的压迫制度共同行动过的情况下开始女权主义的革新工作。我们都必须在意识上与这一制度隔绝。我们之中有些人比其他人隔绝得快。延伸到我们自身的同情和对我们在意识与行动上的改变是一个过程的认识，必须伴随我们

接近那些在政治上还没有觉悟的人。我们不能用政治优越性来促使他们加入女权斗争,这种优越性只是使运动变成另一种压迫性的等级制度。

在我们可以动员广大群众之前,必须再次得到那些曾经积极于女权运动但由于幻想破灭而离开的妇女们的关注、支持和加入。有太多的妇女放弃了女权运动,因为她们无法支持少部分控制着女权主义言论的妇女的思想,女权主义言论是赋予实践以活力的理论的发展。有太多在意与男性的联系的妇女离开了女权运动,因为她们认为把男性视为“敌人”是一种不具建设性的模式。有太多的妇女不再支持女权主义斗争,因为它的思想过于武断、专制而且非常封闭。有太多的妇女离开了女权运动因为她们被认为是“敌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应该注意到苏珊·格里芬在她的文章“一切意识形态的方式”中提醒我们的话:

> 对世界的深刻的政治认识并不会产生敌人。实际上,产生由环境无法解释的怪事是忘记了首先解释由环境产生行为的政治观点,相信所有的人天生都具有创造、快乐和善良的能力,在适当的环境中人类的天性可以得到绽放。
>
> 如果一项解放运动主要是用对敌人的仇恨,而不是用对可能性的预见来激发自己,那么它一开始就被自己打败了。它的观点便不会再有作用。尽管它声称自己赞成解放,但它的语言不再是解放的。它开始在它内部要求审查制度。它对真理的观点越来越狭隘。一场以唤起真理开始的运动变得从外表看具有欺骗性,开始反映出

> 所有它声称自己反对的东西，于是它现在也是某些真理的对立面了，并且像旧的压迫者一样开始隐藏自己。

为了恢复女权运动的革命生命力，妇女和男性都必须开始重新考虑和形成它的方向。尽管我们必须认识、承认和感激女权主义反抗的重要性及发起这种反抗的妇女（和男人）们，但我们必须愿意批评、重新审视和再次开始女权主义工作，这是一项富于挑战的任务，因为我们没有历史先例。进行革命有很多方式。革命的发起可以是、也通常是用暴力推翻现在的政治结构。在美国，加入女权主义斗争的妇女和男性知道我们的权力远远不如我们的反对者，他们不但有人类所知道的每一种军备，而且还有进行和接受暴力的学术意识以及维持暴力的技能。因此，这不能成为社会中女权主义革命的基础。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文化变革上：消灭二元论、消除统治制度。我们的斗争将是渐进的、长久的。任何进行女权主义革命的努力都会得到由全球反抗强权的受压迫民族发起的解放斗争的帮助。

有关一个对立世界的观点的形成对女权主义斗争是很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一个我们非常了解的世界，一个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世界（即使这种感觉是建立在幻想之上）必须被根本地改变。也许正是这种对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而不仅仅是那些被我们定为是敌人或压迫者的人必须改变的认识，至今一直在检验我们的革命动力。如果旨在结束现有压迫的女权运动要进步，如果我们要改变当前的现状，那么这些革命动力必须自由地为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赋予活力。

参考书目

Amos, Valerie, and Pratibha Parmar. "Challenging Imperial Feminism," *Feminist Review*, Autumn 1984.

André, Rae. *Homemakers: The Forgotten Work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Angelou, Maya. "Interview," in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 Ed. Claudia Tate.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1983.

Aptheker, Bettina. *Woman's Legacy: Essays on Race, Sex, and Class in American Hist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Babcox, Deborah, and Madeline Bekin, eds. *Liberation Now!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Dell, 1971.

Badinter, Elisabeth. *Mother Love*. New York: Macmillan, 1981.

Barber, Benjamin. *Liberating Feminism*. New York: Dell, 1975.

Berg, Barbara. *The Remembered Gate: Origins of American Femi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Bernard, Jessie. *The Future of Motherhood*. New York: Dial, 1974.

Bird, Caroline. *The Two-Paycheck Marriage*. New York: Rocket Books, 1979.

Boggs, Grace Lee, and James Boggs.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Brown, Rita Mae. "The last Straw," in *Class and Feminism*. Eds. Charlotte Bunch and Nancy Myron. Baltimore: Diana Press, 1974, pp. 14-23.

Bunch, Charlotte. "Feminism and Education: Not by Degrees." *Quest*, Vol. V, No. 1 (Summer 1979), pp. 1-7.

Bunch, Charlotte, and Nancy Myron, eds. *Class and Feminism: A Collection of Essays from the Furies*. Baltimore: Diana Press, 1974.

Cagan, Leslie. "Talking Disarmament," *South End Press News*, Vol. 2, No. 2 (Spring / Summer 1983), pp. 1-7.

Cartledge, Sue, and Joanna Ryan, eds. *Sex and Love: New Thoughts on Old Contradictions*. London: Women's Press, 1983.

Cassell, Joan. *A Group Called Women: Sisterhood and Symbolism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New York: McKay, 1977.

Chesler, Phyllis. *With Child: A Diary of Motherhood*. New York: Crowell, 1979.

Chesler, Phyllis, and Emily Jane Goodman. *Women,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76.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larke, Cheryl. "The Failure to Transform: Homophobia in the Black Community," in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Ed. Barbara Smith.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pp. 197-208.

Coles, Robert, and Jane Coles. *Women of Crisi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Cornwell, Anita. "Three for the Price of One: Notes from a Gay Black Feminist," in *Lavender Culture*. Eds. Karla Jay and Allen Young. New York: Jove Book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pp. 466-76.

Coward, Rosalind. *Female Desire*. London: Paladin, 1984.

Daly, Mary. *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Delphy, Christine.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Trans. Diana Leonar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4.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 trans. Elaine Marks,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Eds.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p. 197-98.

Dixon, Marlene. *Women in Class Struggle*. San Francisco: Synthesis Publications, 1980.

Echols, Alice. "Cultural Feminism: Feminist Capitalism and the Anti-Pornography Movement," *Social Text* (Spring / Summer 1983), pp. 34-57.

Ehrenreich, Barbara, and Karin Stallard. "The Nouveau Poor,"

Ms., August 1983, pp. 217-24.

Ehrlich, Carol.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a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Ed. Lydia Sarg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pp. 109-33.

Eisenstein, Zillah.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York: Longman, 1981.

Enloe, Cynthia. *Does Khaki Become You?: The Militarization of Women's Liv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Evans, Sara. *Personal Politics: The Root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Knopf, 1979.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Fouque, Antoinette. "Warnings,"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Eds.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p. 117-18.

Freeman, Jo.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75.

Freire, Paulo.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1970.

Friday, Nancy. *My Mother/My Self: The Daughter'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York: Delacorte, 1977.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1963.

Fritz, Leah. *Dreamers and Dealers: An Intimate Appraisal of the Women's Moveme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Goodman, Ellen. "The Turmoil of Teenage Sexuality," *Ms.*, Vol. XII, No. 1(July 1983), pp.37-41.

Goodman, Gerre, et al. *No Turning Back: Lesbian and Gay Liberation of the '80s*.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ress, 1983.

Gornick, Vivian. *Essays in Femin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Greene, Bob. "Sisters—Under the Skin," *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y 15, 1983.

Greer, Germaine.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Griffin, Susan. "The Way of All ideology," *Signs*, Spring 1982.

Gross, Jeanne. "Feminist Ethics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Radical Religion*, Vol. III, No.2 (1977), pp. 52-56.

Hanisch, Carol. "Men's Liberation," in *Feminist Revolution*, Redstockings, 1975, pp. 60-63.

Harding, Sandra. "Feminism: Reform or Revolution," in *Women and Philosophy*. Eds. Carol Gould and Marx Wartofsky. New York: G. P. Putnam, 1976, pp. 271-84.

Harsock, Nancy. "Political Change: Two Perspectives on Power," in *Building Feminist Theory: Essays from Quest*. New York: Longman, 1981, pp. 3-19.

Heath, Stephen. *The Sexual Fix*. London: Macmillan, 1982.

Hellman, Lillian. *Pentimento*.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Hodge, John. *The Cultural Basis of Racism and Group Oppression*.

Berkeley: Time Readers Press, 1975.

Hornacek, Paul. "Anti-Sexist 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 for Men," in *For Men Against Sexism: A Book of Readings*. Ed. John Snodgrass. Albion: Times Change Press, 1977.

Janeway, Elizabeth. *Cross Section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2.

——. *Powers of the Weak*. New York: Morrow Quill, 1981.

Joseph, Gloria. "The Incompatible Ménage à Trois: Marxiam, Fiminism, and Racism,"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Ed. Lydia Sarg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Kennedy, Florynce. "Institutionalized Oppression vs. The Female," i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Ed. Robin Morg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p. 438-46.

Koedt, Anne, Ellen Levine, and Anita Rapore, eds., *Radical Feminism*. New York: Quardrangle Books, 1973.

Koen, Susan, Nina Swain, and Friends, eds. *Ain't Nowhere We Can Run: A Handbook for Women on the Nuclear Mentality*. Norwich, VT: WAND, 1980, p.2.

Kollias, Karen. "Class Realities: Create a New Power Base," *Quest*, Vol. I, No.3 (Winter 1975), pp.28-43.

Leon, Barbara. "Separate to Integrate," in *Feminist Revolutition*. Redstockings, 1975, pp. 139-44.

Malos, Ellen, ed. *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 New York: Allison and Busby, 1982.

Markovic, Mihailo. "Women's Liberation and Human Emancipation," in *Women and Philosophy*. Eds. Carol Gould and

Marx Wartofsky. New York: G.P. Putnam, 1976, pp. 145-67.

McCandless, Cathy. "Some Thoughts about Racism, Classism, and Separatism," in *Top Ranking*. Eds. Joan Gibbs and Sara Bennett. New York: February Third Press, 1979, pp. 105-15.

Montgomery, Helen. *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Moraga, Cherríe. *Loving in the War Years: lo que nunca pasó por sus labio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Morgan, Robin, ed.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Morrison, Toni. "Cinderella's Stepsisters," *Ms.*, September 1979, pp.41-42.

——. "What the Black Woman Thinks about Women's Lib,"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2, 1971.

Oakley, Ann.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Hew York: Pantheon, 1975.

Patrick, Jane. "A Special Report on Love, Violence, and the Single Woman," *Mademoiselle*, October 1982, pp. 188, 189, 240, 242.

Person, Ethel Spector. "Sexuality as the Mainstay of Identity: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in *Women: Sex and Sexuality*. Eds. Catherine Stimpson and Ethel Spector Per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36-61.

"Redstockings Manifesto," i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d. Robin

Morg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p. 533-36.

Rich, Adrienne. *Of Woman Bor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Ruddick, Sara. "Maternal Thinking," *in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Ed. Barrie Thorne with Marilyn Yalom. New York: Longman, 1982, pp. 76-93.

Rule, Jane. "With All Due Respect," in *Outlander*. Tallahassee, FL: Naiad Press, 1981.

Saffioti, Heleieth I. B. *Women in Class Society*. Trans. Michael V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Schechter, Susan. *Women and Male Violence: The Visions and Struggles of the Battered Women's Movement*. Boston: Southe End Press, 1982.

Schoonmaker, Mary Ellen. "Bringing Up Baby," *In These Times*, September 7, 1983, pp. 12, 13, 22.

Smith, Barbara. "Notes for Yet Another Paper on Black Feminism, Or, Will the Real Enemy Please Stand Up?," *Conditions: Five*, Vol. 11, No.2 (Autumn 1979), pp. 123-27.

——, ed.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Snitow, Ann,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eds.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Snodgrass, Jon, ed. *For Men Against Sexism: A Book of Readings*. Albion: Times Change Press, 1977.

Spelman, Elizabeth. "Theories of Race and Gender/ The Erasure of

Black Women," *Quest*, Vol. V, No.4 (1982), pp. 36-62.

Stambler, Sookie, comp. *Women's Liberation: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Ace Books, 1970.

Thorne, Barrie. "Feminist Rethinking of the Family: An Overview," in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Ed. Barrie Thorne with Marilyn Yalom. New York: Longman, 1982.

Valeska, Lucia. "If All Else Fails, I'm Still a Mother." *Quest*, Vol. I, No.3 (Winter 1975).

Vazquez, Carmen.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Ethics," *Coming Up*, January 1983, p.11.

Walton, Patty. "The Culture in Our Blood," *Women: A Journal of Liberation*, Vol. Ⅷ, No.1 (January 1982), pp. 43-45.

Ware, Cellestine. *Woman Power: The Movement for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Tower Publications, 1970.

Willis, Ellen. "Toward a Feminist Sexual Revolution," *Social Text* (Fall 1982), pp. 3-21.

Women and the New World. Detroit: Advocators, 1976.